

炎黄春秋



1984年孙越琦(中)在新年团拜会上

赤色首都瑞金的第一任书记
深圳特区建设中的梁湘

李宗仁率杂牌军血战台儿庄
台湾，血脉之源在大陆

功高德劭的百岁老人孙越琦
西府战役失利
时的彭德怀

落 日

7
95

——我参加了盟国对日本的受降仪式



彭德怀在前线

祝阜平大枣节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十九日为
河北阜平大枣节题 萧克

阜平豪侠地

位于太行山

西邻五台顶

东望渤海湾

金置阜平县^①

大枣美名传

枣树遍田野

步趋不见天

忆昔战倭蒋

常忧断炊烟

大枣餉军民

同心度危难

改革与开放

经济着先鞭

鲜枣逢佳节

发展更无前

①：阜平，金代开始设县

本期导读

建国前夕毛泽东与斯大林的电报往来

新中国诞生前夕，败局已定的国民党向美、英、法、苏发出照会，希望他们居中调停，将“和平政势”国际化。面对着有可能引起美国对中国内战进行军事干预的复杂形势，斯大林决定征求毛泽东的看法……两位巨人多次往来的电报，真实地记录了这一段历史。

赤色首都瑞金的第一任书记

正是王明路线得势时期，邓小平被从上海派往苏区，在瑞金任县委书记。此时的红色首都，在左倾肃反路线的影响下，天天在杀自己的同志，邓小平竟敢把杀人者推上断头台，把上断头台的好同志解救回来。但不久，他得到一纸调离的命令。

名将粟裕大战淮海

是他首先提出打淮海战役，是他建议中央军委将蒋介石主力歼灭在长江以北，也是他指挥华野把黄百韬军团围歼在碾庄……毛泽东赞扬说：淮海战役，粟裕立了头功。

深圳特区建设中的梁湘

八十年代初，梁湘领着一班人，几年间就把一个边陲小镇建成拥有 55 条大街的现代都市。邓小平赞叹不已，称之为“深圳速度”。如今，先锋官梁湘已经过起离休的生活，这颗东方明珠的深圳，正向世界展示中国改革开放的日新月异。

西府战役失利时的彭德怀

彭德怀一生打过许多大仗、硬仗、胜仗，没想到西府之战失利，兵力损失一万五，夫人浦安修也险遭不测。在仓促突围时，彭总却表现了处变不惊的大将军风范。

台湾，血脉之源在大陆

虽然地缘关系在台湾和大陆间横起一条海峡，但是，台湾的血脉在大陆。本文从台湾与大陆的地缘变迁，文化传播，以及历史沿革诸方面，揭示了这一主题。

李宗仁率杂牌军血战台儿庄

大敌当前，国民党杂牌军的将领们深晓民族大义，他们捐弃前嫌，共赴国难，在李宗仁将军的统率下，以落后的装备浴血奋战，赢得了震撼世界的战争奇迹。

落日

1945 年 9 月 2 日，大公报特派驻美记者朱启平，参加了在东京湾举行的盟国对日本的受降仪式。他珍贵地摄下了这一历史庄严时刻的照片，又生动地记下了盟军将领的欢悦感情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可耻下场。

下期要目

- △我心中的方志敏
- △从“京九”到京九：两幅迥异的历史画面
- △乌兰夫、傅作义共建蒙古族抗日军队
- △东京审判，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 △鸡蛋坨也有五壮士
- △文化名人姚克不平凡的一生
- △从君主立宪派转变为共产主义者——话说杨度
- △历史档案中的杨乃武与小白菜

<p>顾问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朝闻 冯文彬 伍修权 杨静仁 赵朴初 胡絮青 费孝通 谢冰心</p> <p>特邀编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俊义 冯 征 冯其庸 刘颖南 李 庄 李 普 李学勤 吴 象 苏双碧 张 镗 张国琦 凌 云 常 征 温济泽 韩劲草 廖盖隆 穆 青 戴 逸 魏 巍 魏久明</p> <p>社长 (法人代表): 杜导正 副社长: 方 实 宋文茂 (常务) 徐 孔 洪 炉 丁洪章</p> <p>执行主编: 刘家驹 王恂 舒元璋</p> <p>理 事 长: 杜导正 名誉理事 (单位): 中国有色金属进出口总公司 副理事长: 贝兆汉 理 事: 白亚南 蔡道峰 林春露 秘 书 长: 徐 孔</p> <p>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170 社 址: 北京西城区文津街 7 号 邮 编: 100802 印 刷: 世界知识印刷厂 国内总发行: 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 82-507 订 购 处: 全国各地邮局 (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 公司 (北京 399 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 1274M 出版日期: 每月 15 日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 0079 号 杂志社电话: 6016633-227 6076801 定 价: 3.20 元</p>	<p>求实篇</p>	<p>英杰谱</p>	<p>殒星篇</p>	<p>古今谈</p>
<p>④ 建国前夕毛泽东与斯大林的电报往来</p>	<p>⑧ 赤色首都瑞金的第一任书记</p>	<p>⑬ 叱咤风云的黄埔女兵</p> <p>⑱ 功高德劭的百岁老人孙越崎</p>	<p>⑳ 名将粟裕大战淮海</p> <p>㉕ 西府战役失利时的彭德怀</p> <p>㉘ 板荡识忠贞</p> <p>——记顿星云将军</p>	<p>⑳ 台湾, 血脉之源在大陆</p>
<p>奎松</p>	<p>汤静涛 舒云 孙本尧</p>	<p>李敏杰 朱光亚 诸辛</p>	<p>杨肇林</p>	<p>田珏</p>

目 录

时代风	春秋笔	人海浪	古镜台	遗闻录	文荟园	编读窗
<p>③6 深圳特区建设中的梁湘 …………… 张天来</p> <p>④4 韩先楚将军的故乡情 …………… 邓运双</p> <p>④6 将帅们的保健大夫牟善初 …………… 春雨 洪 矛</p> <p>⑤0 神农架上的现代「野人」 …………… 朱富有 朱兴宏 李祖斌</p>	<p>⑤4 李宗仁率杂牌军血战台儿庄 …………… 解力夫</p> <p>⑤9 中国远征军师长戴安澜魂系缅甸 …………… 屈德骞</p> <p>⑥6 落日 …………… 朱启平</p> <p>——我参加了盟国对日本的受降仪式 ……………</p>	<p>⑥9 从美国间谍到友好使者 …………… 王 鉴</p> <p>他俩成了友好使者 …………… 林 方</p> <p>关于唐奈、费克图的判刑和释放 …………… 赵 惠</p> <p>智歼美国飞机 ……………</p>	<p>⑦4 一代明主唐太宗的另一面 …………… 徐庆全</p>	<p>⑧0 中央红军中女红军参加长征的有多少 …………… 张 震</p> <p>⑧2 毛泽东堂弟毛泽润是怎样被杀害的 …………… 周 楹</p> <p>⑧1 新中国建立时的国号之争 …………… 余广人</p>	<p>⑧4 《大刀进行曲》是怎样产生的 …………… 窦孝鹏</p> <p>⑧6 历史上的谢安何以为毛泽东称赞 …………… 邹北辰</p>	<p>⑧7 读者来信三则 …………… 刘忠义 陈清泉 金则文</p>

在人民解放军鏖战淮海、平津，国民党败局已定之际，蒋介石照会苏、美、英、法，玩弄假和平阴谋。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老朋友斯大林，对此事看法如何？对毛泽东誓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究竟持何态度？长期以来有不同说法和猜测。本文作者根据不久前公布的前苏联档案材料，提出了一种新的解释，值得一读。

建国前夕

毛泽东与斯大林的电报往来

● 奎松

1948年9月下旬，华东野战军一举全歼国民党军10万人，夺取济南。10月下旬，东北野战军成功地歼灭国民党军47万人，占领了整个东北地区。接着，淮海、平津两个战役也开始紧锣密鼓地发动起来。面对这一大好形势，毛泽东于11月11日兴奋地宣布说：中央政治局会议时所作的五年左右建军五百万，歼敌五百个正规师，基本上打倒国民党的估计及任务，因为九、十两月的伟大胜利，已经显得落后了。这一任务的完成，大概只需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即可达到了。

1949年1月6日，虽是寒风料峭，毛泽东的心情比任何时候都要好。在河北平山县的西柏坡村一间简陋的农舍里，他轻松地抽着烟，谈笑风生地对在座的中共领导人说：现在不同了，情况更好更明了。蒋介石再也不能强迫我们接受他们的所谓“和平”了。

几乎就在中共领导人穿着粗布棉袄，一同挤在西柏坡农舍的火堆旁，兴致勃勃地讨论新中国未来蓝图的同时，国民党要求苏、美、英、法四国政府出面调停中国的内战。

这早就是一件预料之中的事

了。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三国政府像是约定好了的一样，全都知难而退，将南京的恳求束之高阁。让人猜不透的是斯大林。

和以往一样，斯大林最怕的是，一旦美国插手，中国多半将会成为美国的东方反苏的桥头堡。那时候苏联的日子可难过了！这也就是为什么不管中国的内战打得怎样，苏联政府始终不敢轻易地相信中国共产党人，它一面小心翼翼地内部表示对中国革命关心，一面又想方设法地通过外交手腕拉拢南京政府，极力离间南京与华盛顿之间的关系。因为，根据苏、美、英三国在雅尔塔达成的协议，中国是美国人的势力范围。美国人会听任中国落到中共的手里去吗？正因为如此，他们对中央夺取整个中国的可能性几乎一直不抱太多希望。即使在国民党已经陷入泥沼无以自拔之时，他们还是将信将疑。斯大林千祈求万祈求，就是希望毛泽东不要把美国人引到中国来！

有人说，斯大林这时并不希望中共胜利，他宁愿看到南京政府继续保持其统治，因为他知道毛泽东可能比蒋介石更不好对付。不知道这样的说法有什么根据。实际上，在斯大林与毛泽东这一时期的内

部通报中，斯大林始终在对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表示祝贺，并不断地向中共中央通报国民党和美国人的动向，特别是帮助中共在东北的军事行动上取得更多的进展。在1948年12月毛泽东进一步全面通报了辽沈战役的情况，以及平津战役和淮海战役的准备及进展情况之后，斯大林至少比已经估计国民党必败无疑的司徒雷登更清楚这场战争的大势所趋。

斯大林为什么显得如此忧心忡忡呢？他毕竟是苏联这个国家的领导人，他的思想和行为，自觉地和不自觉地都是在为苏联的利益着想。这就如同毛泽东当年批评王明太多地为别人着想一样。依靠革命战争强大起来的毛泽东可以不怕美国人，而刚刚从战争中摆脱出来，有着太多利益需要保护的斯大林，却生怕武装到牙齿的美国人打烂自己辛辛苦苦营造起来的“坛坛罐罐”。因此，他越是注意到中国革命胜利的可能，也就越是担心美国的反应，生怕把美国卷进来。

斯大林一接到南京政府的备忘录，就立即亲自于10日起草电报给毛泽东。他在电报中告诉毛泽东，苏联政府是在9日收到南京政府关于要求苏、美、英、法调停国共

冲突的备忘录的。南京政府的建议显然使美国人受到鼓舞。南京政府建议的目的其实不过是想要借以表明只有他们是期望和平的，而中共却是好战的。他声称，苏联政府准备答复南京方面，说明苏联政府过去是，现在同样是支持中国停止内战，实现和平的。因此，它希望中共方面也能够得到南京政府的这一和平倡议的。

斯大林工于心计。南京的建议使他确信美国人从此有了介入国共冲突的恰当理由，在这种情况下，要想阻止美国人以调停的名义介入国共冲突，最好的办法就是自己不置可否，而由中国共产党出面来加以拒绝。因此，他告诉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应当这样回答国民党，即说明中国共产党从来都是中国和平事业的支持者，中国的内战不是由它挑起的，发动内战的一切责任都应当由南京政府来承担。中国共产党愿意与国民党进行谈判，但是，这必须是在没有那些挑动内战的战犯参加的情况下才是可能的，并且这样的谈判必须是在国共两党之间进行，没有任何外国调停者，尤其是不能接受那个曾经用它的海军和陆军参加中国内战，来反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某个大国的调停。

斯大林同时对毛泽东说，他已经接到毛再度提出的关于访问苏联的要求，他也很愿意安排他的访问。

斯大林这封署名“菲里波夫”的电报叫人怎么理解都可以，它难免不引起正在极力避免与南京谈判的毛泽东的误解。其实，既然新中国的桅杆已经浮出了地平线，无论从苏联自身的利益，还是从中共方面的利益考虑，斯大林很清楚，谈判绝不是明智的选择。因此，斯大林这次也并非象4年以前

一样，非要毛泽东去与国民党谈判不可。

在睡了一觉之后，斯大林终于意识到他的那封电报没有能够清楚地表达他的想法。于是，他不得不急急忙忙另外再发一封电报去向毛泽东进行解释。11日的这封电报说：我们起草的那个答复南京政府的意见，目的其实只是为了破坏和平谈判。国民党绝不会同意没有外国调停人，特别是没有美国参加的谈判。同样，国民党也绝不会同意没有蒋介石和其他战犯参加的谈判。因此，我们估计，国民党必定会拒绝共产党的关于谈判的条件。结果，事情就成了中共同意和平谈判，国民党反而因拒绝和平谈判受到谴责。这样，国民党和美国的和平阴谋将被挫败，而你们将能够继续你们胜利的解放战争。

可是，第二封电报到得晚了些。收到电报的时候，淮海战役已经结束，解放军已经进抵长江北岸。同时，平津之敌也已在东北及华北野战军的切割包围之中。夺取全国胜利已如探囊取物，毛泽东又如何会愿意与南京进行什么鬼谈判？这时的毛泽东已经用不着再“被迫”为斯大林去做什么了。何况斯大林的这封电报中也没有了上次那种盛气凌人，不容商量的语气。毛泽东生气归生气，他只是叫上任弼时等，围坐在火炕上谈论大局了。

毛泽东大声说：还要谈判？国民党的统治已经崩溃了嘛，现在是无条件投降的问题，哪个还要谈判！要我看，美国是想维持国民党的统治，但是对蒋介石是否愿意继续给支持都成问题，如若照斯大林的电报答复，不是刚好让美国政府相信应当参加调停？这下子好，要救了国民党的命了。

这晚，毛泽东独自关上门，提

笔一挥就一封长电，叫来任弼时，叮嘱由专人译成密码发出去。

毛泽东在电报中详细说明了中共中央对当前形势和对谈判问题的看法，明确提出：我们认为，苏联政府对南京政府要求苏联调停中国内战的照会，应答复说，苏联政府从来愿意，现在仍然愿意看到一个和平的、民主的和统一的中国，但是用何种方法达到中国的和平、民主与统一，这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苏联政府根据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未便参加中国内战双方之间的调和工作。如果您们愿意我们的这一提议，那将是对我们的巨大帮助。

毛泽东坦率地告诉斯大林，中国革命目前已经胜利在握，不必再用迂回战术。国民党的和谈建议其实只是一种拖延革命胜利的阴谋。而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时候进行这样的谈判，只会推迟革命胜利的时间，希望解放军早日取得最后胜利的广大人民群众也不会满意，各民主党派更会表示反对。因此，我们倾向于要南京政府无条件投降，并充分揭露敌人的和谈阴谋。

11日的电报发出后，不论是毛泽东，还是其他了解情况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心情仍旧不能很快平静下来。斯大林毕竟在共产党人心中有着较高的威信，何况他在电报里的提议也未必完全没有他的道理。因此，究竟怎样正确理解斯大林电报，特别是如何处理南京和谈提议问题，成了中共领导人心里面一块不大不小的心病。

次日傍晚，毛泽东不得不再度召集有关同志，连夜进一步讨论如何对付南京提议的和平谈判问题。既然是为了破坏国民党的谈判阴谋，就不妨把条件提得更严厉一些，于是，斯大林原来提的两条变

成了中共的新八条，不要外国调处和不要战犯参加谈判完全不成问题，基本的条件在于，南京政府必须同意惩办战犯、废除伪宪法、伪法统及卖国条约、没收官僚资本、改编反动军队、召开新政协并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来接收南京反动政府的一切权力。这实际上就是要国民党无条件投降。毛泽东在会上讲：提出这样的条件，不过是给人民解放军和广大人民群众一个打击国民党的武器，揭露它的和平提议的虚伪性及反动性，我们的目标没有丝毫改变，“战争必须打到底”。

就在会议进行过程中，负责国际来电译电工作的师哲风风火火地推门而入，快步走到毛泽东的身边，把一封电报递到他面前，喘着粗气说，斯大林同志来的。

毛泽东急忙读了起来。当他读罢这封短电，禁不住又走到里间，把前一封电报又翻了出来读了一遍。之后，他沉吟片刻，摇摇头，但又笑着把电报递给身边的任弼时说：唉，这就对了嘛。师哲同志，你等一下，我现在就写一回电。说着，毛泽东走进里间，飞快地起草了给斯大林的又一封复电，电文是这样说的：

我高兴地收到了您 11 日的补充电报。在原则路线（不与国民党进行大规模谈判，和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的问题）上，我们与您完全一致。今天，我们制定了我们同意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先决条件。这些条件是针对蒋介石在他的新年文告中提出的五条反动条件而提的。几天之前，美国人已经在询问，如果没有我们所公布的 43 名战犯的参加，我们是否愿意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因此，只是不要战犯参加谈判这一个条件，已经不足以破坏国民党和平



毛泽东和周恩来在西柏坡

谈判的阴谋了。

这封电报发出时，已经到了第二天，即 1 月 14 日的凌晨。

还在毛泽东复电斯大林说明双方的基本看法完全一致之前，斯大林已经收到了毛泽东 11 日的电报，并迅速起草了给毛泽东的回电。回电进一步指出，必须认真的并且是非常策略的对待国民党的和平建议。因为，如果南京政府的和平提议，如果这个由美国一手导演的和平阴谋完全不存在，那当然最好。我们自然不能上它们的当，因为与国民党实现和平，将给我们共同的事业带来许多麻烦，但是，毫无疑问，这个阴谋既然存在，我们就必须正视它。

斯大林解释说，他很清楚南京和美国提议的和平建议是一种欺骗政策的产物，因为南京政府并非真正希望与共产党实现和平，与共产党实现和平意味着它消灭共产党及其军队的政策全面破产，这会导致国民党领导人政府生命的死亡和国民党军队的完全崩溃。同样，国民党也很知道，共产党绝不会与国民党保持和平，它同样不会放弃消灭国民党及其军队的基本政策。那么，南京这样做想干什么？它是想要停战，想要暂时中止冲突

以便利用停战来恢复国民党军队的秩序，加强它在长江南岸的防线，得到从美国运送来的装备和援助，然后撕毁停战协议，转而给人民解放军一个猛扑，同时谴责共产党破裂谈判。他们最低限度的指望，是要挽救国民党军队的全面失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两种选择，第一是直接地公开拒绝南京的建议，也就是宣布必须继续内战。但这意味着你们把自己的底牌摊在桌面上，拱手送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武器——和平的旗帜——给国民党，同时给了美国政府在欧洲和美国国内公开进行造谣宣传的机会。美国人会说：与中共绝不可能达成和平，只有组织一次外国武装干涉，就象早年发生在苏俄的那次干涉一样，才有可能在中国实现和平。

斯大林断言，直接和坦率地答复问题，对于诚实的人们是一种正确的选择，但在与政治骗子，即与南京国民党这样的人打交道时，直接的和坦率的回答就可能具有危险性。因此，选择另外一种方式来答复南京是有益的。即共产党应当声明：我们从来都希望和平解决问题，但这样的谈判只能在没有外国调停者参加的情况下，并且国民党

不能继续以负有内战责任,早已失去人民信任的南京政府的名义参加谈判,而只能以一个党派的身份参加谈判的条件下,才是可行的。停战只能在双方就和平达成确实协议的时候,才能开始。

斯大林相信,国民党绝不可能接受这样的条件,那样的话,发动内战的责任就自然而然地落到了国民党的头上,和平的旗帜就掌握在共产党的手中了。即使国民党接受了这样的条件,共产党也可以在谈判中要求在政治协商会议中占有五分之三,和在联合政府中占有三分之二的位置,政府主席、国务总理、军队总司令均应由共产党人担任,这一政府将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任何拒绝忠实于这个政府的军队都将被取缔。他指出,国民党多半不可能接受这样一些办法,结果,国民党将被完全孤立,并将被排除在政治协商会议和联合政府之外。

当毛泽东得到这封电报时,他实际上已经充分了解了斯大林的想法。斯大林的这封电报,却更使毛泽东感到庆幸,因为他们所想的是那么的一致。特别是斯大林在电报中坦率地承认,他们之间最初的分歧全因他而起,因为他第一封电报没有能够象这封电报这样充分地 and 清楚地阐明他的策略考虑。斯大林甚至要求毛泽东务必把他的劝告仅仅看成是一种劝告而已,没有任何义务一定要接受它。即使拒绝,也不会影响到双方的关系。苏联将像以往一样继续是他的朋友。斯大林同时表示,苏联政府对南京政府的正式答复,一定遵照毛泽东的提议精神来定。这些都使毛泽东感到满意。当然,他依旧觉得,他当天宣布的有关和谈的八项条件,比起斯大林的条件来,更容易破坏国民党和美国的和谈阴谋。

毛泽东在收到电报的同一天口述了一封简短的回电,要秘书送到电台发出去。电报明确表示,完全同意来电的意见,我们已经采取了大致相同的步骤。斯大林第二天的回电同样简单明了。电文说:我们刚刚收到您最近的短电,它显示我们在南京和平建议和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始的“和平”运动问题上,是完全一致的。因此,这件事如今可以告一段落了。

这时,斯大林开始把他的目光更多地集中到中国革命胜利的问题上来了。他告诉毛泽东,在革命进展如此迅速的关键时刻,毛泽东不应当离开他的岗位。如果毛泽东认为必要;他愿意派一位负责的政治局委员前往中国商谈一切毛泽

东关心的问题。毛泽东对此欣然表示欢迎。于是,苏共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很快就被从莫斯科千里迢迢地送到华北这个偏僻的小山村来了。

至于与南京的关系,这时也尽在斯大林与毛泽东的估计和掌握之中。尽管南京政府随后为了造成停战,出乎意料地连毛泽东所提的八项条件也接受了下来,但就国民党统治层而言,正如斯大林和毛泽东所估计的一样,这样做纯粹只是一种缓兵之计。他们无论如何不肯认罪服输,举手投降。结果,谈判虽然一度展开,最后仍旧宣告破裂。中国共产党到底还是按照毛泽东的意志,用战争的方法,“将革命进行到底”了。

(责任编辑:萧徐)

邮购《炎黄春秋》启事

下半年漏订《炎黄春秋》的各地读者,可直接向本刊发行部函购,每月一期单价 3.20 元,半年 19.20 元,全年 38.40 元,免收邮费。

本刊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 7 号;邮编:100802;联系人:杜习;电话:6076801

《东方之珠——香港社会大写真》

本书作者黄际昌是原《人民日报》驻香港首席记者。他以优美的文字和敏锐的观察力,把香港社会的方方面面,以及港人与大陆的骨肉亲情,声情并茂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书中特别记述了不少知名人物的传奇事迹。是 1997 年香港回归前了解香港既有深度又有风趣的一本读物。

已由中国人事出版社出版,大 32 开,8 印张,定价 9.00 元。邮购加邮费 10%。

《第二次世界大战图史》

本书由华夏出版社出版,以珍贵的历史图片为主,图文并茂,内容翔实可靠,结构上按战争发展时序大排行,从 1934 年的“德意志号协议”,1937 年的“卢沟桥事变”,直到 1945—1946 年的“大审判”,从而使读者对全球各个战场发生的重要事件一览无余。

全书共 672 页,均用铜版纸印刷,每本定价 128 元,邮购加邮费 10%。

以上两书,炎黄春秋杂志社读者服务部办理邮购。

地址:北京朝外机械工业学院新 2 楼炎黄春秋杂志社读者服务部收。邮编:100026;银行帐号:050122—29;开户行:工商银行北京市百万庄分理处甘家口营业室。

赤色首都瑞金的 第一任书记



汤静涛

初抵瑞金的混乱情形 令邓小平四十年难以忘却

1931年8月间，邓小平从上海来到苏区瑞金。

与邓小平同行的，有他的夫人金维映及四川同乡、同在上海中央秘书处共过事的余泽鸿、吴静焘夫妇。邓小平一行到达之后，接待他们的是赣东特委书记谢唯俊。

到瑞金后，邓小平还非常意外地碰到一个老熟人、四川同乡、在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共事、过从甚密的霍步青。在上海时，邓、霍与周恩来、邓颖超同在一个党小组。霍先于邓一个月被派往中央苏区，任苏区中央局巡视员。

瑞金，位于闽赣边界。相传一千多年前，这里盛产黄金，古时候有“人以金为瑞”的说法，人们便给这地方取了个非常好听的名字——瑞金。

然而邓小平抵达之际，瑞金非但没有给人企盼的祥瑞景气，却处处充满着恐怖、混乱和血腥气。

早在这年5月，闽西苏区肃肃所谓“社会民主党”运动，似狂潮般铺天盖地，席卷而来。

瑞金，一时也陷入所谓肃“社”的恐怖之中。

不到十天，县苏堆埃政府和县总工会80%的干部被抓，许多人当作在中国根本就不存在的“社会民主党”分子处决。

6月间，瑞金革命的先行者、第一位县委书记邓希平，县委常委、县苏维埃主席萧连彬，县委常委、县总工会委员长杨舒翘被错杀。县苏维埃和总工会宣布解散。

新成立的县苏维埃政府，不到半个月，大部分干部又被带进了肃反委员会。

7月，肃反转到区一级。以城

关、桃阳等区为重点。区委、区苏维埃全体干部被抓。区委书记、苏维埃主席也被扣留。

审讯时，用肉刑、逼供。

枪决宣布罪状，亦简单至极。只写姓名、年龄、性别、籍贯等，毫无任何过硬事实。

郊外象嘴岗一带，几乎天天听到处决人的枪声。

巡视员霍步青8月8日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这样写道：

“……瑞金现已全县（除少部分）都成赤色区，但目前党及政权因打‘社会民主党’打跨了。整个党团六百余人现究竟剩下几多人，简直不能考察出。现在只有县委三四人，区委支部小组都没有了，这样的赤色，不是亲眼在此看见，说来也不会使人相信的……”

此时，红军主力，正与蒋介石的30万大军，在兴国、莲塘、黄陂、高兴圩一带，鏖战方酣。作为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战争重要后方基地的瑞金，却如此混乱，令人触目惊心、焦虑万分。

1973年，时隔42年后，邓小平在《我的自述》中，仍对当年的混乱情形记忆犹新：

“瑞金是中央苏区的后方，但当时……杀了不少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弄得全县群众不满，干部情绪低落，全县面貌是死气沉沉的”。

大家公推邓小平担任 县委书记，瑞金的局面大为改观

瑞金肃“社”，杀人之多，气氛之恐怖，人心之动荡、惶乱，作为肃“社”领导人，县委书记兼肃反委员会主任李添富，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李添富，又名蓝鸿翔，福建省

上杭人。曾任闽西特委常委、宣传部长。1931年3月间，由闽粤赣特委派赴瑞金工作。其时，瑞金党属闽粤赣特委领导。

起初，邓希平主动让贤，提议上级派来的李添富提任县委书记。许多委员不同意。邓希平逐一劝说，反复工作，李始接邓希平之职，任瑞金县委书记。

肃“社”开始后，李添富仅凭严刑逼供、屈打成招者的口供，便不问青红皂白，将打击矛头对准了曾真心诚意帮助、支持过他的坦荡无私的邓希平。

针对上述情况，邓小平、谢唯俊、霍步青、余泽鸿、金维映、吴静焘商议：必须立即更换领导，以控制事态、稳定局面、安抚人心。

谢、霍、余、金、吴公推邓小平担任县委书记。邓小平在谢唯俊、霍步青大力支持下，在余泽鸿、金维映、吴静焘全力协助下，迅速投入了调查研究、摸清情况、稳定局势、纠正偏差的工作。

在县城聚和店，邓小平的临时住处，召开了首次瑞金部分党团骨干代表会议。

邓小平严肃指出，政治形势不稳定，必将极大地影响到全县人民群众的革命斗志，影响土地革命的开展，影响苏维埃建设。因此务必迅速纠正肃反扩大化的错误。

与会代表大受鼓舞，心情为之豁亮、畅快。

在桃阳、城关、武阳等肃“社”重点区，余泽鸿、金维映分别带队，深入各乡、村，了解干部、群众被杀真相，向农民大爷、大娘询问对肃反的看法，倾听最基层农民群众的呼声。

经过一个月的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各级干部群众的意见，在切实掌握了李添富等人大量确凿错误事实后，邓小平果断下令：



瑞金县委旧址

拘捕李添富及县苏维埃主席谢在权；释放所有在押干部群众；即日停止乱捕滥杀错误行为。

肃反狂潮，基本得到了遏制。

9月中下旬的一天，绵江中学内欢声笑语，百余代表济济一堂。瑞金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这里隆重召开。邓小平亲自主持大会。

大会在热烈气氛中，讨论通过了肃反工作、优抚工作、劳动法、婚姻法、组织消费合作社等决议案。

大会公审并处决了民愤极大、罪不容恕的李添富、谢在权。

大会选举黄正为新一届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危辉春为副主席。同时，选出了参加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

会后，邓小平马不停蹄，逐一指导、督促恢复、建立健全了县属单位和壬田、城关、武阳、桃阳等地各级组织机构。尤其注重建立健全了司法、裁判机构。对拘捕、审讯、审判等权限都作了严格而明确的规定。

继而，在县城、壬田、武阳、安治等地，召开群众大会。邓小平亲临讲话，为被冤屈的干部和群众，

昭雪平反。

瑞金的广大干部群众奔走相告：“邓书记为瑞金人民除了一大害，如果不是他来了，瑞金还不知有多少同志要遭杀害啊！”

瑞金，又仿佛大革命初期，群众情绪如火如荼、蒸蒸日上，局面大为改观。

9月28日，邓小平随邓发、曾山等赴瑞金、宁都交界处，迎接苏区中央局和红军总部。

当晚，毛泽东、朱德、项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等，进驻瑞金东北叶坪村。

此后，邓小平又参与筹划和具体组织实施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选址、广场扩建、会场整修及代表食宿、交通安全等工作。

11月7日。瑞金。叶坪。

万头攒动。人声鼎沸。熊熊的火把耀眼的灯笼映红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会场。

6时30分，毛泽东、朱德、项英、任弼时、王稼祥、彭德怀、陈毅、邓发、顾作霖等，健步进入会场。

掌声雷动。欢腾雀跃。

大会执行主席朱德庄严宣布：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现在开始。我宣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于本日成立了！

锣鼓声，爆竹声，雄壮的红军军歌声。

毛泽东挥毫题词：

苏维埃是工农劳苦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的生活机关，是革命战争的组织者与领导者。

掌声叠起，海潮般经久不息。

红军代表黄克诚、苏区代表成仿吾致词。

大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华苏维埃主席。

大会执行主席曾山宣布：从今日起，瑞金改为中华苏维埃首都。

历史将永远铭记这一神圣的时刻。也永远记住了红色首都的第一任书记邓小平。

邓小平用人之道—— 造就培养大批本地干部

经历了红色恐怖的瑞金，干部奇缺。幸存的干部，或因肃反而意志动摇、逃亡，或因肃反而不被信任、消极。

加紧培养造就大批干部，成为当时刻不容缓的头等大事。邓小平决定，立即举办干部培训班。

办干部培训班，造就培养大批与人民群众紧密联系的土生土长的本地干部，是邓小平的一贯作法。在领导创建广西左右江根据地时如此，进入江西省苏区亦如此。

1931年2月，邓小平率红七军进入崇义后，就在戎马控惚的崇义战地，举办过一期“地方党团训练班”。专为崇义、上杭两县地方党培养干部。

据当年训练班的学员、解放后任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黄志勇中将回忆，训练班的学员，

绝大多数成了上崇苏区的骨干。

在瑞金开办干部训练班，最大的问题，就是人员不足，几乎没人愿意报名参加。

邓小平走村串户，深入农家的田头、屋场，花费了很大的精力和时间，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动员工作。三找杨荣香，便是流传瑞金的佳话之一。

杨荣香，瑞金城市区南郊乡青年。邓小平常去南郊检查、指导工作，故认识了他。

培训班报名时，邓小平叫杨荣香报名参加学习。荣香说什么也不肯。

第二天，邓小平又来找他：荣香，你为啥子不去参加培训班？

杨荣香低头不语。

邓小平拍拍荣香的肩膀，耐心劝道：荣香呀，参加学习，不是件坏事，是培训党的干部，是为老百姓做事，是很光荣的嘛……

杨荣香依然低头不语。

原来，荣香心中有顾虑。前几个月肃反杀的，全是党团员、干部和积极分子。连老书记邓希平、县苏维埃主席萧连彬也杀了。小荣香一想起来，就觉得后怕。

过了几天，邓小平了解详情后，便第三次登门，找杨荣香谈话。

邓小平鼓励说：荣香，肃反扩大化，乱抓人乱杀人，是错误的。我们不是纠正了吗？不要再有思想顾虑了，要相信党，相信苏维埃政府。

邓小平三找杨荣香，态度之诚恳，言词之恳切，消除了荣香内心的种种顾虑。杨荣香积极报名参加了训练班并带动了南郊及附近好几个乡的青年。

10月间，在县城同善社，第一期瑞金干部培训班如期开学。学员达60余人。

邓小平亲自为学员上了第一课。

一张破旧的八仙桌旁，邓小平激昂地侃侃而谈：同志们！从今天起，你们就是党和苏维埃干部了！在我们这里，是没有什么个人便宜可占的。打仗，要冲锋在前，危险困难要抢着上。筹粮、买公债，要占大头；分田、分地，要靠后边。这些，你们都愿意吗？

同志们，我们不能因为肃反杀错了人，就不敢革命了。我们要挺直腰杆，鼓起革命勇气，带领群众为我们苏维埃政权奋斗！

此类干部班，还办过几期。在邓小平的精心培育下，造就了大批优秀干部，为苏维埃建设和革命输送了大量有用之材。

邓小平在任期间，还重用、提拔、培养了一批瑞金土生土长的当地干部。诸如，胡荣佳、危辉春、赖昌祚、朱开铨、杨世珠等等。他们，后来成为中央苏区的一代英才。

创办《瑞金红旗》 邓小平最早的主编生涯

1931年10月26日，在邓小平竭力倡导、筹划下，中共瑞金县委

机关报《瑞金红旗》正式创刊。

《瑞金红旗》建国后发现油印和石印两种版本。

油印本。四开，单面印刷，每期二版，红色油墨印刷。逢公历五日、十日出版，每月六期。刊名用美术字体，标于报纸右上角。报头上下，分别绘有五角星和红旗。正文文字均为竖刻。目前，仅存第12、14、25期，时间分别为1931. 12. 30，1932. 1. 10，1932. 5. 12。

石印本。十六开，二版，石印印刷。逢公历五日、十日出版。公开发行。每期卖一个铜板，每月五个铜板。各区委支部设分售处。现仅见第7、9、11、13等期，出版时间自1931年11月30日至1932年1月5日。

无论油印、石印，均设以下几个栏目：“社论”、“内外新闻”、“扩大红军”、“铁锤”等。

邓小平创办主编《瑞金红旗》，比他主编《红星报》，足足早了一年半。

当年中央苏区，报刊林立、不胜枚举，除中央级的《斗争》、《红色中华》、《红星报》，仅县一级的就



原锦江中学，现为瑞金第一中学，邓小平曾在这里
召开瑞金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

有《上杭红旗》、《永定红旗》、《剑锋报》、《突击》、《艰苦斗争》等，不下20种；但像《瑞金红旗》这样，内容之丰富、版式之活泼、发行面之广、出版时间之长者，实在是凤毛麟角。

自9月末，邓小平的战友纷纷调离。谢唯俊回省委。霍步青回中央局。余泽鸿调宁都县委书记。金维映调于都县委书记。

缺少了帮手，邓小平的工作更加忙碌、紧张、庞杂。事必躬亲、面面俱到。

邓小平谆谆告诫大家 苏维埃干部能否廉洁 关系到革命成败存亡

1931年12月，一个突发事件，强烈地震动了邓小平。

瑞金城市区几个工人，结伴来到邓小平住处东岳庙，向他反映：县苏维埃主席黄正，利用职权，非法向工人摊派生活津贴费，搜刮工人血汗。

邓小平闻讯，极为气愤和震惊，当即派人调查核实，遂召集县委、县苏维埃联席会议，决定予以严肃处理。

会上一些同志替黄正说情。说黄正为革命出过力、流过血、立过功。当县苏维埃主席刚刚三、四个月，这是一念之差，请求邓书记给予从宽处理。

邓小平则斩钉截铁地表示：这是原则问题，谁也不能感情用事。如果让这种人继续担任苏维埃领导职务，只能败坏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名声。

望着危辉春、胡荣佳、陈景魁、陈谦、赖昌祚、杨世珠、罗志才等与会同志，邓小平异常激动而又推心置腹地讲：要让群众信赖苏维埃

政权，就要真正代表人民群众，真心实意为人民群众谋利益。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

邓小平谆谆告诫大家：我们瑞金苏维埃政权虽然很小，可也是第一次与群众见面。她在群众中的声誉，关系到革命事业的成败呵！

会议建议撤销黄正县苏主席职务并报中央人民委员会批准，以危辉春代理县苏维埃主席。

会议责成黄正立即退赔全部款项，向全体工人群众作检查。

为了及时堵住漏洞，防止诸如此类事件再度发生，邓小平迅速挑选了几个原则性强、工作大胆负责的干部，充实到县委监察机构。

与此同时，在县、区、乡、村、学校及厂矿设置举报箱，在大的集市圩场开辟举报“黑板”，发动广大工农群众，对干部的贪污浪费、侵犯群众利益、营私舞弊等现象，一经发现，立即查处。

邓小平主政严明，律己则更严。

罗志才，当年和邓小平一同工作过的瑞金县苏维埃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主任，这样回忆——

“为了节约用布，一律都做成对襟褂子和便衣裤。县委书记、县苏维埃主席也和大家一样，没有半点特殊。

衣服除了正身用的新布外，托肩、衬边，口袋一律用旧布。特别是裤头，一概用旧布代替。大家宁愿自己穿单盖薄，把烂衣烂裤捐献出来，交给公家统一使用。

这样，新旧布结合使用，每套能节约出来三、四尺布，新布不够的困难，就解决了。剩下的碎布条布头，我们也舍不得丢掉。它是打草鞋的好原料。当时，养成了一种“寸布不闲、分纱必用”的好风气。”

当年，邓小平的主食，常常是

稀粥加青菜，吃餐面条或是赣南米粉，像是过年一般。他吃红薯，从不剥皮，还风趣地宣称：“红薯皮营养高，吃了不怕风吹浪打，丢了太可惜！”

主政瑞金有口皆碑 邓小平的前程却坎坷

1932年5月，邓小平被告知：调离瑞金，到偏远的会昌，去接替古柏担任会昌县委书记。

从苏区京都到边地，无疑是邓小平政治生涯的一次转折。倘若说，1933年的反“江西的罗明路线”，是邓小平政治生涯的第一次磨难、第一次打击，那么，此番变动，就是第一次政治打击的前奏。

早在3月间，苏区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曾派团检查瑞金工作。3月29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出了《检查瑞金工作的决议》。

《决议》除肯定瑞金“统一财政”、“肃反纠偏”、“扩大红军”及“选举运动”等工作“进步的地方”外，对瑞金工作给予非常严厉的批评、指责。

《决议》认为，“瑞金工作虽然有以上进步，但是工作转变上很不够的，过去在工作上发生很多严重错误，没有彻底消灭，反而有很多继续下去”。

“对于土地法的执行不彻底”：“对于中农的侵犯，特别严重”“执行优待红军条例，极不积极”……

中央的不满意、不信任，昭然若揭、由来已久。

邓小平只得向继任者胡荣佳及县苏维埃代主席危辉春移交工作，和远在180里外于都任职县委书记的夫人金维映告别。

（责任编辑：刘家驹）

叱咤风云的黄埔女兵

●舒云

成立女兵队

黄埔军校还是中国女兵的母校，中国第一支女兵队就诞生在这里。

人大常委副委员长许德珩当时是黄埔军校的政治教官，他说：“妇女穿上军装，背上长枪，接受军训，驰骋于疆场，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的。”

徐向前在1987年5月曾经为第一批女兵题词：

武汉中央政治学校女生队是中国民主革命中一支坚强队伍，妇女解放运动的模范。

徐帅在这里提到的武汉中央政治学校就是黄埔军校。

现在，当女兵早不再是新鲜事，而在当时，那该是一件怎样伟大的创举啊！

那是发生在1926年9月的事情，北伐军攻克了武昌，火热的革命中心从广州移到了武汉，黄埔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分校第五期的政治大队、炮兵大队和工兵大队迁到武汉后，开始招考第六期的学员。政治总教官兼教育计划委员会主任、共产党人恽代英，和代理校长、国民党左派邓演达决定同时招考一批女生，成立女兵队。校址选在武昌两湖书院。

招考委员会也成立了，委员有郭沫若、董必武等15人。报考资格是中学毕业或同等学力。除派人专

门到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招考外，还悄悄去了北洋军阀统治的上海、河南以及当时还叫奉天的东北等地秘密招生。先由各地国民党党部负责初试，科目是三民主义、国文、数学、中外史地、博物和理化。合格者到武汉复试，复试主要是国文、政治常识和身体检查。

聂荣臻元帅的夫人张瑞华在报考军校前是河南信阳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因为她积极参加反日救国的游行，学校扬言要开除她，正在呆不下去时，北伐军打到武汉了，张瑞华来到武汉，考取了军校，从此她开始了女兵的生活。

湖南考生闹事

在毛泽东家乡湖南，一个省就密密麻麻地报名了三千人。而招生的人数全国总共才100人，后来湖南省党部将通过初试的人数定为300。就是这样，一个湖南省比全国招生的人数还多了三倍，报名和初试录取的人数之比还是十比一。这300名幸运考生，好多人还是逃了婚冲破了千难万险绝了后路跑来的，却没想还要通过复试刷下一大批人。她们谁都怕落第，一串连，就联合成立了反对复试委员会。集体到汉口军事委员会请愿，要求无条件全部录取。事情闹大了，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当时任湖南省党部负责人的何叔衡专门赶到武汉调处。最后招考委员会决定取消带

头闹事的考生资格，其余的人全部参加复试。由于湖南考生这么一闹，成绩也确实好，就比原定招收100名多增加了83名。

湖南考生陶桓馥，在上军校前是很进步的岳阳女子职业学校的教导主任，毕业于湖南稻田女子师范学校。在女生队里她担任班长。另一个湖南考生黄静议，父亲是中国同盟会的老会员，她在家乡就入了团，当时她才15岁，初中还没有上完，几何三角也都没有学完，考物理时连照相原理也答不上。一气之下，她在考卷上写了这么几句话：我是来考军事政治学校的，为什么出这个题？她被通知参加复试了。为了过体重这一关，他在口袋里装了好几块石头。她的同学有拿书本顶重量的，也有拿大红雨伞顶重量的。

对于落榜生怎么办？军事委员会认为，前来报考的考生都是优秀青年，淘汰回去太可惜。在女兵队录取结束后，特意开办了一个临时政治训练班。还有一部分考生被军委所属的南湖学兵团录取了。

抱着孩子来的考生

在四川考生中，有以后全国闻名的女英雄赵一曼，还有一个女英雄叫游曦，她出生于四川巴县的一个织布匠家中，七岁由亲友资助上了学，在女子第二师范加入了共青团，在重庆各界女子联合会中担任



谢冰莹在写《新从军日记》(1937年)

了职务。1926年，她从《新蜀报》中看到招生广告，动员女二师的同学报考。家中本想让她成家，她说她要革命成功才考虑这事，毅然走了。母亲塞给她两块大洋，这是她们最后的一次见面。到军校后给母亲寄了一张穿军装的照片。这张照片流传了下来。是黄鹤楼照相馆拍的，游曦穿着整齐的军装，扎着宽宽的腰带，脚蹬长筒皮靴，很有军人的风度。来自四川江津的女生队指导员钟复光，报名时已经怀孕七八个月，她埋怨爱人施存亮。施存亮是广州中山大学和黄埔军校农讲所的教官，恰巧组织上分配他到武汉军校当政治教官，组织上同意钟复光也一同去，这样她才当上了女兵。

在来报考的女生中，还真有一个抱着孩子来投考的。她叫王亦侠，是山西临汾女子高级小学校长，在当时，这是一个很有地位又令人羡慕的职务。在她生下第一个孩子后听说了军校招生的消息，她抱着孩子就去报名了，一时轰动了

军校。当上女兵后，她第一件事就是去安排孩子。天主教堂可以要，但孩子不再属于任何人，必须从此信上帝。母亲参加了革命，孩子倒成了小天主教，这不行。王亦侠最后把孩子送给了一个洋车夫。

参加了中央红军长征的女兵危拱之，是冲破了很多阻力才考入军校的。她喜欢文艺，给女兵队这个新的集体带来了

紧张中的活跃。

在考生中，不仅遇到了社会的阻力，还遇到了家庭的阻力。施祖谦的父母坚决不让她上军校，让她考文学院。施祖谦不听，父母就把她关了起来。眼看报名截止的时间就剩最后一天了，同学黄幼玉给她出了一个主意：同意去考女子师范。这样父母才放了她，一出屋门就由不得谁了。施祖谦和黄幼玉都考上了军校。

很快，上海的《申报》、四川的《国民公报》等刊载了女兵队招生揭晓的消息。四川考生中第一名是重庆女子第二师范学生陈德芸，第二名是北大在校生邓铭芳。但是，女兵队录取的原则主要是看政治倾向。徐向前夫人黄杰，回忆起考女兵队时说：录取似乎并不太看重分数，和我同桌的一位考生是大学生，她落榜了，而16岁的我却幸运地录取了，其实我的作文才写了108个字。当时参加女兵队复试的主要是青年学生和一部分地下党选送的基层妇女干部。黄杰不在此

列，她只是一个普通女学生，她是凭着坎坷的经历取胜的。她生在一个大户人家，父亲早死，母亲改嫁，她的童年生活动荡不安，她渴望自由，不肯缠足，反对包办婚姻，母亲支持她离家出走武汉，并把自己首饰给她作了路费。考卷中作文的题目是《革命与进化之区别》，黄杰答得特别精彩，她说革命是人为的，进化是自然的。到了揭榜时，她迟迟不敢去看，因为比她文化高的都落榜了。后来硬着头皮去了，老远就看见了她的名字，找到试卷，上面没有分数，教官在试卷上批了“孺子可教”四个字。为什么她能答得如此正确？因为黄杰在家乡江陵时，邻居是一位进步的教授，曾经给她讲过三民主义，黄杰记在心里了。至于数学一共八道题，她只做出了两道，然后就发愣。后面的考生看她不会，就主动扔过来卷子让她抄，她没干。这让监考教师发现了，取消了后面同学的考试资格。直到现在，她也不知道她后面的考生是男是女，因为考场上男女混坐。几十年来一直觉得挺对不起坐在她后面的那位考生的。

军校的女生队经过闪电般的报名、体检、复试，张榜，终于在1927年1月正式开学了。军校专门为新入学的学生举行了开学典礼，还举行了相当隆重的阅兵。

黄埔六期女兵队成立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斯大林的耳朵里，女兵队成立一个月后，他派鲍罗廷专门来武汉参观女兵队，并与女兵合影。这张照片后来送到了斯大林手里。

女兵发军装是很有意思的。特务长也就是现在称呼的事务主任洪英，北伐时她拉着邓演达的车门要当兵，就这样跟来了。她管理200人的军服，弄得乱七八糟。发军服是在操场上，每人一双草鞋，一个

军用水壶，一个军用饭盒，饭盒中有一个浅格子当菜盘。还发了一根红白蓝三色编成的带子，牺牲时带在脖子上用的。操场上吵翻了天，还是有好多人军服不合适。张瑞华个子小，又瘦，却领到了一个又肥又大的军装，跟袍子一样，都把她整个套进去了。除了最高的邱纪文、严毓华和游曦外，几乎没有人的军装合身，洪英就叫大家自由调换，实在不行再到办公室去换。你换给我，我换给你，搞得办公室成了个大废品站。

湖南籍女兵谢冰莹后来写道：从此，我们不再是浪漫的小姐。脱了皮衣，换上太大的衣服，戴上斗笠一样的帽子，穿上从来没穿过的袜子和黑球鞋，打上绑腿，浑身冰冰冷，足像个演木偶戏的。20分钟后，互相看看，我们都成了勇敢的精神抖擞的丘八了。

刚穿上军装的女兵剪着短短的头和男兵们一样，很是英姿。

说起剪头发，这是她们印象中最深的一件事。有的女生不等走进军校，就在旅馆里急急忙忙地找理发师剪成了短短的陆军头——马桶盖。还有就是校棱头或者披式头。更有意思的是一个湖南来的小个子女兵名叫黎树蓉，她坐在第一排，进教室后脱帽，给教官一个青亮亮的光头。

严格的军人生活

女兵中共产党员占了三分之一。

衣食住行，一切从头开始。女兵宿舍是四通间的大寝室，每行八张铺，一共四行。行与行之间只有一尺宽的过道。铺是破旧的板子，上面一床灰毯子当褥子，再铺上一律的白床单，床单下一张纸也不许放。盖被很薄，白天要叠成豆腐状，

还有一个小小的白枕头。屋檐下是一字长蛇样的洗脸架，牙刷的毛要一律向下，毛巾要求叠整齐。日用品都要规范定位，睡觉时也不能乱。衣服要叠好放在枕头右边，军帽放在一侧，绑腿卷成卷放在军帽上。熄灯号一响就睡觉，禁止说笑。早上起床十分钟就要到操场上参加早操，不少女兵时间不够，只好提前起床，洗好脸，刷好牙。早操前要着装检查，早操点名都要一站出来亮相。迟到了就不能入列。

食堂门口两行铁着脸的大字：军令如山，党纪似铁。吃饭是六个人一桌，一声命令，同时拿起筷子，十分钟后同时放下筷子，不管吃完没吃完。中午晚上还稍好一些，早上最糟糕，稀饭烫得吃一头大汗还吃不完，只好放下筷子。有一位湖南女兵彭文，有胃病，吃快了就胃痛。头几天老是吃不饱，又禁止吃零食，大运动量的训练给饿得前胸贴脊梁。军校的伙食是不错的，四菜一汤，大米饭，节假日还可以吃到一两个好菜。

平时不许穿自己的衣服，就是下雨换上花袄也要受批评。星期天上午整理内务卫生，擦枪，下午可以请假外出会客，但四点以前一定要归队。逾时不归队要罚岗两小时，严重者还要关禁闭。有一位名叫陈德芸的女兵符号掉了，被代校长邓演达罚了两天禁闭。还有两名女兵仅仅因为头发长就被开除了。

军校刚搬来武汉，没有桌椅，也没有固定课堂，上课时教官就站在一张桌子上讲，学生们则站在周围听。以政治课为主，主要是妇女解放读物、社会发展史以及《共产党宣言》等书。女兵队的军事课是很令人羡慕的，她们上过《步

兵操典》、《射击教范》、《军中勤务令》等等，还进行各种操练，并学习指挥作战的本领。

谢冰莹和《女兵日记》

曾经身临其境的湖南女兵谢冰莹，在行军途中写过颇有影响的《从军日记》，发表在武汉的《中央日报》副刊上，一时轰动，也从此有了“女兵”这个名词。

这一年冬天她被母亲逼着出嫁，她决定要离开长沙的家。身无分文，又带着一颗从小受伤的心，上哪里去呢？真是老天有眼，突然有了军校女兵队，不管家里反对还是支持，都是要去的，因为那是黑暗中的曙光啊。

谢冰莹写道：实际上，当兵是为找一条出路。扛起枪以后，才把国民革命、建立富强中国的担子放在了自己的肩上。

但是，每一个投考军校的女孩子都不会想到，军校的生活如扑头盖脸的冰水扑灭了她们粉红色的



赵一曼

向往。如遭禁闭一样，校门口两扇大铁门把她们美丽的青春牢牢地关在里边，一个月准外出一次，其余的时间都在大铁门里边。

这种日子怎么熬过去呢？

谢冰莹绘声绘色讲了她自己的一件事：

寂静的午夜，我从梆梆的更声中惊醒过来，睁开眼一看，淡淡的月光照着满室都是白花花的一片，完全像躺在医院里一般寂静凄凉，由各人的鼻孔和嘴里发出来的鼾声织成了夜的交响曲。我不能再睡了，想到再过几个钟头，我们就要拿着枪杆、操着一二三四了。“兵”，这一个多么有力的字！我们要怎样的努力才能承担起改造社会的责任，才能根本铲除封建势力呢？一个人到了太快乐或太兴奋的时候，他往往会整晚上失眠的，钻进我脑海中来的那些美丽而无穷的希望像无数颗火星似地在围着我跳舞，要不是在夜里，我真要狂呼跳跃起来。

隔床的同学也醒了，她听见我打哈欠，忙用轻微的声音问我：你知道现在几点钟了？快要起来吧？

快了，响过三点了呢。

起初是我们两人说话，接着醒着的人渐渐加多。于是，大家索性都爬起来，为了害怕十分钟内不能把衣服穿好、整铺、打绑腿、洗脸。所以不到十分钟全都跑到草坪上去了。在才四点的黑夜中，像一大堆黑黑的钉子，把走过来查岗的连长吓了好大一跳。……

女兵的生活就是这样新奇而又紧张。

这里没有什么适应不适应的，仿佛从老百姓到军人的距离她们一下子就跨过去了。也许这是因为她们本来就是中国妇女中最优秀的分子。不过我觉得这似乎是女孩

子的本性，上进心强得不得了，常常是让人分不清是上进心还是虚荣心，尤其是一群女孩子集中在一起，那更是互相之间你追我赶，谁都怕落后，谁都想最好。再说，每一个进军校的女兵都是有一番甜酸苦辣的经历的，既然百里挑一进了军校怎能不好上还要更好呢？与女兵一同入军校的男兵发了长枪，女兵们就不要照顾的短枪，连那些个子太矮还没有枪高的女兵也要求发长枪。早上跑步，穿着军用黑袜子的女兵中有缠过足的，她们却一声不吭，坚持不掉队，和男兵一样完成早操。当时军校为照顾女兵有一个规定，月经的头一两天可以不出操，但要在胳膊上系一根红带子，站在队外。为了不系红带子，不站在队外，女兵几乎没有人去管什么月经不月经的，该跑多远还是跑多远。就是后来行军打仗中，女兵也是一样爬山涉水，有时河水中常常漂出一缕一缕的血红来，不知道的男兵以为女兵负伤了。那时的女兵都是一个心眼，不能让人家说妇女不行，我们就是要和男兵一样。

也有当逃兵的。军校招生时有个别女生过了一关又一关，却怕体检时解衣服听诊半路逃掉了，也有个别人在入了军校后受不了紧张的生活开了小差。按当时的军令，开小差是要枪毙的。因为招生时注重了政治质量，所以绝大多数女兵坚持了下来。

她们走上战斗的历程

按照教学计划，女兵队是要学习一年的，没有想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军校召开了声讨蒋介石的大会，女生队抽了两个班背着上了刺刀的长枪，参加了纠察。

1927年4月，国民革命军准备第二次北伐，参加救护队的女兵代

表在誓师会上表示：现在正是我们完成使命的时候，愿以滴滴鲜血与性命去换取胜利。不杀尽敌人，誓不回武汉见革命民众。湖北省妇女部、省妇女协会专门绣给她们两面锦旗，上面是八个字：杀尽敌人，革命先锋。誓师会后，部分负责巡逻宣传救护的女兵坐着闷罐车就上了战场。晚上睡在车厢的稻草里，天特别热，女兵们又穿得多，汗一堆一堆地往下流，实在难受了，只好到老乡家里打盆水擦一擦。女兵们这才体会到，这是战争了。到了前线，男兵队已经和敌人接上了火，女兵们勇敢地冲到前线去抢救伤员。

一个月后，女兵队带着胜利的战果回到武汉，湖北省妇女协会又送给她们一面锦旗，称她们“开历史新纪元”。

不久形势进一步恶化，女兵队和男兵队一样，不得不提前毕业，每人发了一张黄埔军校的毕业证书。恽代英在毕业典礼上说：武汉形势一天比一天恶劣，军校就要结束了，你们有家的可以回家，没有家可回的，就随着部队一起走。希望每一个同志都是一粒革命的种子，不论搬到哪里，都能发芽、开花、结果。

男兵组织了教导团，由叶剑英率领上了前线。不愿意离开军队的女兵也要求上前线。当时女兵有三个去处，愿意回家的给予资助，有很少一部分去苏联学习，还有一部分人分到部队。当时部队是往南方行军，这次是硬碰硬地打仗了，因此动员女兵尽量留下。有一个叫杨柏珩的女兵不想留下，支部书记说你去找周恩来，他同意你就跟着走。杨柏珩中饭也没吃，就去找周恩来了。她进教室时，周恩来正站在凳子上大声讲话：……都要求跟部队走，要知道，武汉也要留人嘛，

组织上留下的同志请你们好好想想，安心留下。到部队留地方都是为了革命，这是革命纪律……杨柏珩没有听完，转身往回跑，哭着留了下来。

黎树蓉是幸运的，她和另外10名女兵分到了去九江的十一军政治部，换上了带红十字的白色护士服，负责救护。那天她在一座小城外三面大松林的寺庙边上背着枪巡逻，看见前面来了20多个懒洋洋的背枪人，她估计那是一群逃兵，问口令，也不回答，还往前走。她又高声问了一句，那群人终于站住了。也许是连日来的战斗，再加上她平时嗓子粗，对方一时没有听出来是个女兵。黎树蓉说：把枪放下，要想活就把枪原地架起来。黎树蓉又说：不缴枪，我就叫大部队出来打死你们。那一群人看黎树蓉把哨子放在嘴上要吹，就一个个倒背着枪，鱼贯着成一行垂头走过来，做了年轻女兵的俘虏。

女兵队引为自豪的烈士游曦，在千里行军到广州的途中担任了配属第一营的女兵班班长。本来在广州起义中她们班是作为预备队留在团部的，因为情况恶化，她和女兵班赶到长堤上阻击敌人，三天三夜与比自己多数十倍的敌人对抗，子弹不多了，又与指挥部失去了联系。游曦派战士回去报告，说只要剩下一个人，就不让红旗倒下。最后和敌人开始了肉搏，刺刀弯了，她和女兵们全部牺牲了。牺牲时她才19岁。

女兵队有近30名女兵参加了南昌起义，大都担任机要、交通、救护。女兵彭文回忆说：那时她们参加南昌起义，主要是写标语和在前敌委员会担任通信联络。撤出南昌之后，有两个月的行军作战。有十来个女兵们跟着朱德往广东走，每天急行军七八十里山路，没有一个

掉队的，如男兵一样行军。有一位眼睛近视的女兵，晚上行军就用竹竿探路，往往一天一夜就走100多里地。到了宿营地，晚上露营时很冷，女兵就挤在一起互相取暖，路上买不到卫生纸，好多女兵任月经血自流，内裤板一样的硬，两条腿全磨破了。除了行军打仗，女兵和男兵一样外，到了宿营地，女兵还要用笔用嘴宣传群众，还要救护伤员。周恩来对女兵极为赞赏。路上朱德曾动员徒手的女兵离队，说保存革命力量，每人发20块现大洋。动员了又动员，才有几个女兵离队，其余的都坚持了下来。

聂帅夫人的浪漫婚姻

聂帅夫人张瑞华赶到南昌时已经是起义后的第三天了。大家都在准备后撤，她们就随叶剑英的教导团到了广州，参加了广州起义。她说，那时也不知道害怕，捉拿反动分子，她就站在车厢外面的踏板处，任风呼呼地吹。女兵们不少人参加了广州起义中的巷战。张瑞华和一批女兵到了教导团军医处参加救护。后来广州起义失败后有20多个女兵随军到了海陆丰，继续战斗。张瑞华在广州起义失败后和组织上失去了联系，也未能及时撤出广州，幸好一位参加过省港大罢工的，也是共产党员的老海员把她掩护下来。老海员叫她把军装埋起来，换上他妻子的衣服，藏了三天，同组织上取得了联系，送她到了香港。这以后，张瑞华在省委作地下交通员，往各个机关送文件，就是在这段时间，她和在广东省委当军委书记的聂荣臻认识了。有一天，他顺路拐到一个秘密交通点，正好看见张瑞华在分捡文件。张瑞华也抬头看了穿着黑灰色西服梳着偏分头的聂荣臻一眼，没有说

话，但她以前见过他讲课。知道是自己人。

“我找你谈谈可以吗？”聂荣臻腼腆地问。

“我现在没时间。”张瑞华说完才注意到聂荣臻通红的脸，就又补充了一句，“我现在要到九龙送文件，隔一天行不行？”

不过张瑞华还是没有多想，聂荣臻作为军委负责人，找她谈话还能有什么，还不是工作呗。

聂荣臻只说了两个字：“可以。”就走了。

几天以后，张瑞华已经把这件事忘在脑后了，聂荣臻悄悄地来了，正好房间里只有张瑞华一个人。

“我在武汉军校就见过你。”聂荣臻说。这回他没有吞吞吐吐，而是开门见山，很干脆。“我对你印象很深，我想跟你好。”

张瑞华那时还不到20岁，从来没有接触过恋爱，闹了个大红脸，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我……我考虑一下吧。”

聂荣臻满意地走了。

张瑞华并不记得在武汉时见过聂荣臻，但她知道聂荣臻在军校担任过教官。肯定来过武汉军校。但能从一两百个女兵中认出并记住小个子的张瑞华，也很不简单，这大概是因为张瑞华在女兵队中担任班长经常喊队打旗子的缘故。不过无论如何，这使张瑞华很感动。几天后，张瑞华把自己小小的包袱搬到了聂荣臻的房间里，两个人就算结了婚。

周恩来出差回来，聂荣臻对他说：“我和张瑞华结婚了。”

周恩来很高兴，说：“一块吃顿饭吧。”

这样，算补了一个结婚仪式。

（责任编辑：刘文）

百岁老人



孙越崎

● 孙本尧

孙越崎今年102岁，曾任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委员长、经济部部长。解放后，他历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计划局副局长，河北省政协副主席，煤炭工业部顾问，对外经济贸易部和进出口管理委员会的特邀顾问，民革中央副主席，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等职务。

这位经历了世事沧桑的老人，给我谈起他的百年往事。他是浙江绍兴人，他的祖父识字不多，只会记帐，守着父亲百余亩水田和山林。父亲在黑龙江省当过县长。1913年，孙越崎从绍兴简易师范毕业后，考入上海复旦公学。后又到天津北洋大学和北京大学学习。工作几年后，他到美国斯坦福大学深造。

孙越崎说：年青时，我很幼稚，以为辛亥革命推翻腐败无能的清政府，中国从此就会好起来。但是，

袁世凯窃国，军阀混战，依然是国无宁日，民不聊生。使我感到非常气愤和失望。为了铭志，表达对国家和民族前途的忧虑，希望国家早日能够越崎岖而达康庄，我在上海复旦公学上学时，将原来的名字孙毓麒改为孙越崎。

1919年“五四运动”，在天津北洋大学采矿系二年级上学的孙越崎，以学生会会长身份带领本校和天津14所大中学校近万名师生集会游行。作为四名学生代表之一，他参加了同河北省省长曹锐（军阀曹锟之弟）的谈判，取得了胜利。

孙越崎因为积极参加“五四”运动被学校开除，遂转到蔡元培任校长的北京大学学习。毕业后，他曾到东北的穆稜煤矿工作几年。1929年8月，已经36岁的孙越崎决定到美国斯坦福大学深造，专攻矿业。临行前，他在复旦公学的老

师邵力子对他说：“出去要好好学习，学成以后，一定要报效祖国！”孙越崎回答：“先生放心，一定不辜负期望！”

孙越崎说：北伐战争后，我认为国家总该进行和平建设了，但事与愿违，国民党政府的专制、腐败并不逊于北洋政府。抗日战争爆发，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关头。那时我和千千万万爱国知识分子一样，心中只有一个愿望：早日打败日本侵略者，重建祖国，振兴中华。抗日战争胜利后，严酷的现实再次使我失望了，我体会到，继续追随国民党，是没有出路的。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国家才能强盛，个人才有前途。因此，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毅然决定脱离国民党阵营，投向人民。

孙越崎深有感触地说：“我目睹了半个多世纪的分裂和苦难，看到共产党终于把中国统一起来

了！”

孙老向我谈起他的办矿事业。1924年初，他不顾家里劝阻，冒着纷飞的大雪，到黑龙江穆稜勘探开发煤矿。他在那里工作五年多，到1929年穆稜煤矿已成为北满唯一一座比较现代化的大矿，年产量达到30余万吨。

孙越崎加入国防设计委员会后，与严爽等人在1933年9月赴陕北找油。当时，他的老师邵力子正任陕西省省长，对他到陕北找油非常欢迎。孙越崎等人在延长县西门外勘探出了油。

1934年，整理中福公司的重任落到了孙越崎肩上。1935年产量达到130·9吨。中福煤矿转亏为盈。后来，孙越老被聘为中福公司总经理。

1941年甘肃油矿局在重庆成立，孙越崎被任命为总经理。在他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下，玉门油矿创办仅一年就实现了生产180万加仑的目标。一座石油城奇迹般地出现在中国大西北的戈壁滩上。孙越崎当时写了一首诗：“关外荒漠接远天，出关人道泪不干，移沙运土植杨柳，引得春风到油田。”孙越崎是我国石油工业的创始人之一。

1948年5月，孙越崎担任了国民党行政院政务委员兼资源委员会委员长。当时，他利用在东北视察的机会，指示一些厂矿要“坚守岗位，保护财产，迎接解放，办理移交”。

这年10月，孙越崎利用国民党社会部在南京召开全国工业总会成立大会的机会，召开一次各厂矿负责人秘密会议，他在会上说：“我们这些人，都是学工程技术的，都是怀着工业救国的理想，资源委员会现有的工矿企业，是中国仅有的一点工业基础，我们有责任把它们保存下来。我相信，共产党将来

也是一样要建设中国的。资源委员会的产业办理移交后，共产党建国搞工业，一定会用我们的。”

资源委员会拥有121个总公司和总机构，下有生产单位上千个，以及研究、勘测及服务性事业单位若干个。资委会职员32800多人，其中40%以上是大学毕业的技术和管理人才，从国外留学回来的高级人才有3000多人。资源委员会的高层领导和各个厂矿的负责人，绝大多数受过西方现代教育，有着强烈的爱国理想。

1948年12月的一天，蒋介石召见孙越崎，命令他立即把南京电照厂，南京有线电厂、南京电瓷厂、南京无线电厂、马鞍山机械厂五个厂，立即拆迁到台湾去。但是，孙越崎却巧妙地把南京五厂留了下来，把蒋介石拨给南京五厂的拆建专款，移作五厂扩建的资金。后来，这五个工厂中四个发展成为新中国电子工业的基础厂。

孙越老欣慰地说：“国民党政府从大陆败退台湾前夕，我拒绝了蒋介石的多次命令，冒着生命危险，动员和率领三万多名技术人员、约70万员工集体投向共产党，使近一千个重工业企业、矿山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大批科技人才留在大陆，成为新中国经济建设的骨干。”

解放不久，陈毅在上海说：“蒋家王朝已经垮台，所有伪单位纷纷南迁逃往台湾，伪中央部、会一级中、只有资源委员会所有人员，包括各级负责人，以及在已解放地区所属各厂矿企业员工及设备器材，



孙越崎带领技术人员和工人在陕北延长县打出第一口油井

几乎未走一人，几乎未有一点破坏，实在是伪中央文职机构中的一个全体员工起义的团体！”

孙越崎还谈到这样一件事：1965年李宗仁先生回国，他特意从唐山赶到北京看望。李宗仁问及当年蒋介石企图迁台的那些工厂，知道留在大陆了很高兴。他对李宗仁在事隔多年后还记得这批工厂感到奇怪。李宗仁说：“我当年飞离南京前给汤恩伯打过电话，嘱咐他这是内战，希望他不要毁掉南京，他答应了，我才放心飞走的。这和你当年不肯迁厂去台是一样的心情，所以还总记着。”

解放后，孙越崎积极投入了建设新中国的行列。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他为中央财经委员会计划局副局长。1952年7月，又调任唐山开滦煤矿总管理处第三副主任。

1959年以后，由于不难以理解的原因，他不得不停止工作。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伟大祖国开始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1980年，孙越崎在全国政协五届三次会议上被选为常委。1981年，煤炭部请孙越崎担任顾问。1983年，他又被选为民革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第六届委员会常委兼经济建设组组长，同时还担任了对外经济贸易部特邀顾问和进出口管理委员会特邀顾问。

已是耄耋之人的孙越崎，报效祖国的雄心壮志犹在：

1983年8月，他到内蒙古东胜煤田和包头钢铁公司调查，建议包钢改革管理体制，实行钢煤电联营。

1983年底，他到华北油田、河北蔚县煤矿调查，建议在蔚县煤矿建坑口煤气厂，用管道把煤气直送北京，以解决北京的需要。

1984年3月，他和戎子和等到重庆调查，建议调整我国的运输结构，让铁路、公路、航空、水运、管道协调发展。

1984年秋天，他到深圳、珠海

特区调查，对加速特区建设提出了很好的建议。

进入八十年代，三峡水利工程兴建与否，重又成为全国人民关注的热点问题。这个国民经济中举足轻重的超大型项目，开工前必须进行科学论证。已是92岁的孙越崎带领10人调查组，沿长江实地调查，历时38天。他于7月份回到北京后，不顾天气炎热，很快写出调查报告，上报中央。1990年3月，孙越崎以97岁高龄，在中南海会议室里作了引人注目的发言，并提交了一份亲笔撰写的三万字意见书。

孙越老还对当前经济建设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经济要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强调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是很对的。但是，现在发展速度太快，有点拔苗助长的感觉。发展速度太快了，形成的弊端会很多，时间长了要改过来就很困难，结果会欲速则不达。在这方面我们要注意学习国内外的经验，保持清醒的头脑。

他谈到，他与台湾的陈立夫先生是同学，与台湾的前“行政院

长”孙运璿先生、“政务委员”李国鼎先生、“经济部长”赵耀东先生等人，都曾在资源委员会中共过事。1988年10月和1990年12月，孙越崎曾两次去香港，通过电话和台湾的老朋友、老部下联系，共叙旧情，以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进程。他说：“我真盼有生之年能与现居台湾的老朋友、老同事、老部下再见一面。”

1992年3月16日，江泽民总书记请孙越崎到中南海共进晚餐。江总书记谈到：资源委员会的人员在全国解放前夕拒迁台湾，护厂护产，保存了大批物资，的确为国家做出了很大贡献。

1993年10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和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部长王兆国受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国务院总理李鹏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委托，为孙越崎祝贺百岁寿辰。

江泽民曾问孙越崎：“孙越老，您长我30多岁，是老前辈了。您已经是百岁高龄身体仍这么好，一定有养生之道了？”孙越崎笑着说：“不敢当，说不上有什么养生之道。”据了解，他长寿之道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性格开朗，为人大度；二是争强好胜，勤于锻炼；三是饮食规律，不暴饮暴食；四是家庭幸福和睦。孙越老的家庭生活十分温馨。他经常高兴地与夫人说：“我们还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儿呢？”看着孩子们为人正派、生活幸福、事业有成，两位老人有说不出的欣喜。他在国内有两儿一女，都享受国务院颁发的特殊贡献津贴，孙子、孙女、外孙也都很争气。

友人送给孙越老一帧条幅：“长命岂止百岁，理应花甲双轮，陈迹塞北江南，一生艰险堪惊。今日康庄大道，更加复发青春！”

（责任编辑 方实）



1994年，孙越崎（中）在新年团拜会上

名将粟裕大战淮海



● 诸 辛

战线南移

淮海战役刚揭开帷幕，南线战场的战略决战就开始了。

驻在山东曲阜孔府大院内的华东野战军前线指挥部，由华野代司令员、代政委粟裕和华野副参谋长张震率领，南移临沂。

这天是1948年11月6日，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深深地留在粟裕的记忆里。因为他已接到中央军委毛主席发来的命令，要求“华野11月7日或8日的晚间，在各处同时发起攻击，给敌人造成淮海战场处处是解放军主力的假象，使他们各怀惶恐，不敢互援，以利于迅速割歼黄百韬”兵团。电文上还画着四个“A”字。对于这份绝密的加急电报，粟司令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在这场规模空前的战役发动之前，毛主席又授与他这个“锦囊妙计”，他怎能遗忘呢？为了赶赴攻击

出发地全线投入战斗，他决定6日开始行动。

前指的车队风驰电掣地驶上宽阔的公路，沿途村镇的乡亲父老，早已在村头、路口搭起一座座青翠的柏枝牌楼。上面贴着“欢迎华野大军光荣南征”十个大字，两边还贴着“旗开得胜”“马到成功”的对子。锣鼓相迎，茶水相送。公路上还出现一队队民工，吱吱的独轮车队，驮着粮食的毛驴队，扛着绳床的担架队，还有肩挑人抬的运粮队，打着“全力以赴、支援前线”的小旗子，川流不息地奔向前方，几乎把公路都堵塞了！看到群众热烈支前的情景，粟裕微笑着眯上了眼，心里默默地赞叹：有老解放区做依托，打赢这场大仗，就多了一分把握。

“粟司令，你是不是休息一会，睡一觉。”张震在一旁悄声地说。

粟裕闭着眼摇了摇头。

“闭目养养神也好嘛！”张震知

道司令员的性格，仗一打响，一天睡三、四个钟点那是常事。

粟裕真的闭目养起神来，但是脑子里思绪奔腾起伏。早在九月济南战役结束之前，中央军委就要求华野筹划下一步在淮海作战的设想。粟裕和参谋长陈士榘、张震以及司令部同志研究，拟定了最初的设想：先占海州、连云港，控制陇海线东段，后占两淮（即淮阴、淮安），打开华中粮仓，然后，进击徐蚌段，孤立徐州，相机夺取。这个设想很快得中野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的全力支持，还提出一些中野与华野协同作战的建议。

十月初，在曲阜孔林召开了华野前委扩大会，陈毅专诚赶来，传达中央九月会议精神。现在西自陇海线西段的商邱，东到连云港、海州，三百余公里的战线上，已部署好华野16个纵队。津浦线以西中野的7个纵队，也先后集结。军用地图上已画出一个个红色的箭头，

指向向蚌蚌地区……

粟裕睁开了眼，看看车窗外，部队正以急行军的速度向南急进，仿佛是一个个红色的箭头幻化而成。

七日晚，他们刚进驻郟城马头，就连续接到九纵司令员聂凤智的紧急报告：“敌黄百韬兵团所属各部，已于7日晨撤离新安镇，我纵已命令各部向西猛追。”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情况，粟裕立即把这重要的敌情变化报告中央军委及中野刘、邓、陈首长。并且作了追击合围的部署，发布了政治动员令，要求部队“不怕疲劳，不怕困难，不怕伤亡，不怕打乱建制，不为河流所阻，敌人跑到哪里，坚决追到哪里。全歼黄兵团，活捉黄百韬。”

命令一下，陇海线两侧，运河桥头，立即掀起了猛追猛打逃敌的激流狂涛。

在运河桥头

追上去，追上去！不让敌人喘息！看敌人逃跑了，敌人溃退了……

部队每天以180里急速追击逃敌，华野“前指”也卷入向西追击的洪流。

“停车！”粟裕突然招呼司机。

车刚停稳，他一步跨下车来，警卫人员也纷纷跳下了车。

“注意枪声！”粟裕对警卫人员提示说。对于枪声，他似乎有异于常人的敏感。

“粟司令，我看这运河方向传来的枪声，是我们部队和敌人接上火啦！”一个警卫战士判断说。

枪声已越来越清晰、越稠密。其间还有迫击炮弹和炸药包的爆炸声。

“敌人的尾巴被我们抓住啦！”

警卫班长叫喊起来。

粟裕赞许地微微一笑，他兴奋地叫道：“快，上车！”

西去运河途中，到处都是敌人溃逃时狼狈的景象。运河车站及运河桥头堡，敌人留下一个团掩护西撤，被我八纵一举歼灭，运河桥口尸横遍地，血腥味呛人口鼻。吉普车因尸首堵塞道路，开不过去，粟裕和张震干脆下车步行。警卫班长忙递上风镜、口罩，让他们戴上。

看到运河桥口拥挤堵塞部队追击受阻，粟裕深深感到：在这里延误一分钟，都会给逃到西岸的敌人多一个喘息的机会。他决定在运河桥头开一个紧急会议。

决心一下，“前指”就设在运河桥头路基南侧的一块平地上。警卫人员放出警戒，通信人员用步谈机召来就近各纵队领导。他们在地面上围坐了一圈，粟裕立即指示，组织部队搬运尸体，扑灭桥上的火焰，铺好枕木、桥板，使大部队、汽车、大炮、坦克以至支前民工能有秩序地安全通过。有条件架设舟桥的，要迅速分派人员筹集船只、门板、器材，动员当地干部、船工尽快架设，使能通过骡马、炮车、轻重武器、辐重粮食，多箭头地抢渡，他再一次强调争取每一分钟时间的必要性，一定要趁敌人立足未稳的有利时机，尾追拦截，迅速将敌合围，决不可失掉这个战机。

这个闪电式的会议刚完，粟裕收到一份电报：“三绥靖区副司令官张克侠、何基洋率部二万三千余人，在台儿庄贾汪地区举行战场起义”。

“这一下，徐州东北大门敞开，刘峙在徐州更要慌成一团了。我山东兵团十、七、十三纵，可以畅通无阻地南进，抢渡运河，腰斩陇海线。吃掉黄百韬兵团大有希望了。”张震兴高采烈地说。

粟裕不由得也舒心地笑了。

图一点牵动全局

当粟裕得知十、七、十三纵已顺利通过起义部队防区，越过运河、不老河，猛扑陇海线时，他急令“前指”移至曹八集附近的山下大队，这里离正在围歼黄百韬的四十四师的战场仅几公里。刚住下，粟裕带上望远镜独自一人爬上山头，用望远镜观察山下圩子里的战斗。

这几天，各部队都在抢渡运河，从东面、北面、东南面几个方面与敌接上了火，形成逐渐合围的态势，粟裕最关心的是“门”有没有关死。这事关系战役全局。他怀着急不可待的心情，举着望远镜向四周眺望：碾庄圩地区已沉浸夜色之中，不时有照明弹和篝火在闪耀。他听得见圩子里人叫马嘶，夜暗中，枪声，炮弹爆炸声不停地震撼着夜空。看来龟缩在圩内的敌人已无还手之力了。他放心了：合围态势形成，曹八集指日可下。

此时，一张新标的敌我态势图展现在粟裕面前，许多原来插蓝旗的城镇，已为红旗所替代，各纵的胜利捷报雪片似的飞来……

——华野三纵、两广纵队在张公店地区歼敌181师，解放商邱、碭山。

——中野主力在宿县以北歼敌孙元良兵团之122师一部，俘敌三千。

——鲁中南纵队攻克郟城，歼敌土顽王张九部五千余人。

华野一纵在窑湾全歼敌黄百韬兵团六十三军。

身在徐州剿总的司令官刘峙，一夕数惊，生怕我军兵临城下，便急令敌十三兵团李弥退守徐州，借以自保。连西撤至碾庄的黄百韬，

也弃之不顾了。黄百韬兵团现已被围在东西不到10里、南北不到6里的碾庄圩地区。蒋介石走马换将，让杜聿明星夜赶赴徐州，率领邱、李二个兵团东援解围。而且急令在河南驻马店的黄维兵团日夜兼程驰援。围一“点”而牵动全局，淮海战役规模越打越大，蒋介石把老本都拿出来了。

与此同时，随黄维兵团东援，刘伯承也从豫西“前指”赶到豫东，与邓小平、陈毅会合。“截断津浦铁路，攻占宿县，斩断敌人中枢，阻敌北援南窜，减轻敌向东增援的压力。”

信心百倍的粟裕在给中央的电报中说：“我们在此次战役歼灭黄兵团之后，不必以主力向两淮进攻，而以主力转向徐（州）固（镇）线出击，抑留敌人于徐州及其周围。今后分别削弱或逐渐歼灭之。为此，在战役第一阶段的同时，应即以一部破坏徐蚌线，以阻敌南运。”这份电报，立即得中央军委、毛主席的重视。9日就电复粟裕、张震：“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其主力，勿使南窜。”

围住一个“点”，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敌我双方都在短促的时间里，调整了部署，中央军委宣布成立淮海战役总前委，由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谭震林5人组成，邓小平任总前委书记。

“围黄打援”

毛泽东担心粟裕的安全，电告他：“华野指挥位置太靠前，应立即后撤。”粟裕不得不从曹八集附近的山下大队，后撤十余里，到土山镇的火神庙。也许是多年养成的职业习惯，养成一听到枪炮响，他总恨不得亲自前去看一看。就是转移到火神庙之前，他还无不惋惜地再

一次上山观察曹八集的战斗情况。山下的村子已变得宁静了。部队正在圩子里打扫战场，俘虏们列队向后方走去。显然，曹八集战斗已胜利结束，“截敌包围”已成为现实。现在他来到火神庙，这里离前线远了，粟裕无可奈何地看看大殿上端坐着的火神爷，不禁在心里也笑起来：“这会儿要和火神爷做伴了。”

曹八集枪炮声刚刚停下。淮海南线宿县城楼上又战火纷飞，而徐州以东的阻击线上，敌调集5个军的兵力，已备20架飞机，一百多辆坦克，一百多门重炮，从12日开始，摆出“为党国存亡在此一举”的架势，气势汹汹地向东猛攻。杜聿明、邱清泉等亲自上阵督战。

粟裕白天在作战室里，有时守着电话机，有时托腮在椅子上沉思，到了夜晚，干脆点起大红蜡烛，把地图铺在大殿的供桌上，手拿着红蓝铅笔，在图上找寻几易其手的小村庄……

警卫班长提起马蹄表，用手指指，催他休息去。

“我不困，你们先睡。”

“明天还要指挥呢！”

“今晚前方打得紧，我得守着。”

警卫班长知道执拗不过他，忙给他冲了杯热咖啡。粟裕喝着热咖



粟裕在淮海前线

啡又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粟裕指挥部队连续三四天顽强地阻滞敌人，使杜聿明“一周会师解围”的“乐观估计”成了泡影。

此时，苏北兵团已直逼徐州东南郊敌人侧翼，矛头指向徐州重要的空中补给地——徐州机场。在大军声威的威慑下，敌一〇七军孙良诚部一个多师投诚，残部二六〇师在大王集被歼。在津浦线徐蚌段军事重镇宿县传来喜讯，中野三纵，九纵在华野三纵，两广纵队及炮兵的支持配合下，激战4天，攻克宿县，截断徐州与蚌埠间的陆上交通，关死了敌人南逃的大门，完成了对徐州的战略包围，造成对我极为有利的形势。就在这喜气洋溢、令人高兴的时刻，警卫班长出现在作战室门口，粟裕抬头看了一眼，

问道：“有什么事吧？”

“我们想见缝插针，开个党小组会。不知你能不能参加？”

警卫班班长是党小组长，粟裕满口应承说：“党小组开会，自然要参加的。”

在警卫班的宿舍，大家相围对坐。从发起战役以来，快十来天了。有好多话要说。“我来提一点，那次上山观察敌情，粟裕同志没有说一声就自个走了，害得我们好找了一阵子。”另一个战士说：“粟裕同志一打仗，老不睡觉。一、二天坚持一下还好说，时间一长，连续作战怎么能行？……”党小组长也郑重其事地发了言：“据我看，粟裕同志在军事指挥上极端负责，这一点大家都没得说的。不睡觉，熬瘦身子事小，影响指挥，事就大了。以后外出上山看地形，作社会调查，给我们说一下，也帮助我们完成警卫任务。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中肯的批评，粟裕感到温暖、亲切：“大家对我有帮助、有鼓励，我虚心接受。”

“再来一个打得好”

无论是追击也好，合围也好，还是“正面阻击”，“侧翼突击”，凡与“围歼黄百韬”这个作战目标相联系的，都牵动着粟裕每一根神经。短短十几天，他曾经焦虑、担心、兴奋、呕沥心血地沉思，经历了喜怒哀乐种种心态。事实上“吃掉”黄百韬兵团，并不像吃豆腐，不然，为什么在围歼初期，华野的四纵、六纵、八纵、九纵、十三纵的领导，都打得不大顺手，甚至有不少伤亡呢？14日晚上，参加围歼部队各纵队司令都到会了，还有华野副政委谭震林，参谋长陈士渠、张

震、特纵司令员和山东兵团副司令员王建安都赶来参加了。会议一直开到12点，各纵队汇报了部队在准确的位置及当面的敌情。有的检讨了攻坚受挫原因。

粟裕看大家七嘴八舌地谈论着，歼敌的决心、信心却丝毫没有动摇、减退，他趁势说：“大家倒说说看，这一坨坨人马，用什么办法才能吃掉它。”于是，大家的思绪被引到“吃”黄百韬这个方向来了。有的说：“要层层剥皮，逐村逐点，一口一口吃掉。”有的主张：“敌人最怕夜战、近战，我们要发扬夜老虎精神。”还有的找出毛主席的有关批示：“对战斗力顽强之敌，不是依靠急袭，而是依靠充分的侦察和技术准备去取得成功。”“夜战、近战，近迫作业，插入敌村庄，大胆分割，逐点争夺，各个歼灭……”会议开得热气腾腾，它不像情况汇报会，也不是战斗中的思想检讨会，倒是战术研究会了。粟裕看看表将近半夜，便将事先研究好的决定，向大家宣布：由副政委谭震林，山东兵团副司令王建安，统一指挥围歼黄兵团的战斗。

围歼战在会后迅速展开，部队日夜进行近迫作业，天亮一看，有的战壕已挖至离敌堑壕只有十来米远了。从15日到18日，4天之内包围圈缩小了一半，敌一〇〇军、四十四军全部被歼。

包围圈里的敌人已岌岌可危，朝不保夕。杜聿明、邱清泉把守徐州城的七十二军和战车团送到大许家一带，眼望碾庄圩不过三四十里之遥，就是“可望而不可及”！蒋介石在给刘、杜的电文中大为发火：“……我军每日进展不及一公里，如此消耗浪费，不计成效，是我革命军人的奇耻大辱。”

围歼黄百韬兵团总攻击开始了。

1948年11月19日上午10时，粟裕下令说：“总攻开始，炮火急袭30分钟。”

瞬间，大地在剧烈地颤抖，浓烟在碾庄及其周围的村庄升起，冲锋号声中，八纵战士在碾庄南面撕开两个口子，九纵在西南角圩壕中涉水攻坚，尽管壕水有一米多深，三米多宽，炮弹、手榴弹在壕里激起一个个水柱，战士们前赴后继冲进碾庄，冲进黄百韬的兵团部。

这时，粟裕仍然在前指作战室椅子上坐着，从总攻开始到现在，他没有离开过作战室，时时刻刻都在听取逐村逐点攻击的战况。他确实太劳累了，眼皮都似乎不想抬一抬了。

副参谋长张震，带着振奋、激动的神情，来到粟裕身边，轻轻地对他说：“粟司令，谭震林、王建安来电话说，歼灭黄百韬兵团的战斗结束了！”

“啊！结束了！”粟裕在心里叫道，他多么想振臂欢呼，那知刚站起，一阵头晕目眩，使他又沉重地坐在椅子上。张震急忙招呼警卫人员扶他上床休息。直到晚上，一觉醒来，听听碾庄方向枪炮声已经停息，张震忙告诉他：“歼灭黄百韬兵团的战斗已圆满结束。连东援大许家的敌人，也怕被‘吃掉’，仓皇西撤了。”

粟裕这时候才觉得肚子有点饿了，警卫员忙端来为他熬的鸡汤，用餐毕，精神立即振奋起来，变得有说有笑。他对张震说：“咱们开个茶话会，庆祝一下，怎么样？”

张震说：“好嘛，把缴获的巧克力拿来，慰劳慰劳大家。”

（责任编辑：刘文）

西府战役失利时的彭德怀

● 李敏杰 朱光亚

1948年4月13日，西北野战军在旬邑县马栏镇杨波头村召开前委扩大会议。野战军政治部部长兼联络部长的范明，为这次会议做了精心的筹备。范明1933年曾就读于上海复旦大学，主修中文和哲学。彭总非常器重他的才干和文采，说他是军中翰林，喜欢叫他范大人。当时的形势是：宜川瓦子街战役虽取得胜利，胡宗南仍占领延安、洛川一线，中央决定把战争引向国统区去，调动敌人，寻机歼敌。

会上，彭总提出要大踏步前进，出击西府，去逮胡宗南的“宝鸡”。他风趣地说：我是阎王老子开饭店，平日鬼都不上门。可决定重大的战役行动，要发扬军事民主，万万马虎不得。

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兼西北野战军副政委的习仲勋，在军事民主会上强调说：去捉“宝鸡”，困难很大，要采取长途奔袭的办法，出奇不意，抓一把就走。西北野战军副司令员赵寿山说：打宝鸡我没啥意见，但是作为战役的各级指挥员，不要过于乐观。因为我们是从小胡、马之间的夹缝里打出去，陷得太深了，有很大的冒险性！会议最后决定：立即举行西府战役，相机夺取宝鸡。

西府，是指西安以西泾渭之间的广阔地区，它的中心为盛产西凤酒的风翔，西头是铁路公路交会的工业重镇宝鸡。4月26日凌晨8

时，西北野战军第一、二纵一举攻克宝鸡，全歼守敌，缴获的军火物资堆积如山，这是西北解放战争中缴获最多、最丰富的一次。

西北野战军出击西府，第一阶段就攻克10多座县城，歼敌2000余人，并击毙胡宗南“四大金刚”之一的七十三师中将师长徐保。据说胡宗南在西安专门为在宜川、瓦子街战役中被我军打死的刘戡、严明以及徐保三个中将开了个追悼会，西安的学生把这三个人姓名编成一幅对联送到会上：上联是“刘戡戡内乱内乱未戡身先死”；下联为“徐保保宝鸡宝鸡未保命已亡。”横批是“纪律严明”。这是人民群众对蒋介石、胡宗南反共反人民最妙的讽刺。这次打开宝鸡的缴获不仅解决了参战部队的穿衣、吃饭问题，更重要的是在战略上起到了调虎离山的作用。4月21日胡宗南自动撤出占领了一年一月又三天的延安，在国内外的政治影响甚为重大。但是战役的最后一阶段，在我军攻克宝鸡以后，由于对敌人实力估计不足，没料到胡宗南仍能迅速集结十余个旅的兵力，分4路驰援宝鸡。更没料到矛盾深重的胡宗南和马步芳竟能联手夹击我军，此刻，西北野战军正面临一场恶战。

面对大兵压境的严峻形势，彭总于4月28日在千阳县任家湾召开军事会议，他向各纵队领导通报了敌我态势，估计胡宗南主要目的

是夺回宝鸡。我军决定立即撤出宝鸡，躲开胡军，伺机打击青海马步芳部队。

宝鸡真不愧为胡宗南的后方补给基地，整窑洞、整车皮、整仓库的武器装备及粮食、布匹，应有尽有。8月29日子时，胡军已逼近宝鸡，撤退时间太仓促，这么多宝贵物资搬不走，实在可惜。范明在如山的物资中穿来穿去，指挥部队搬运、转移，实在搬不走的，准备连同军火库、兵工厂一起炸毁。

在这个火烧眉毛的节骨眼上，野战军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副主任张德生一行匆匆赶来。见了范明，一向总是乐呵呵的甘主任急燎燎地说：“范部长，转移时间到了，快走！快走！物资不要分配了，带不走的就地销毁！”

范明立即和甘主任、张副主任一起匆匆赶到离宝鸡市区15华里的马家山，彭总的指挥所就设在那里。这时，彭总身边只有一个警卫班，再没有其它部队。当甘泗淇、张德生和范明走进屋时，彭总背着手站在炕下，正在给秘书、参谋口授电报，屋内空气肃穆而紧张。彭总口授完电报，转身见了他们仨，便说：“胡宗同10个旅的兵力倾巢驰援宝鸡，敌人行动非常迅速，据侦察员报告离我们已经很近了。”

彭总的话刚落音，村子里突然枪声大作，不一会儿，警卫战士进来报告，敌人进村了。彭总像没听



1948年4月彭德怀在陕西省马栏向部队作进军西府的动员报告

见似的，对甘泗淇说：“甘主任，张宗逊副司令在二纵，你去一纵吧，情况很紧急，敌我双方搅在一起，万一互相联络不通，要发扬各自为战的精神。”

甘泗淇答应了一声，带上警卫员走了。临出门，回过头来说：“彭总，现在情况不同一般，你要注意安全。”

彭总挥了挥手。这时，枪声越来越密，越来越近，范明沉不住气了，走到彭总面前急促地说：“彭总，这里不能待了，快走！”

彭总不加理睬，仍然对参谋人员口授电报。他一口气授了4份命令部队撤退的电报。这时，村子里脚步声杂杂沓沓，连敌人说脏话的声音都听见了。不一会儿，隔壁院子被敌人占领，张德生连忙催促：“彭总，再不能耽误，不然就要当俘虏了！”

彭总走到门口，侧着耳朵听了听。这时，天近黄昏，暮色朦胧，村巷里人喊马叫，到处响着砸门声。彭总一边穿着衣服，一边嘟哝着：“要死的可以，活的没有！”把手枪提在手里，朝外就走。

彭总走在前面，张德生和范明紧随在后，在警卫班和工作人员的簇拥下，从后门悄悄走出，借着暮

色掩护，从敌人的窝窝里从从容容地溜了出去。当他们走出四五华里，回头望了望，见在夜色笼罩下的马家山已经模糊不辨时，大家才松了一口气。此时彭总竟轻轻地哼起京剧《薛平贵回窑》：一马离了西凉界，青是山，绿是水，花花世界。……

不久，范明他们在前边一个小村庄遇见了野司直属部队一个连，彭总命令这个连和指挥部一起行动。直到这时，范明心里才稍稍踏实下来，心想：手头有了这个连的兵力，即使碰上敌人，也可以抵挡一阵子。

据这个连队的同志介绍，现在周围都被敌人占领，此地不能久留。于是，他们顺着小铁道继续往北走。走了不大一会儿，张德生突然发觉彭总的夫人浦安修没有跟上来，便向彭总提出派人回头去找，彭总气呼呼地说：“这堂客，找她做么子！不要管！”

张德生将范明拉到路边，说：“范明，安修同志掉队了，你回头去找一下吧，要不惜一切代价找她回来！”

“好，我就去！”范明说罢，带了一个骑兵班，循着原路往回走。这时，一路经过的村子均被敌人占

领，幸亏夜黑如漆，才没有被敌人发现。他们往回走了约15华里，离宝鸡市区已经不远了，正走着，忽见对面影影绰绰有个人骑着牲口走来。他们一个包抄围了上去，那人和牲口站住不动了，范明提着手枪走上前，凑近一看，竟然就是浦安修。

浦安修见了范明像见了亲人似的，哽咽着问道：“范部长，是你们呀！好危险，四处都是敌人！要是不逮着这匹骡子，我就让敌人抓住啦！老彭呢？他怎么样，现在在哪里？”

“彭总很好，在前面等你哩！我们离开马家山时，隔壁院子都住进了敌人，走得急急忙忙，没顾得上清点人员，把你拉下了，实在对不起！”

范明让一个战士把马换给浦安修骑，他们快马加鞭往回赶，跑了一个小时，追上了彭总。彭总瞪了浦安修一眼，一句安慰的话也没说，部队仍摸黑前进。

第二天又是急行军，黄昏时分，他们来到一个叫太平镇的小集寨。一天一夜他们只吃了一点自带的干粮，这会儿又累又饿，正准备宿营做饭吃，镇子西头“咕咕咕”机关枪像炒豆子似的响起来，原来是

追击的敌人赶上来了。警卫部队立即迎上去组织抵抗，掩护彭总从东门撤退。

彭总、张德生和范明一行撤出东门，只见边区民众剧团的男女演员们，正在路旁山坡上边煮麦粒边往嘴里填。彭总上去抓了把也填到嘴里，他一边嚼着麦粒，一边对身旁的范明说：“范大人，敌人就要追过来了，娃娃们呆在这里很危险，你去给剧团的领导说一声，要他们赶快往北撤。”

范明找到剧团团长，传达了彭总的指示。剧团的同志马上收拾锅碗，将煮熟的麦粒一人分了一碗，边吃边走。警卫员给彭总牵来马，彭总深情地望着一个一瘸一拐的小演员们，说：“你把马给剧团送去，让走不动的娃娃骑。”

警卫员不肯去，彭总吼了起来：“去呀，乱弹琴！”

范明知道彭总的脾气，说一不二，便向警卫员噘了噘嘴，警卫员嘴里嘟哝着走了。

彭总站在一个高土堆上，望着民众剧团的同志走得不见影儿了，才转过身来对通信员说：“通知警卫连甩开敌人，后撤。我们也出发！”

范明他们往北又走了三天，追敌就像蝗虫似的一直跟在后面扑来。一次敌机出现在上空，轮番俯冲扫射，警卫人员为彭总的安全操心，拉他去隐蔽处躲一躲，彭总不愿离开，发火说：“怕什么！子弹千发万发，不会专门打我彭德怀！”

7天7夜的突围，范明他们来到第一纵队，和野战军主力部队汇合，总算脱离了险境。

5月7日，彭总安全回到野战军司令部机关。

野司机关进入边区，同志们都不约而同地长长地松了口气，经过这些天的奔波、跋涉，大家都很累

劳，然而此刻大家的精神却异常振奋，有人甚至轻轻地哼起：“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彭总的心情显然也好了，黑黢黢的脸上挂着微笑，走着，走着，他突然回过头来叫唤范明。范明从后面赶了上来，彭总笑眯眯地说：“范大人，你知道为将之道吧？”

在突围的这些日子里，彭总的脸色一直很阴沉，从来没和他们开过玩笑。范明发着愣，不知彭总提出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一时竟不知如何回答。

“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奔于后而面不移，骤然临之而不惧，无故加诸而不怒，斯可以为将矣！”彭总摇头晃脑地吟诵着，生怕范明不清楚，接着又一个字一个字地给他解释了一番。

范明认真地听着、听着，恍然大悟：这几句话不正是这次西府突围最好的总结吗！不正是彭总临危不惧、指挥若定的大将风度的真实写照吗！

西北野战军部队回到解放区以后，集结到黄龙、韩城一带休整，野司则于5月26日，在洛川县土基镇召开前委扩大会议，总结西府、陇东战役的经验教训。彭总在会上两次作了自我批评。他说，我军撤出宝鸡以后，部队搞得很疲劳、狼狈，六纵遭受了严重损失，纵和野司机关东撤受阻，身陷险境（这次战役，西北野战军损失兵力达1.49万人，其中伤亡6566人，失散、被俘、逃亡8407人）。彭总说：“我们在战役指导上犯了若干错误和缺点，特别是我应负主要责任。”

他当那么多人的面，用手指着自己的额头，沉痛地说：“彭德怀呀彭德怀，马列主义就是没有学通，一格一格的，只看到胡、马两家的

矛盾，就没有重视胡、马两家在反革命方面的一致性……”

在若干年后的十年动乱中，彭老总也直言不讳地对这次攻打宝鸡做了自我批评（见《彭德怀自述》）。

对于此次战役中部队暴露出的问题，彭总也毫不客气，他严厉地批评了有的部队在阻援时不坚决，致使野战军主力以至野司领导机关陷入被动；有的部队在担任警戒时不打招呼就擅自撤走，让敌人钻了空子。严厉批评不执行命令的干部是“严重的犯罪行为，该砍脑袋！”

习仲勋在会上强调：对很不正派，品质恶劣，个人英雄主义的人取掉几个有什么不好，要撤职，下决心割掉这块烂肉。

西府之战个别干部表现不好，有些部队吃了亏，但西北野战军广大指战员尽职尽责，无私无畏，勇往直前，浴血奋战，是立了大功的。对彭总的严厉批评有些领导接受不了。为了帮助这些同志正确对待批评，参加会议的林伯渠说：“你们知道彭总为什么叫‘德怀’吗？有一句古话，叫做‘有威可畏，有德可怀。’彭总正是这样的人！你们不要光看到他严厉，有威可畏的一面，同时，要看到他有德可怀的一面，他的‘威’正是‘德’的一部分。你们愈是了解他，受到他的批评愈多，也就愈能深刻地感受到这一点。德怀，德怀，有德可怀哪！”

赵寿山副司令员也在大会上发言说：彭总能打大胜仗，也能打好败仗，他化险为夷，转危为安，是真正的大将军！

范明自始至终参加了这次会议。通过前后近一个月的西府之战和这次会议，他更加清楚地认识了彭德怀。

（责任编辑：刘 文）



“板荡识
忠贞”

——记顿星云将军

● 杨肇林

顿星云是一员战将，1955年9月2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为将军们授衔的时候，特别叫出他加以赞许，授予他海军中将军衔。顿星云诚惶诚恐，看到一些原是他的上级也是授予中将，他感到不安，连声对自己说：“我怎么能授中将呢？我怎么够呢？”

顿星云是打出来的将军。作家杜鹏程依据顿星云带领独立4旅在陕北“三战三捷”的事迹，创作了小说《保卫延安》，风靡全国；著名教育家成仿吾在回忆录中，记述了顿星云带领一个团掩护陕北公学通过日军封锁线的惊心动魄的情景。1949年，是他率先头部队，神速地推进到南疆喀什边境；从无到有的海军航空兵第一任司令员就是顿星云……像“淬火”一样，他还在无数次党内斗争中，身经百

炼！

古语说：“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贞”。

—

1931年起，“左”倾路线的代表夏曦在湘鄂西苏区连续搞了四次“肃反”，特别是在1933年3月24日的金果坪会议上，他说“改组派占据了党、苏维埃、青年团、工会以及红军的政治机关”，于是悍然决定解散党、团组织和苏维埃，把认为是“改组派”的地方苏维埃主席、党委书记和军队干部，编成“主席连”、“改组派连”，甚至把爱提意见的战士也单独编成“调皮捣蛋连”。

顿星云被派到红九师二十五团2连当连长，这是一个“主席连”，这些原来的地方干部不会打仗，又不被信任，却要他们担负最

艰险的战斗任务。

一次，顿星云率领这个“主席连”，干脆利落地打掉了支保安队。

军指挥部听说“主席连”打掉了保安队，要追查。原来这个镇上的保安队同我军有联系，于是认定顿星云是个改组派，有意破坏，不由分说地把顿星云捆绑起来带到军部关押。

审讯者不顾顿星云的说明，宣布说：“你们九师师长段德昌是改组派头子，被我们处决了，九师政委宋盘铭也是改组派，也抓起来了，他口供说段德昌介绍你加入了改组派。”

在前一段“肃反”中，顿星云眼看着周逸群、段玉林、段德昌，那么多有大贡献的同志都被毫不留情地杀了，现在轮到自己了，是祸

躲不脱，纵有一百张嘴也难以辩白，他只是倔强地说：“我不是改组派。”

顿星云被罚做苦工，抬担架，宿营时，双手还被反背着用铁丝捆起来，还经常遭毒打。顿星云想起邝继勋军长被当作反革命处死以后，他的夫人仍然把孩子送来当红军，愤怒地吼道：“只要打不死老子，老子还是要干革命！”有一回，那些人竟一锄头把他打得昏死过去，丢在猪栏里不管不顾。半夜里，部队出发，他们用棍子拨了拨顿星云，没有反应，以为他死了，丢下他便走了。

顿星云醒转来，红军已经远去。老乡用盐水帮他洗了伤口，劝他留下来，顿星云直埋怨自己睡得太死，耽误了随部队出发，他向老乡说：“谢谢你们救了我，我活了一天，就会记住你们。我是红军，我要去赶自己的部队。”

顿星云找到了部队，又回到了苦工队。

夏曦带领红七师单独活动后，贺龙才做主释放了红九师政委宋盘铭。顿星云等也被释放，被派到军部当了一名副官。

红军失去了根据地，四处游击，最苦的是无处安置伤员。一天，贺龙把顿星云喊到跟前说：“交给你一个任务，带上我的信和三百大洋，去龙山寨找那里的头人，就说我贺龙拜托他照管几个受伤的弟兄。他要不买帐，你就说我贺龙随后就到。”

顿星云知道贺老总的的话在这一带是“飞灵”的，便说：“我带着这么多钱，两手空空，连根打狗棍都没有，担心碰到民团或是一个要钱不要命的家伙……”

贺龙拿了个手榴弹来给了顿星云。

顿星云来到龙山寨。百丈陡岩

上有石砌的碉堡。

顿星云仰头喊道：“我是贺龙派来送信的，要见你们头人！”

过了一会儿，从半山石洞口吊下一只箩筐，上面的人叫道：“先把信放在箩筐里，你在下面等着。”

过了一会儿，箩筐再次吊下来，上面的人喊道：“你坐在箩筐里上来。”

进到洞里，十几支火把轰烈燃烧，一群壮汉举着明晃晃的砍刀围着他。顿星云恭谨地说：“贺龙军长派我来拜望你，这里是三百块银洋，不成敬意。”

头人客气地说：“要贺龙军长破费，何事要得呢？”

顿星云向他摆谈红军最近情况，要他们关照，并晓以利害，笑着说：“水流山不转，国民党的兵是流水，红军好比这搬不倒的山呀！”

顿星云就是这样多次带着更多的银元、金条去办这种交涉，这些“山大王”，有的听了贺龙的威名、立即折服；有的却随着反动派力量的消长，看眼色行事。顿星云总有办法使他们解除顾虑，帮助红军。那一带山寨流传着“贺龙的副官浑身是胆”的故事。

不久，洪湖根据地失去了，部队流动游击，困难重重。

顿星云重又担任连长，带领红三军七师十九团3连，在四川边界向贵州乌江边上的沿河活动。

一次，在渡河时，顿星云被冲散了，他带着一个战士找部队。两个人身无分文，露宿树林，靠打短工换顿饭吃，沿途还把失散的红军组织起来，为了生活他们分头打工或者学手艺。顿星云在走村串户做木工的时候，宣传红军，到处撒播

中央军委副主席张震手书

革命种子，组织起几个游击小组。

经历了五个月的艰辛，顿星云终于在龙山慈爱堂找到了红军。贺龙见到顿星云，高兴地大喊：“顿星云，你还活着呀！”

顿星云详细报告了五个月来寻找部队的经过，贺龙点头说：“我料到你顿星云只要不死，早晚一定会回来的！”

长征开始，顿星云担任六师十六团团长的。

长征结束，顿星云进入保安红军大学第二期学习。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红二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一二〇师，顿星云任三五八旅七一五团副团长，进军山西，配合国民党军进

行忻口战役。

1938年7月，为了粉碎日军“清剿”，顿星云奉命率领七一四团进到太原附近作战，破坏铁路、公路、桥梁、电线，袭击敌人据点，伏击火车、汽车。日军驻太原山冈师团参谋长吉野，率领一个中队出城“清剿”，顿星云组织伏击，一举击毙吉野，歼灭了这一个中队的日军。

1941年，顿星云被选为出席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代表，在资格审查中，有人提出他因沿河战斗离开部队五个月的经历需要证实，贺龙、关向应说：“如果顿星云要跑的话，早在这之前就跑了！”

二

1959年庐山会议，错误地把直言批评“大跃进”的彭德怀等定为“军事俱乐部”成员，随后在全党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

为了罗织罪名，甚至连小说《保卫延安》也被拿来说是顿星云吹捧彭德怀的证据。1947年3月，胡宗南30万人马进犯延安，顿星

云奉命带领新组建的独立四旅，渡过黄河，星夜赶到陕北参加保卫党中央的战斗。作家杜鹏程当年曾经随这支部队活动，据此创作了《保卫延安》。作品中塑造的旅长陈兴允这一形象就是顿星云。笔者当年在海军航空兵工作，组织过《保卫延安》读书会，应大家的要求，几次请顿星云出席讲一讲保卫延安的战斗，他说：“小说塑造的是文学形象，不是真人真事。”

五十年代，海军航空兵初建，顿星云组织部队在东南沿海上空积极作战，取得重大胜利，夺得了海上制空权。1958年春节当天还在山东半岛上空击落国民党空军的美国最新制造的RB-57高空侦察机。

1962年1月，党中央召开有七千人参加的中央扩大工作会议，会中，海军的领导谈到对顿星云的“批判”是错了，贺龙起来讲话说：“与其说顿星云是彭德怀分子的话，倒不如说他是贺龙分子！”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

始，贺龙遭了殃，他那句“与其说顿星云是彭德怀分子，倒不如说他是贺龙分子”话，给顿星云定了调子。其时，顿星云已调任军委装甲兵副司令员。

1967年，秋风萧瑟，落叶飘零。北京西郊军委装甲兵司令部门口，来了一个农民，要求见顿星云副司令员，门卫紧张地报告专案组，两个人急忙出来，严加盘问：“你是干什么的？和顿星云是什么关系？找他干什么？”

农民坦然回答说：“我是公社社员，我来看我们老旅长！”

专案组的人再三四盘查，最后只得挥挥手说：“你走吧，不让见他不在！”

这个农民却不肯离去，蹲在路边盯着营门，他想，等到下班时候总可以等到老首长出来。从刚才那两个说话的神气，联想到大街上各种“揪出、炮轰、打倒”的传言，不见老旅长一面，他更不放心。

还是顿星云的夫人魏逸玲把他劝阻了。

那农民只好听从，又说道：老首长遭难，孩子们也就成了‘可教育的子女’了，要上山下乡的您就让他们上我们家乡去，我们那里老乡只要听说是顿旅长的孩子，不会亏待他们的！”

后来，他果然把顿星云的几个孩子接到了他们那里。

1973年，顿星云经历了多年折磨后恢复了自由，他第一件想做的事就是去河北农村看望这个老战友。

顿星云感慨说：“大难不死，永远不要忘了人民！每一次遭难，都是靠了人民搭救，才能九死一生。革命就像唐僧西天取经，不经过九九八十一回磨难，炼不成‘火眼金睛’，成不了‘正果’！”

（责任编辑：刘文）



1950年向新疆进军时的顿星云（左1）

台湾，

血脉之源在大陆

● 田 珏

今年1月30日，在中华民族传统佳节(乙亥年春节)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发表了《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重要讲话。这个讲话表达了海峡两岸人民盼统一的心声。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也是宝岛台湾光复50周年。回顾台湾的历史，我们看到台湾人民和大陆人民同是中华民族儿女，血肉相连；在漫长的岁月中创造了共同的文化传统，有共同的历史命运。

地缘一脉相承

每逢天气晴朗，万里无云的日子，人们站在福建沿岸东望，可以隐约看到台湾岛上的秀丽景色。根据地质学家研究，台湾本来是大陆的一部分，是以大陆为根生成的一个岛屿。在悠久的历史中，华夏古陆常发生“沧海桑田”的变化。在地质学家所谓“造山运动”作用下，早在两亿多年前的“古生代”晚期，台湾从海底隆起而成为一个海岛。两亿年来，台湾几经变迁，有时和大陆相连，有时又似乎成了海岛。到了“中生代”(2.2亿年前~6500万年前)时期，台湾发生了剧烈的地壳变动，完全陆化，和大陆

连成一片。由于河谷侵蚀、海水上升和地盘凹陷，距今约5000年前后，才形成接近目前状态的台湾海峡。从100万年前开始的“更新世”(又叫大冰河时代)以来，每次冰期，台湾必和大陆相连。每次间冰期，台湾海峡就被淹没。可见，台湾与大陆在地缘上是不可分的。由陆地变成的波澜壮阔的台湾海峡，平均水深只有80公尺左右。从福建平潭到台湾新竹之间最窄处，只有130公里。民间流传的谚语说：“福州鸡鸣，基隆可听”。虽然有点夸张，但它说明了台湾和大陆有不可分离的地势。台湾近年的地盘运动，使得西部出现约5万公顷的海埔新生地。可以预期，等不到第五冰期的来临，台湾将又和大陆连在一起。

相同的史前文化

在台湾的考古发现证明，台湾与大陆有相同的史前文化。台湾已知最古老的人类“左镇人”来自大陆，最古老的文化“长滨文化”根柢也在大陆。1970年在台南县发现3万年前的“左镇人”头骨化石。“左镇人”与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同属旧石器时代后期的人类，有着“堂兄弟”关系。20多年前在台东县长滨乡发现的距今约

1.5万年前至5千年之间的“长滨文化”，说明台湾在第四冰期同大陆相连的时候，已经是旧石器时代后期人类活动的场所了。“长滨文化”的石器制法与同时代的北京周口店遗址旧石器的制法相似，其类型和制作技术同大陆南部一些旧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石器相近，其“祖籍”即大陆。“左镇人”和“长滨文化”的主人，为旧石器人类，是经由华南进入台湾地区，可以视作台湾少数民族的先民。

考古发现还证明，台湾新石器时代的“大坌坑文化”、“圆山文化”、“凤鼻头文化”和“卑南文化”等，丰富多采，同大陆东南的古文化息息相关。在台北县发现的“大坌坑文化”(约1万多年前~公元2500年)是台湾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物中的绳纹陶器，同比它早的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和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的绳纹陶器有不少相同之处，可以说“大坌坑文化”是大陆东南沿海古代文化的一部分。在台北市发现的“圆山文化”(公元前2500年到公元初)遗物中的陶器、石器同大陆东南沿海出土的印纹陶、黑陶、彩陶和有段石镞、有肩石斧有许多相似之处，可能是由大陆东南沿海传过去的。“圆山文化”中曾发现商代两翼式青铜箭镞一件。据考证，为西周至

西汉年间传入台湾，实为华夏文化遗物见诸台湾岛之始。可见远在上古迄秦汉之际，大陆古文化已流播台湾本岛。与“圆山文化”同时的“凤鼻头文化”，以高雄县凤鼻头遗址为代表，遍布台湾中部、南部海岸与河谷地区。“凤鼻头文化”早期（公元前2500~公元前1500年左右）为印纹红陶文化，其陶器同大陆“大汶口文化”、“马家浜文化”相类似。中期（公元前1500年~公元初）为素面和刻纹黑陶文化，同福建闽侯县石山遗址出土文物相似。它说明早在公元前1500年到公元初，台湾和大陆东南沿海已经有密切联系，往来频繁，在文化生活上有很多共同特征。晚期（公元初~十六七世纪）遗物丰富，出土物以方格灰纹、黑陶片为主。这类文化都是已和汉族接触的平埔人的祖先所创造的。西北部还发现有采矿铸铁的遗存，说明这部分平埔人已经在大陆文化影响下进入铁器时代。

1980年夏秋，台湾考古工作者在台东卑南乡发现台湾至今最

大、最完整的史前遗址。据研究，卑南文物系二三千多年前先民的遗物，其文化特质同大陆南方各省古代的越濮族相似。“台湾省文献委员会”主任委员林衡道先生说：出土文物证明卑南巨石文化源自中国大陆。台湾先住民的祖先崇信家谱、纹身、父子连名、洪水故事等文化特质，也都和中国大陆南方各省的古代越濮族相似。因此，台湾历史文化的根柢在中国大陆，台湾最早的居民直接来自大陆。他们都是中国古代人的子孙，与中华民族有血缘关系，都是一家人。

高山族祖先多来自大陆

根据民族学和人类学研究，台湾土著先民也多来自大陆。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早在1946年写的《台湾番族考》一文中，就根据若干证据指出：台湾的“番族”是古代“百越之族”的支裔。他们和中国东南、西南诸种族以及澎湖、琉球和日本的原始住民在太古时代都是近亲。早在遥远的太古

时代，也许在台湾尚未变成岛屿以前，今日散布在台湾各地的“番族”的祖先，就从中国沿海闽、浙一带进入了台湾。可以这样认为，台湾少数民族的祖先多为我国古代东南沿海的“百越之族”。百越族的一支闽越是大部分台湾少数民族的祖先。

我国古代称东方少数民族为“夷”。汉代和三国的古籍称台湾为“夷洲”，称土著族为“山夷”。隋、唐、宋、元称台湾为“流求”，称土著为“流求土人”。唐代以后，因为贸易或战争的缘故，有少数菲律宾土人和马来人漂流到台湾。宋、元之际，大陆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也不断来台。经过民族同化和融合，到明代，形成“东番夷”。明末清初始称台湾土著为“番族”。清朝统一台湾后，称山地土著族为“高山番”（又叫“生番”），或称“野番”；分布在平地的被称为“平埔番”（又叫“熟番”）。1945年台湾光复后，台湾当局称他们为“高山族”或“山地同胞”、“山胞”。1994年改称为原住民。台湾学术界有人称之为“土著族”或“山地民族”。根据台湾学者的研究，分布在台湾中央山地的泰雅、赛夏、布农、曹、鲁凯、排湾各族，来台较早，可能多直接来自大陆，属大陆东海岸旧文化，即东夷文化系统。分布在东部的阿美、卑南、兰屿的雅美以及平埔的少数民族，现统称为“高山族”。

孙权、隋炀帝、元世祖对台湾的经营

我国最早的一部历史地理书《尚书·禹贡》篇，把四千多年前的中国分为九州。其中的扬州，北到淮河，东到海洋。台湾第一部方志《台湾府志》，便说台湾属于扬州之



郑成功接受荷兰殖民者投降图

域。《汉书·地理志》载：“会稽海外有东鯤人”。有人认定东鯤即台湾。《后汉书》中已有“夷洲”（即台湾）的记载。到了三国时代，吴国的领域包括了会稽和东南沿海。吴主孙权对海外经营很有兴趣，特别是在赤壁之战以后，他的兵力曾远及南洋。据《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记载：吴黄龙二年（公元230年），距今1700多年前，孙权曾派将军卫温、诸葛直统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夷洲”就是台湾。这是大陆经营台湾最早记载，也是大陆汉人最早的一次大规模去台湾。吴国丹阳太守沈莹写的《临海水土志》，第一次具体生动地记述了“夷洲”的自然环境和“山夷”（即今台湾“高山族”的祖先）的风俗民情。

隋统一中国后，历隋、唐、五代、宋、元，从7世纪初到14世纪，大陆称台湾为流求。从唐朝到北宋的500年间，虽然尚未见到有关台湾，以及台湾同大陆关系的正式记载，但从台南等地考古发现的唐、宋古钱和陶器、瓷器等文物看来，可以肯定，大陆和台湾一直保持着经济和文化联系。宋代以后，台湾和大陆的关系日益密切。12世纪初，南宋已在澎湖建造军营，派兵驻防，还把澎湖划归福建泉州晋江县管辖。那时也已经有汉人定居台湾。到了元朝，称台湾为“瑯球”。元世祖在公元1292年和1297年两次派人去台湾。据《元史·东夷列传·瑯球》条记载：瑯球在“漳、泉、兴、福四州界内”，且与澎湖相对。《元史》指出瑯球在“四州界内”，已视台湾为我国版图。据汪大渊《岛夷志略》记载：元至元年间（公元1335~1340年），在澎湖设置巡检司，地隶泉州晋江县。澎湖之设行政机构自此开始。

汪大渊，南昌人，元代大旅行

家。一生中漫游过马来半岛、印度、波斯、阿拉伯等地，最远到了非洲东部，就其见闻写成《岛夷志略》。1353年（至正九年），汪大渊亲来澎湖、台湾，对台澎情况很熟悉。《岛夷志略》澎湖条、瑯球条、毗舍耶条，关于澎湖、台湾的记述，有许多新的材料，都是他“耳目所亲见”，甚至连传说也没有放过。从中不仅可以知道“至元间立巡检司”，而且可以知道那时开发澎湖的以泉州人为主，人多长寿。

明朝对台湾的开发

到了明朝，由于朝廷把注意力放在北方和东北，放松了东南海防，甚至一度撤销澎湖巡检司。但是海峡两岸的文化联系和经济来往，不仅没有停滞，反而有所发展。汉人不断从大陆移居台湾，有很多汉人同土著妇女结婚，开始汉人和当地居民的同化、融合过程。那时的台湾，因早已被视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所以，郑成功在1661年5月初致荷酋揆一招降书中，曾严正指出：“台湾省，中国之土地也，久为贵国所据，今余既来索，则地当归我。”

1601年（万历二十九年），倭寇据台湾为巢穴，出扰海上，商人、渔民深受其害。次年，沈有容将军奉命征讨。1603年1月，大败倭寇。明军在台湾登陆，“东番（即台湾）夷酋扶老携幼，竟以壶浆生鹿”犒师。事毕，沈有容撰写《闽海赠言》一书，多有关台湾之纪事。是役，福建连江人陈第随军来台，撰《东番记》，所记台湾西南部情形，尤为详细。

1603年，荷兰殖民者侵入澎湖，伐木筑屋，准备久留。次年，明都司沈有容率军谕退荷兰提督韦麻郎。事后，澎湖刻建了一座“沈

有容谕退红毛蕃韦麻郎碑”，现存澎湖马公镇的妈祖宫。1622年，荷兰人第二次侵占澎湖，在福建沿海捕捉我渔船600多艘，奴役1500名华人做苦工，筑城堡4座。为防华工逃跑，缚二人为一结，驱使筑城，日食仅给米半磅，华工被虐待饿死者1200多人。剩下278人被运往爪哇做奴隶，途中虐杀病死过半，仅137人到达目的地。野蛮行径与海盗无异。1623年，明廷派大军进攻澎湖，断绝水源。荷军势穷求和退出澎湖，又于1624年占据台湾西南部沿海地区。台湾第一次沦为殖民地。在荷兰殖民者占据台湾的38年（公元1624~1662年）中，西班牙人又占据台湾北部鸡笼（今基隆）、沪尾（今淡水）地区16年（公元1626~1642年）。荷兰、西班牙的占领，一直遭到台湾各族人民的反抗。1652年，郭怀一领导了驱逐荷兰人的大起义，牺牲数千人，但终于失败。

1661年，郑成功率领两万大军入台，在各族人民的响应下，终于赶走了荷兰殖民者。台湾重回祖国怀抱。在郑氏政权统治台湾的22年（公元1661~1683年）中，大陆沿海汉族人民大量移居台湾，带去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不少汉人还同土著居民“牵手成婚”。郑氏政权在台湾实行同大陆一致的官制和典章制度；积极发展生产和对外贸易；又大兴文教，使大陆封建文化深入台湾。台湾逐渐繁盛起来，城市村落也同内地差不多了。台湾在进步，同大陆已经没有多大区别，只是孤悬海外，暂时保持着割据局面。

康熙统一台湾

1683年，清康熙帝派施琅率军攻战澎湖，郑成功的孙子郑克塽

归顺清朝。台湾归清后清政府在台湾设置一府(台湾府)三县(台湾、凤山、诸罗),隶属福建省。台湾在全国政权统一管辖下,依靠大陆丰富的人力、物力支援,经济、文化都得到了发展。清政府对大陆人民去台虽然有严格的限制,但是,由于台湾人口稀少,封建统治薄弱,海峡两岸联系又越来越密切,所以沿海人民还是甘冒禁令,大量迁往台湾,使台湾的开发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康熙、雍正年间,是大陆移民到台湾开垦的极盛时期。清朝统一台湾时,汉族的人口只有10多万,并不比土著族人口多。但是从1684年到1811年的127年间,台湾的人口几乎增加了6倍,平均每20年增加30万人。1811年编查户口时,汉族人口已经增加到200多万,1877年更增加到300多万,比土著人口多20倍。由于清政府禁止携眷入台等原因,移台汉人多为单身男子。他们有的娶土著妇女为妻,有的则入赘女家。

清前期的轻租薄赋政策,有利于台湾的开发和发展。康熙、雍正年间,台湾广阔的北部平原和南部淡水河流域,大都开发。乾隆年间,土地开发扩展到丘陵地带。嘉庆以后,开拓已发展到土著地区。以前的“恶毒瘴地”,很快布满了大小村落;昔日的狩猎鹿场,变成了“极目良田”。土地的广泛开拓,又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市场繁荣、“人烟日盛”的城市,也越来越多。到18世纪中期,台湾已成为“糖谷之利甲天下”的祖国宝岛。那时台湾的政治经济中心台南,每年就有价值数百万两白银的商品进出。台糖运销天津、上海、苏州、宁波等地,还远输南洋和日本。台米运销大陆,有助于解决闽南、粤东缺粮州县的民食困难。在清朝统辖的200多年中,台湾经济得到迅速



反抗日本侵略者的高山族战士

发展。

历史事实说明:台湾是汉族和高山族人民共同开发出来的,是中国的固有领土;台湾人民是大陆人民的骨肉同胞,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史迹源流研究会”会友会在1978年10月25日发表的宣言中说:台湾是“枝”,大陆是“本”,台湾的根扎在大陆。台湾与大陆有地缘、血缘关系,台湾世居同胞暨其生活、文化,无一不来自大陆,甚至山地高山族同胞亦多有“根”在大陆。

台湾建省

由于清政府的腐败孱弱,富饶的台湾成了英、美、法、日等国侵略和掠夺的目标。特别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的近代史上,台湾人民和大陆人民,都饱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经历了深重的民族灾难,台湾人民的痛苦更为深重。与此同时,台湾人民和大陆人民,又都进行了可歌可泣、艰苦卓绝的反抗侵略的斗争,台湾人民的斗争

更艰苦,也从来没有屈服于帝国主义的残酷统治。台湾人民的反侵略、反压迫的斗争,从来都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组成部分。

在鸦片战争中,英舰在1841年和1842年,多次攻打鸡笼(今基隆)三沙湾炮台,侵扰大安港,都被英勇的台湾军民打败。但是,执行投降政策的清廷,竟顺从英国侵略者的要求,将领导台湾军民抗英的台湾兵备道姚莹等人革职解京审办。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1858年,清廷同英、法、俄、美签订《天津条约》,开放台湾,准外人居住、通商。1862年后,安平(今台南)、沪尾(今淡水)、打狗(今高雄)、鸡笼(今基隆)相继开放为通商口岸。

美国殖民者早就觊觎台湾,垂涎台湾的富饶和地理位置的重要。1847年以后,曾多次派遣船舰到台湾调查煤矿和测量港口。美国还有人向驻华公使巴驾建议,在台湾建立“独立政府”,使台湾成为一个“独立的”殖民地。巴驾本人则公开

主张占领台湾。1867年，美船“罗佛号”在台湾触礁，船长等人在琅玕（今恒春）登陆，遭土著族袭击。同年6月，土著族又英勇击退入侵琅玕的美舰和陆战队。美驻厦门领事李仙得竟鼓吹“畚地非中国领土”。

美国武装侵略台湾失败后，经过明治维新刚刚走上扩张主义道路的日本，成了侵略台湾的最凶恶的敌人。台湾在战略地位上居于日本南进的要冲，是理想的“南进跳板”。早在16~17世纪，日本商业资本刚刚开始发展时，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就几次出兵窥伺台湾。1874年，日本当局在美国人支持下，借口牡丹社土著误杀漂流到台湾的琉球人，悍然出兵牡丹社，遭到牡丹社土著族人的巧妙截击和顽强抵抗。清朝政府本无决心抗日，被迫与日本签订《台事专约》。日本索取赔款50万两（合78万日元），继又迫使清政府承认它吞并琉球。日本此次出兵，仅兵费就开支780万日元，兵士死伤560多人，得不偿失。牡丹社土著族人英勇不屈的抵抗，为保卫台湾不受侵犯，做出了重大贡献。

1883年又发生法国侵略越南和中国的中法战争。法国军舰不断来鸡笼、沪尾骚扰。日本则派遣“天城号”军舰到鸡笼港观战，窥探虚实。清廷起用淮军名将、前直隶提督刘铭传来台督办防务，屡败法军。中法战争结束后，台湾地位益形重要。1885年，台湾改设行省。刘铭传为台湾首任巡抚。他在6年（1885~1890年）任内，大力推行近代化新政，“一切设防、练兵、抚畬、清赋诸大端”，均“次第筹办”。如改筑炮台，巩固海防，架电线，铺铁路，开矿山，造商轮，兴办新式企业，设立新学堂，提倡新教育，着力垦殖，整理财政等等，成绩卓著。

在刘铭传苦心规划经营下，清政府在财政拨款上给予支持，台湾的新式工业和近代化新政（洋务运动）常领先内地。

正当台湾军民在强敌虎视眈眈面前发奋图强，加速同内地一体化的进程时，1894年，日本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大败清军。1895年，清廷被迫同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割让澎湖、台湾。消息传出，全国震惊。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同声谴责清政府的卖国罪行，坚决反对日本占我领土。1895年，日本强行用武力占领台湾，对台湾进行了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

抗战胜利 台湾光复

在日军占据时期，台湾人民从来没有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统治，而大陆人民也从来没有忘记与台湾同胞共同奋斗。“在日本占领期间，台湾人民之最大希望为重归祖国”。这一点，连1949年美国国务院公布的《中美关系》白皮书，也不能不承认。中国人民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浴血抗战，为收复包括台、澎在内的失地而战，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这是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反侵略战争的第一个伟大胜利。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结束后，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再一次成为中国的一个行省。

早在1941年12月9日，太平洋战争刚一爆发，中国政府就在《中国对日宣战布告》中声明：“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之关系者，一律废止”。日本根据《马关条约》对于台湾和澎湖列岛之领有权，从此失去了法律依据。1943年12月下旬，中、美、英三国政府首脑在埃及首都开罗召开

会议，三大盟国签署了《开罗宣言》，明确规定战后“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太平洋战争末期，日本败象已露，1945年7月17日，美、英、苏三国首脑在波茨坦举行会议，7月25日，中、美、英三国首脑复于波茨坦召开会议，26日签署了《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还用联合公告方式，正式通知日本，台湾、澎湖必须交还中国。接着美军在日本广岛、长崎先后投掷原子弹，苏联对日作战。8月15日中午，日皇裕仁广播了投降诏书。9月2日，日本政府在东京湾美舰上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接受中、美、英及苏联共同签署的《波茨坦公告》，将台湾、澎湖交还中国。这样，国际上一致公认，台湾、澎湖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台胞知道台湾光复已成定局，就要回到祖国怀抱了，半个世纪来压在心底的爱国热情，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欣喜若狂，奔走相告。10月25日，台湾省行政长官兼总司令陈仪，在台北公会堂举行受降典礼。日方投降代表是最后一任台湾总督安藤利吉等人。陈仪庄严宣告：“从今天起，台湾和澎湖列岛，已正式重入中国版图”。台湾同胞感到无限欢乐和欣慰，50年来的心愿终于实现了。家家户户张灯结彩，通宵欢宴，焚香祭祖，告慰先灵。台北市30万人举行火炬大游行。全岛各地，天天象过新年一样。那种举岛欢腾、万家庆贺的动人景象，充分体现了台胞的祖国情思。1949年12月，在内战中遭到失败的国民党政府迁到台北，成为非法的政府，台湾又处于同大陆暂时隔绝的状态，但这丝毫也没有改变台湾是中国领土、台胞是中华民族一部分这个根本问题的性质。

深圳特区 建设中的 梁湘



● 张天来

我坐在53层深圳国际贸易中心顶部旋转餐厅，展现在眼前的是望不到边的楼房群，胸腔里热血沸腾。我到过德国、美国、俄罗斯，我要说，在我视野里出现的这块土地上，20层以上的高楼竟有1000座，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在15年内创造出这样的如同神话般的奇迹！

1984年邓小平到深圳视察，曾经登上过一座20层高楼观看正在建设中的的罗湖区。如今，这层高楼已经失去了它的高大气势。1992年，小平在这座旋转餐厅坐了几十分钟，他那篇著名的“南巡讲话”，主要内容是在这里讲的。面对着这激动人心的场面，老人家语重心长地说，你们有这么一片，不是说出来、讲出来的，是干出来的。他批评那所谓“姓资”还是“姓社”的议论，说那是“空谈误国。”

人们大约不会忘记，1984年邓小平视察深圳等特区之后，不久中央就决定开放沿海14个城市，加快了开放的步伐；

人们大约同样不会忘记，正是1992年“南巡讲话”之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车轮加快了转动。

今天，我坐在旋转餐厅上向四周远望，我的耳边震响着动人的“南巡讲话”，我仿佛看到了威严无比的统率着开放大军披荆斩棘奋勇前进的大元帅，也看到了一位英勇善战的先锋官，他是梁湘。1981年—1986年，他在这里任中共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

梁湘在深圳特区的六年，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这样的范例——在几乎是一片荒野的土地上，领导人民建造出了一座现代化的城市。它的神奇的速度让许多人不敢相信它是事实而是神话。

为什么梁湘能够创造如此辉煌的业绩？我在深圳听到有人对梁湘的评论，“他有大无畏精神，不怕碰得头破血流，不怕冒险。他193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到这里来的时候已经62岁，奔波一生，早已功成名就，可以安度晚年了，但在党中央号令下，他毅然决然而来，闯出了一个大名堂。”当时办特区没有现成的路，小平同志说要杀出一条血路来；而在第一线的梁湘，正是冲杀在深圳这个边陲小镇外的荒野上。

梁湘离开深圳领导岗位已近10年了，深圳这10年发展的基础，基本上是梁湘和他的战友们用巨大的手夯实的。

在我的面前，摆着一份《深圳市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大纲》。它的印制日期是1982年2月3日。这是一份珍贵的文献。后来深圳的一切实践，大体上来自这个大纲。

深圳特区应该办成什么样子？当时并不只有一种意见，例如办一个封闭式的加工区，或者办一个“自由贸易区”；范围么，不要超过两平方公里。1981年3月里的一天，梁湘在罗湖车站下了火车，眼前出现在0.8平方公里上的建设场面是：人们正在堆山填湖，要造出一个工业小区来。可是，深圳这个地方，总面积有327平方公里。如果要从0.8开始，那么要开发百年以上才能搞出个名堂来。

梁湘和他的一班战友们决心要大干。梁湘在深圳作的第一桩大事，就是抓紧时间，邀请国内和香港的上百名专家修改他的前任留下的一份规划，给深圳建设制定一个更大更完满的蓝图。梁湘在专家讨论会上阐述自己的宏图大略：深圳毗邻香港，交通方便，有大片可

供开发的土地，有充足的劳动力等有利条件，应该把深圳办成兼营工、商、农、牧、住宅、旅游等多种行业的综合性特区。这个指导思想，获得了专家们的赞同。城市建设的总体布局，分作东、中、西3大组团，要求楼宇建筑设计美观大方，高低层次错落有致，中间用园林和道路绿化带连结起来。对于特区的工业类型，农业的发展途径，交通运输包括铁路、公路、港口码头和机场建设的安排，几个大型仓库区的设置，商业、金融和行政中心区的布局，市政公用事业包括供水、排水、电力和煤气供应、通信设施、园林绿化和环境保护等的建设，八个各具特色的旅游中心的开发，直到包括要建立大学，办特区报和电视台在内的教育、科研、文化、体育和医疗卫生的发展目标，……都在规划中有了进一步的设想与着落。

深圳经济特区今天的面貌，如果是一幅杰出的大画，那么这幅大画的构思、框架，在1982年就已经有了轮廓。

作为记者，我从1983年开始至少有五次以上来深圳采访，我目睹了梁湘和他的一班人在深圳特区奋进的步伐。我每次都感受到新的鼓舞。今年3月，我多次乘车奔跑在市中心罗湖到南头半岛的30公里的高速公路上，也多次穿过一些主要街道。我感触比较深的是这条市区内的高速公路很为顺畅，原因是它的北面又开出了另一条高速公路。深圳的城市绿化可以和世界上最先进的城市比美。世界上最著名的绿化城市是华盛顿和莫斯科，而深圳的绿化并不比它们差。深圳的绿化面积有42%，这个数字，在中国是最高的，拿到全世界的城市去比，也名列前茅。我坐在车子上，看到马路两旁各有30米



1984年1月，邓小平接见深圳市主要负责人

的绿化带，感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舒畅。人们告诉我，城市绿化要这样搞，是梁湘的主意。梁湘领着几个人到新加坡参观回来，就要求正在建设中的街道、马路，把两边绿化带扩大到30米宽。当时已经建成的马路和街道当然没办法了，正在施工中的一律按新要求作了修改。于是，深圳建成了和大自然拥抱在一起的宽阔宜人的马路。国务院的有关部门已经给深圳命名为“园林化城市”。

深圳机场选在哪里？曾经是一个争论了多年的问题。梁湘多次到现场考察，最后又经专家论证，确定在远离市区的南头半岛的西乡建立大型国际机场。开始有人主张建在阳台上，但山太多，工程量太大。后来，又有人主张建在市区之

内，但深圳规划委员会国内外包括香港、英国、日本的专家20多人，都不同意。有人形容这样做“等于野牛闯进了瓷器店”。李鹏总理到深圳乘直升飞机视察之后，还没到休息室，就问是谁叫你们把飞机场放在市区之内？这样做，对城市影响太大。争论多年的问题至此得到解决；于是，飞机场依旧按梁湘方案建设起来，时间却延误了好几年。

三

从53层大厦下望，我看到了1984年小平视察时登过的那座20层高楼，我知道，它是“深圳速度”的一个起点。它的名字叫“国际商业大厦”，在深圳特区它是第一座高层建筑。

1981年夏天，梁湘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这座大楼的施工。省建工部门把大楼的施工任务分配给省内一家建筑公司，这家公司漫天要价，而且不到一个星期就涨价3次，它还按老办法要特区提供基建材料的供应指标，等等。双方谈了两个月，已经打好桩的工地上青草又长了好高，施工却还没有开始。梁湘一听到这件事情就恼火，他问：“没有张屠户，我们也要吃带毛猪？”他想到了蛇口工业区在“三通一平”基础工程中实行承包的经验。他同主管基建工程的副市长和城市建委负责人商定，在基建工程中实行公开招标。

有8家公司投标，第一冶金建设公司中标，原因是造价比较便宜，施工期比较短，而且有大型项

目的施工经验，质量有相当保证。这种招标在今天看来已如家常便饭，而在当时却是捅了大蚂蜂窝。负责分配施工任务的一些部门，失去了手里的指挥权，要喊要叫；施工单位则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风险和压力，怕失去“大锅饭”的舒服日子，当然也要吵要闹。招标的普遍推广，就像是八级大风中开顶风船。梁湘懂得他面对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困难，但他不肯向后退半步。他鼓励战友：“改革是一场革命，不改革就没有特区的前途。我们的眼睛不仅要看到327平方公里，还要看到960万平方公里；谁要阻挡特区改革的道路，就把谁掀掉！”

不久，省基建部门负责人陪同国家建委一位副主任来到深圳特区，这位负责人对特区基建提出了8条意见，其中重点在于要首先让省内单位有活干，不能将所有工程都拿来公开招标。而且，一律不准香港、澳门的公司来深圳投标，说“这是主权问题”。梁湘站起来讲了一番话，他说：“竞争促改革，竞争促进步。不管是省内还是省外，谁能干就该让谁来干。特区要率先改革，就得让省外的基建队伍进来参与投标，就得要请港澳的建筑工程公司进入特区投标。什么叫国家主权？大家都清楚，请别拿大帽子吓人！”

公开招标加快了工程进展速度，提高了工程质量。一冶建设公司创造了5天盖一层楼的记录，只用了16个月时间，提前两个月完成了5万平方米的建筑任务。而53层的国际贸易中心大厦，由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三局一公司投标承建，采用“滑模”先进工艺，创造了三天一层楼的最新记录，让国内外许多怀疑者吓得目瞪口呆。这种速度，被称作“深圳速度。”

这种基建工程公开招标的办

法，如今早已遍及全国。

梁湘敢闯的第二件大事，就是利用银行贷款搞基础工程建设，即所谓“七通一平”。这种建设项目所需资金，当时在内地是由国家拨款。梁湘不愿意伸手向国家要钱，而这些项目也没有外商愿意投资。一位副市长提出了动用银行贷款的办法解决，梁湘完全同意。他说，中央文件允许特区利用银行存款余额作为流动资金，“我们要责成银行贯彻执行好中央的指示精神，要学会生财之道和用财之道，使死钱变为活钱，决不要像那些土地主那样，把钱深埋在地下不用，活钱变成死钱啊！”这个办法从1982年初开始施行，“七通一平”迅速展开，土地使用价值大幅度提高，租用土地的客户缴纳土地使用费，正在建设中的楼房、厂房实行预售已回收大笔资金，特区基建部门又把这笔钱投入新的项目。用“滚雪球”来形容这种一个钱变成了几个钱的办法相当确切。

但是，事情也并不那么顺畅。有人提出，很多贷款只能用于工业而不能用于搞基建，用贷款搞基建工程更是错上加错。为此，省内有个部门在内部通报中批评了深圳。正巧，从北京来深圳视察工作的某部门负责人也批评深圳“透支”、“出现财政赤字”。梁湘对这方面的情况作过全面了解之后，对有关同志说：“特区银行存款余额有3.9亿元，我们只借了2.4亿元，哪有什么赤字呢？我们贷的款，不是无限期地贷，不负责任地贷，而是有把握偿还的，是有借有还。”他十分坚定地有关同志说，“你们大胆办下去，如果错了，要追究责任，由我来负责！”

就是用这种办法，只是三、四年时间内，我们在53层大楼上看到的深圳中心区总长100公里

的55条马路全部建设起来。开发上步工区贷款1800万元兴建标准厂房，用预售所得资金作第二批厂房的投资，17幢厂房未竣工就已全部售出，1800万元的贷款完成了1亿多元的工程。

这种办法后来也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开来。

梁湘敢破敢闯的故事，还可以说出许多来。我只再说一个很小的例子。深圳特区内有一家光明畜牧场，创办者在国外购买优质奶牛空运来深圳，目标是向香港提供优质鲜奶。人们把第一批鲜奶运到海关就遇到了麻烦：不准出口。海关当然没有这么大的权力，命令来自北京。鲜奶这种鲜活产品，万万火急，不能积压，时间一长就会变质。梁湘直接打电话同北京有关部门交涉。他据理力争，毫不妥协。两天以后，北京下令放行。深圳人至今还记得八十年代初期的这件事，对我说，若不是梁湘亲自办理，牛奶不能销到香港，畜牧场不是早就关了么？！由于梁湘把出口鲜奶的路打通，如今，光明畜牧场的奶牛已经由当初的几百头发展到几千头，它的鲜奶已经占据香港鲜奶市场的70%。

四

梁湘抓精神文明建设，在深圳创建了八大文化设施，这就是：深圳大学，深圳特区报，深圳电视台，科学馆，图书馆，大剧院，博物馆，新闻中心。

我多次在深圳大学的校园内散步。国内著名大学我都到过，我敢说深圳大学的校园是第一流的。它十分优美，让人和自然拥抱着在一起，所有的空间都分布着花草和树木。学生的宿舍很宽敞，2人1室，为国内所未有。试想，4人1室，6人1室，甚至8人1室，能够学得

好么？！深大的最大改革一是收学费，二是不包分配，更是在全国领先。

深圳自己办大学有一段故事。曾经有一位外商希望在深圳办学，梁湘同市委主管文教的宣传部长两次到宾馆与他谈判，对方提出的条件有一些难以接受，例如不能设立党委；不能过问课程设置和教师聘任，等等，而且要对学生实行高收费，国内人无法负担而只能招收外籍学生。梁湘说，“靠人家靠不住，我们自己办。”省高教局两位局长热心支持此事。1983年1月，市委常委会上正式决定办深圳大学，办学报告一送出，深圳大学筹备小组宣告成立，梁湘担任组长，由广东省属大学调来8位处级干部，在平房开始筹备工作，还没到夏天就热得大汗直流。5月1日，招生简章起草出来，7月，参加全国统

一招生。校舍暂借宝安县委办公大楼，梁湘下令7月1日前县委要搬走。梁湘和宣传部长等人一起选校址，共看了5处；有两处条件不错，但距离市区远，有许多不便；有一处是在深圳水库大坝下面，怕万一洪水冲决大坝危害师生；一处有山有树，距市区也近，但那里的林业科研所不肯搬家；最后，在深圳湾西头靠近海口的奥海门。梁湘说，不要再讨论了，就在这里了。市委第二把手和宣传部长到这儿办理征地，一个上午解决了问题。

1984年1月，小平来深圳视察的时候，梁湘在汽车上向小平汇报，说这里就是深圳大学的校址，那时工地上还没有一块砖瓦，他就敢向小平说秋天将在新校址上课。几个月内平地上盖起一座大学来，小平听了十分满意，回北京就对人讲这是“深圳速度”。

办大学的钱从哪来？那年月深圳地方财政收入并不多，1979年建市那年1700万元，1993年也只有1个亿左右。还是向银行贷款。那次梁湘住院，从清华大学请来的一位深圳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到医院看他，说到经费问题，梁湘叫他放心，说，“我就是卖了裤子也要把深圳大学办起来！”

梁湘抓得真紧。3月下旬，他在北京开会，特意打电话回来询问深大工程进展情况。4月17日，珠江口一带倾盆大雨，梁湘带着有关方面的负责人，一起到深大工地检查工程进展情况。工程进度之快出乎意料，只是要求有材料供应作保证，否则要拖进度。梁湘当即指示，基建、物资部门要把仓库里的家当提供出来，不够的马上组织采购。他对大家说：“这项工程我们向中央作了保证，如果谁因为工作不负



1984年4月胡耀邦来到深圳和市委领导人在一起

责任，使工程出了问题，就要唯谁是问！”

9月26日，人们在新校址举行建校一周年及第一期工程落成典礼。

10年过去了，深圳大学的本科、专科和成人教育已经培养2.6万名毕业生，各类短期专业技术培训更高达10万人次，还有200多位研究生和进修生，200位外国留学生。

梁湘抓报纸和电视台。宣传部同他商量创办电视台资金怎么解决，估计部里、省里给钱不那么容易。

梁湘说：“给，最好；不给，我就是倾家荡产也要把电视台和报纸办起来。”市委党校和电视台争地盘，争到梁湘那里，双方都想多要一点地方。梁湘看了看地形图，用红笔在上面划了一道线作为分界，“不要争了，就是这样子！”电视台办起来，花了六、七千万。特区报1982年5月正式出版，在香港排印，编辑部在铁皮房子里办公。1983年盖大楼，进口世界第一流的德国海德堡的印刷设备。如今，《深圳特区报》已发展成为全国篇幅最大的报纸之一。

我看过深圳的图书馆和大剧院。它们都是外观古朴、大方、具有民族风格而内容又现代化的建筑，是大城市所不可缺少的。图书馆初建起来的时候，有人说大了，现在看不但不大，反而是小了。按规划到2000年深圳人口发展到100万，而现在早已达到300万。这家1.3万平方米的图书馆，日平均接待读者竟高达5400人次，整天座无虚席。它的藏书已达145万册。我走在这座大楼中，对梁湘充满感激之情。

我来到市委和市政府大院，瞻仰著名的“孺子牛”塑像。这是美

术家潘鹤教授的杰作，它非常形象而深刻的表达了深圳人的开荒牛精神：一头犟劲至极的黄牛，由东向西奋力向前，在黄牛身后，一株深埋在泥土中的古老的树根被拔出了地面。当初，潘教授的这一构思获得了梁湘和他的一班人赞同，但到财政局去领铸作铜牛的费用，却遇到阻力：“6万？我买一头活牛也不要这么多钱嘛！”

宣传部长把财政局长的意见告诉了梁湘，梁湘亲自批准了这项开支。他对有关同志说：“开荒牛精神是特区建设者的无价之宝，是多少钱也无法买到的。”不久，在全市思想工作会议上，梁湘讲话中说到精神可以转化为物质，说这6万块钱做成的“孺子牛”，它所体现的精神将会转化成为不可估量的物质力量。

这座雕塑成为深圳精神的象征。就在雕塑落成的1984年冬天，80高龄的邓颖超大姐在雕塑前与市委党委们合影留念，说：“这个塑像代表着同志们在特区工作的精神和意志。”

每到“七一”和年底，市委都表彰一批在特区工作并且做出重大贡献的“开荒牛”。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做了一批小型“孺子牛”，让人们摆在室内，鼓舞斗志；并且送给



深圳的花园别墅

来访的客人，作为最珍贵的礼物。

五

在深圳的采访当中，我惊喜地发现，梁湘在担任深圳领导职务的时候，同人民群众有着良好的关系。

那还是1982年初夏，梁湘在重负荷下病倒，住进医院并且做了手术。手术后的第四天，梁湘出院了。那时家属未来，深圳的领导干部都住招待所。清晨，梁湘走出招待所，直奔附近肉菜市场。他一面查看，一面询问价钱。蔬菜的品种少，价钱也高，他感到非解决不可。于是，他把果蔬公司和财贸部门的负责人请到办公室来，共同商量解决蔬菜品种少、价钱贵的问题，决定了几条：马上从东莞、惠阳等地调运一批蔬菜来应急；立即兴办豆

制品厂供应豆腐、豆芽等食品；重金聘请广州等地郊区有经验的菜农到特区种菜。

没有很久，深圳各肉菜市场上，蔬菜的品种和数量大大增加，菜价也降下来。直到现在，人们告诉我，深圳的肉菜价格并不比北京高。

一次梁湘陪同外宾参观市容，一下子就看到邮局大门内外排着一条人的长龙。他打听到，那是人们在寄包裹。在深圳工作的外地人有多少万，不解决寄包裹的问题怎么行？他找到邮政局负责人，这位负责人回答他“没有地方”。梁湘亲自寻找，在供电公司旁边找到一块空地，他要城市规划部门把它划给了邮政局。寄包裹排长龙的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八十年代初期一年的春节前夕，梁湘来到建筑工地。建筑工人们满头长发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向工人们打听明白了：一是工作忙时间紧，一是没有理发师。从四川来的工人对市长说他们吃不上辣椒。不久在他主持的市委常委会议上部署节前工作，他说，工人们生活相当艰苦，过年也不回家。好多人头发、胡子很长，要想办法给他们理一理。外省工人特别是四川工人，喜欢吃辣椒，要让他们吃上才好。常委会后，梁湘要秘书打电话把武警部队负责人请来，问有多少战士会理发，要给他们配上理发工具，给建筑工人理发、刮胡子，高高兴兴过个年。十几年后的今天，这位秘书谈起这件事来还很感动。

梁湘特别重视人才，他在八十年代初期有一句名言，就是：“只靠我们几个光脚板的干部就能办得好特区么？”他一到特区，就抓住宣传部长举办培训中心（深大前身），第一个培训班就是培训70多位外经干部，梁湘亲自参加开学典礼。

教师则是香港的专家教授。同时，请一位常委抓在全国招聘人才的工作，一下子知识分子干部来了七万多人。人们来深圳很简便，只要这位常委签了字就可以。那时节，罗湖火车站人总是满满的，就像当年的南下大军一样。

住宿成了最大的难题，再高级的人才也得先住草棚、铁皮房。梁湘早就让负责基建的副市长先盖一批招聘楼，地址在深圳河北岸。我在53层的旋转餐厅上看到了这片红顶的楼房。当时，房子盖好了，有人已经把它卖给企业，而一批高级技术人员到处挤来挤去，没有地方住，行李堆放在铁路仓库里。梁湘听到这种情况，急如星火，马上带领建房、分房领导小组的几位负责人来到滨河路察看招聘楼，看到这8幢住宅楼还空在那里，梁湘说这些都给人事局，安排高级知识分子，还问够不够？100多位高级知识分子的住房问题，就这样顺利的解决了。收了企业的房钱怎么办？退还就是了。

八十年代中期的一天，十几位中小学教师到市委和政府办公大楼来找梁湘市长。在走廊上，他们向市长秘书说许多教师已经来了半年，但住房仍无着落。秘书安慰大家说，他也来自内地，两年多才分到住房；他负责把大家的要求反映给市长，但大家要有精神准备，这个问题一下子解决是有困难的。梁湘可不这么看，他把当年准备分给党政干部的住房压下来，一下子分给了教师，那是一大片，1000多户。他把一张正在施工中的住宅楼一览表压在玻璃板下，其中特别标明完工日期，要秘书不断催问。只要已交付使用，就要教师们搬进去。党政干部的住房当然也要解决，但排在了教师以后。

教师们搬进了新住宅，发现公

共汽车还没有通到这里，这回他们没有直接找市长，而是写了封信，要求公共汽车行驶路线在新住宅区延长几站，没有几天，这个问题也解决了。

八十年代中期中国第一个教师节即将来临的时候，主管文教的副市长向梁湘提出，不要搞一般表彰，而要给教师办一两件实事。当时，深圳教师住房问题已经解决，最好从提高工资待遇方面采取措施。教育局负责人的意见，是否可以让教师比党政机关高10—15%，市委常委会上，第一把手梁湘，第二把手周鼎都主张高20%。这一决定，使得深圳教师工资水平大大高于全国、也高于广东全省。这项决定实在是一个英明的决策，它极大地稳定了教师队伍，有助于提高教学质量。许多有识之士多年来大声疾呼而无法做到的事情，梁湘和他的一班人做到了。

这项决策使得一些地方效法，但也引起一些人的反对。梁湘离休之后，省里提出深圳教师高工资对全省有影响，曾经降到高于党政干部的10%，但不久又恢复到20%。总有一天，这个办法要推广到全中国。

深圳的武警部队官兵待遇也高于党政机关人员的15%，这是因为官兵们的工作非常重要，生活又特别清苦。

六

我同梁湘的战友们作了相当长时间的交谈，探寻梁湘这位杀出一条血路的改革开放先锋官的内心世界。一位70多岁的老同志说，梁湘是一位老党员，他对党的事业的耿耿忠心是现在许多人难以理解的。他曾经对这位老战友说过，他在深圳是背水一战，要为中国的繁荣富强杀出一条路来，个人得失



休闲中的梁湘和夫人

在所不惜。因此，他就具有很大的闯劲，不怕得罪中央的一些部门。例如，他要发展深圳的电讯事业，同一家外商合作，省里和国家的有关领导部门竟然拖了两年不批，理由是要保密。胡耀邦总书记到深圳视察的时候，梁湘不怕搞坏关系而直接向耀邦报告了这一情况。问题当然得到了解决了，但也得罪了一些人。

离开领导岗位的时候，梁湘在一次会上讲了一番动人肺腑的话。他说：我现在下来，但我还热爱着深圳；等到我死了，请同志们把我的骨头埋在梧桐山，面向太平洋。

深圳人忘不了梁湘，深圳的知识分子忘不了梁湘。梁湘曾经担任过中国书画函授大学深圳分校的顾问，这个学校培训了深圳一代书画家。北京和全国知名的大画家、

大书法家，刘海粟、何海霞、李可染、李苦禅、启功等等，都到深圳来讲过课。深圳的画家们画了一幅鹰松图：一株千年古松之上，站立着一只凛凛神威的雄鹰。梁湘的老战友刘波在画的一角上填了一首“画堂春”：

苍松顶上
踞鹰雄，
眼眸慧眼
迎风。
当年展翅
气如虹，
搏击越苍
穹。

何惧风云

变幻，

高瞻远瞩从容，
丹心一片寄情浓，
造福万家丰。

我到深圳的一家医院探望病中的梁湘。据医生诊断，他由于小脑萎缩，影响腿部神经，行走困难。1983年我们《光明日报》的三个记者第一次访问深圳，我见过他两次。十多年过去，他虽已是76岁老人，却并不显得苍老。他没有站起来，但从谈吐中可以看出的思维比较正常，而且不断地说一些幽默的话让大家笑。

许多同志常来看他，包括前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我看到任仲夷的两则留言，一则是：

笑
笑笑笑，
功君常常笑，
越笑越年少，
越笑越爱笑。

这则留言是去年4月18日写的。今年3月，仲夷又来，留言曰：

梁湘同志正之
看庭前花开花落
望天上云卷云舒

意思很明白，劝他好好静心养病。

离开深圳，我到广州拜访了两位八十几岁高龄的老人，本想找仲夷，但他家电话无人接，两次按门铃无人来开门。热情的前省委宣传部副部长70多岁的张江明，只好领我拜访刘田夫、陈越平两位长者。陈越平是“一二·九”运动的健将，今年已是81岁。陈老赞扬梁湘有魄力，敢于负责。那一只“孺子牛”雕塑，就代表梁湘他们的精神，梁湘这帮人精神面貌很好。他们还注重文化建设。那真是开天辟地。深圳那个地方，我去过多次，送兄弟党的客人。当时只有几条破旧的街道，高楼只有一座，就是车站旁边的华侨大厦。只有了解它的历史，才知道深圳那地方发展有多快，像盐田港，当时车子都开不过去，现在成了国内大港口之一。只看今天，不知道昨天是不行的。“不能忘记昨天”，陈老说。

刘田夫已是87岁高龄，与小平同乡，1937年就到广东工作。刘老说：“在深圳真正打开局面的，是梁湘。梁湘青年时代到延安，解放后在广州工作多年。搞特区，原来派了几位同志，都做了工作，但在深圳全面打开局面的还是梁湘他们这班人。

（作者张天来是《光明日报》高级记者）

（责任编辑：杜晋）



韩先楚将军 的 故乡情

● 邓运双

在红安西部边界的吴家嘴村，是韩先楚将军的诞生地。这是一个只有十多户人家的山村。韩先楚在这里度过了少儿时代的14年岁月。

1949年人民解放军南下时，他回到乡里，这时他当上兵团的副司令员了，还是一口乡音，与儿时的伙伴仍然称兄道弟，笑骂无拘：“海洲呢？这龟孙怎么不来见我？”韩先楚见前来迎接他的人群中没有他儿时最要好的伙伴吴海洲，便大声地喊起来，“我还欠着他四斗稻谷哩！”

吴海洲被乡亲们从田里喊回来。

“哎呀呀，是先楚老兄回来了呀！”吴海洲紧紧握住韩先楚的手，上下打量着，“瞧你这身军装多么威武啊！我早就说过，我们村那时的几个光屁股蛋中就数你最有出息，说着了吧！”

“哪里哪里，我只是比你们多了一些野气，当年你要是守着两亩地，跟我一路出去，肯定比我更有出息。”韩先楚将军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三支钢笔，“海洲哇，听说你屋里人生了三个小伢，我把这三支钢笔送给你，让伢儿上学念书去，将来一定比你、比我更有出息。”

吴海洲接过三支钢笔，眼眶湿润了：“这可叫我怎么样谢你啊！”

“谢个大屁，我当年还借了你四斗谷子没有还哩！”

“还个屁哩，你韩司令在东北战场上立了那么大的功，活捉了廖耀湘那鬼日的，么止值得那四斗谷子呢？”

“借东西要还，这可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规定的。”

“那就用这三支钢笔作抵。”

“那就由你吧！”

韩先楚当年给海洲留下的这张欠条，成了吴海洲家里的传家宝，现在已经传到他儿子的手里。只是吴海洲并没有真的把它作为“想头”来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中国的大地上饿殍遍地，吴海洲家也未幸免于难，

啃树皮，吃野菜，苦熬着那饥馑的岁月……

“你不是有一张韩司令借了你家四斗谷子的欠条吗？把它拿出来，去找政府要点救济。”万般无奈的时候，好心的乡亲们劝着吴海洲。

“那怎么行呢？”吴海洲坚决不肯，“天灾人祸，全国到处都有，再说，人家当了司令，我们就打他的招牌，给政府添麻烦？”

1975年韩先楚又回到老家，他挨家看望乡亲。

他来到乡亲闵永进家中。

闵永进全家欢喜，准备杀只老母鸡招待韩先楚。

“莫杀鸡，我不图吃你家个么事的，只是多年没回，想你们哩。”只看脸上肉，就知锅里粥，韩先楚是晓得乡亲们的苦衷的。“这年头，你们吃苦受累，我心里就很是过不去的，杀鸡吃，我就更有愧啊！”

几句贴心话，永进一家人感到透心的温暖，永进眼角涌出一串感激的热泪，永进老伴还是要将一只长得最重的老母鸡捉住要杀，韩先楚硬是让他放了。

“留着它，多生几个蛋，解决个油盐钱。”韩先楚说着言归正传，“说说看，解放快30年了，乡亲们总是缺油少盐？”

面对将军的发问，闵永进敞开了平日里雍塞已久的心扉……

在看望乡亲们的过程中，韩先楚了解到，大队和生产队干部配得很多，群众有怨气，出勤不出力，分值扯得很低，日子也就过得很艰难。

离开红安之前，韩先楚嘱咐县委领导说：“大队、生产队的干部要精简一下，干部太多了，群众有意见，也负担不起……”

星移斗转，岁月推移。又过了6年的时光，已是兰州军区司令员的韩先楚，再度回到红安。

这是1981年冬的一天，山区普降大雪，按照日程安排，这一天他又要回到吴家嘴去看望乡亲们。

小车在风雪中开出县城，急驰 30 公里，来到了大西河畔的上新集镇。公社干部们早就站在雪地上迎候着将军的到来。

“天这么冷，还下着雪哩，你们都在雪地上等，我本不想打扰你们的，这下可真叫我不好意思。”韩先楚与公社的干部们一一握手，“到了镇上，离家只有四、五里路程了，车子雪天难得开进去，我这身子骨还挺硬的，能走回家。”

公社干部说了一大堆理由，请他提出想见那几位乡亲，他们就用车将那几位接到公社与将军见面。

韩先楚望望窗外，鹅毛大雪还在纷纷扬扬地下着，“雪下得这么大，莫叫多了人，就叫永进和海洲两个来。”

闵永进和海洲很快被接到公社。

这两位乡亲已年逾花甲，但身体很健旺，永进衣服穿得单薄，海洲裹着一件褪了色的旧军大衣，进屋满脸高兴，伸出冻裂的双手与将军紧紧地握在一起。

“你们两个还好吧？”韩先楚先向两位乡亲问好，“这两年的日子可比以前过得顺畅些？”

“好啊，顺畅，眼下乡里富起来，你莫操心，就安心做大官吧！”吴海洲几句话，使韩先楚的心隐隐地感到几分痛楚，此时他已注意到坐在一旁的闵永进因衣服穿得太少，冻得在生着炭火的盆边打起哆嗦来。

韩先楚站起身来，脱下身上的皮大衣：“永进，这皮大衣我送给你了。”

“这么行呢？”闵永进连忙推辞，“我冻着了不打紧，可是你冻坏了身体，我们还担当不起哩。”

“韩司令，你在西北高原上工作，那里比家乡更冷，这大衣还是你留着穿。”公社书记也上前劝阻，“永进没穿的，我们给他发救济款买。”

“让他穿上吧，不要多讲！”韩先楚像是下命令，他再也坐不住了，“走，快点，回家里去看看，看看乡亲们。”

永进和海洲领着将军回村了。

“乡亲们，韩司令回家看我们啦！”一进村，吴海洲就扯开嗓子高声地叫喊起来。

乡亲们很快迎了出来，拥着将军聚到了海洲家里来。海洲家里的人连忙收拾起乱糟糟的东西来，可是怎么收拾，床上的破絮也难得叫人顺眼，身上的补丁还是掩饰不住的。韩先楚一进屋就向海洲老伴问好，海洲老伴好一会儿才转过身来，一双手很不自然地挡在衣襟的补丁上……

见此情景，韩先楚一手将随带的手杖重重地抵在地上，一手捂住胸口，他的心似乎在剧烈地疼痛……秘书提醒他吞服一片硝酸甘油……

回到县城后，韩先楚将军让秘书要通兰州军区的电话，迅速传达他的命令：火速向红安调拨五万件旧军大衣。

“这笔钱……从哪里开支……”秘书小心地问。

韩先楚将军一甩手杖，火了：“没地方开支，从我的工资里扣，我死了以后，再扣我儿子的，孙子的，子子孙孙扣下去！”

等秘书打完电话，韩先楚平静下来，才心平气和地说：“你晓得不？红安在革命战争中死了多少人？大革命时，红安是‘铜锣一响，四十八万’，1949年解放后统计人数是 33 万，有 14 万人在战争中牺牲。红安过去叫黄安，红安的红字是无数革命烈士的鲜血染红的。在革命战争年代，红安人民把最后的一碗米，最后的一尺布，最后的一双鞋，最小的份子，都奉献给了革命。五万件旧军大衣算什么？他们早就有权得到，甚至比这更好的衣、食、住都应该得到，然而他们现在还没有得到，我真是愧对父老乡亲啊……”

韩先楚对故乡人民的深情和厚爱令 60 万红安儿女刻骨铭心，每次回乡视察，他都深入到农户、工厂、水库、电站调查研究，倾听群众的呼声，关心乡亲们的生产、生活。他根据调查到的一些实际情况。语重心长地对县委领导说：“你们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不要说假话，不能忘记 1958 年的浮夸教训，说假话一害人民，二害党。”

他在县委领导的陪同下，视察上新集镇高刘村的杉树基地。看到满山遍野的杉树，韩先楚心里格外高兴。他鼓励县委负责同志说：“办杉树基地好，能栽杉树的山要多栽杉树。”

1986 年 3 月，已是人大副委员长的韩先楚病重，在武汉住院治疗。病床上，他又想起了家乡的植树造林：“现在是植树的季节了，你们给我弄些雪松、桂花之类的风景树，送到红安去，叫县委的同志把它栽在城关的街道上，美化美化街上的环境。”他把秘书和夫人叫到病床前叮嘱着。

不久，韩先楚的夫人刘芷和秘书将雪松、桂花、白玉兰等 10 多棵珍贵的树苗送回了故乡红安，并转达了将军的嘱托……

这年 10 月 3 日，74 岁的韩先楚逝世了。徐向前元帅缅怀地说道：……我和他相处多年，深感他为人坦率、正直，敢于坚持真理，正气凛然。

噩耗传来，60 万红安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

1987 年 5 月 18 日，韩先楚的骨灰，由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办公厅领导和夫人刘芷及其子女护送到红安。

(责任编辑：仲文)

将帅们的保健大夫

牟善初

● 春雨 洪矛



1980年，牟善初在英国

牟善初，我国著名的心脏内科专家、一级教授、解放军总医院原副院长、总后卫生部专家组成员。二十多年来，他一直在为老将老帅们做医疗保健。

前不久，原解放军总后勤部老领导洪学智、王平两位老上将，先后两次召见解放军总医院院长廖文海、政委梁国章少将，希望向人们介绍牟善初教授。

我们常年生活在解放军总院，尽力整理出些片断，让读者从中窥见牟教授医德的一斑。

1974年3月，经多方救治仍不

见好转的刘伯承元帅住进了解放军总医院。为了加强对刘帅病情的治疗，上级决定调在外地的心脏内科专家牟善初担任刘帅医疗保健小组组长。

牟善初如期赶到了医院。由于病痛折磨，刘帅已经十分危重。

为了深入了解病情，牟善初一连几天几夜守在刘帅的床前，细致入微地观察刘帅的每一个症候。同时，认真详细地研究了刘帅的全部病历，全面了解了以前的治疗方案及措施。

经过一段时间的诊断证明，刘帅的心脏、血压没有大的问题。目前，主要是意识障碍。

一天，牟善初又在重复着每天无数次的呼唤。也许是刘帅听到了呼喊，只见他的左眼稍微动了一下。刘帅早年就失去了右眼，左眼也几近失明。这时，刘帅的手动了一下，牟善初赶快把手伸过去，两只手握在了一起。由于疾病的折磨，刘帅已没有力气，但牟善初感到了刘帅在用力握他的手。

牟善初一下子明白了，刘帅是在给他鼓励。霎时，一股暖流通过他的心头。

由于药物的副作用，病中的刘帅出现了吵嚷和痉挛。

为了减轻刘帅的痛苦，他钻进了图书馆，在一本本国外最新医学

图书文献中寻觅着。在他查找了许多国内外医学文献资料后，牟教授向组织上汇报了一种治疗方案，并很快得到了批准。实施新的治疗措施后，情况越来越好。折磨刘帅的药物副作用大大缓解了。刘帅也能安然入睡了。

一次，罗瑞卿和杨成武来看刘帅，看到已丧失说话能力的刘帅躺在病床上，两位将军不禁失声痛哭。身边的许多医务人员也都被这种至深的友情感动得流下了热泪。

刘帅病中，总理曾三次前去探望。

周总理告诉他：“牟善初同志，有一件事要征求你的意见。最近上海的贺子珍同志病情也很严重，刘帅身边一位从上海来的同志，熟悉贺子珍的病情，准备让他回到贺子珍那里去，你看刘帅那里离开离不开呀。”

“请总理放心，上海来的同志可以回去照料贺子珍，刘帅的病我们会竭尽全力保证治疗的。如有问题，可以请北京其他医院的专家教授为刘帅会诊，不会影响治疗。”

听完牟善初的答复，周总理高兴地说：“好，这件事就这样定下来了，我可以放心了。”

在牟善初悉心照料下，刘帅的病情一直较平稳。他同医护人员和刘帅夫人汪荣华一起亲自给刘帅调剂营养，完善保健治疗护理措施。刘帅在病榻上又度过了12年，直到1986年已是94岁高龄的刘帅才溘然去世。这真是刘帅生命历程中的又一奇迹。这奇迹中，包涵了牟善初多少的心血与艰辛啊。

二

叶帅病危，牟善初提出了一项出人意料的治疗方案……

粉碎“四人帮”以后，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日理万机。为了更

好地加强叶帅的保健工作，组织上决定成立叶帅医疗保健小组。

1977年8月，上级决定调牟善初，担任叶帅医疗保健小组的副组长。保健小组的组长因还有其它工作在身，实际上医疗小组的保健工作基本上由牟善初负责。

牟善初同时还兼任着刘帅保健医疗小组的组长。刘帅病情稍有变化，他就会随时出现在刘帅身边。

此前，牟善初经常参加叶帅的会诊治疗，对叶帅的身体状况有一定的了解。

早些时，叶帅常看望病中的刘帅，两位老帅一见面就开起了玩笑。刘帅17岁就带兵打仗，几十年戎马生涯，右眼失明，头部和腿7处负伤，右臀部深处仍留着弹片，但腹部却完好无损。因此叶帅就开玩笑说刘帅是“两头受气，中间有

个好锅炉”。

谈起刘帅和叶帅的情谊可以追溯至二十年代后期。大革命失败后，当时刘帅是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叶帅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星期日几个中国学生聚在刘帅处改善生活，叶帅做广东菜，吃罢大家都走了，刘帅就忙刷碗、擦桌子。因为刘帅是军事学院学生，又是南昌起义时的总参谋长，津贴多于其他人，加之刘帅幽默随和，大家都乐于往他那里聚会。

牟善初最早和叶帅认识是1960年。当时叶帅负责全军军事训练工作和院校工作。一次叶帅到西安考察，不巧患了肺炎，经过几天的精心治疗，叶帅的病很快就好了。通过这次接触，叶帅也记住了牟善初。

牟善初刚到叶帅身边的时候，国内正是百废待举，万业图兴，叶



叶帅和他身边工作人员与牟善初（右一）合影



苏哈托总统接见牟善初

叶帅工作非常繁忙，时常到外地视察、开会，处理军政事务。这一段时间，牟善初曾跟随叶帅一起去过上海、武汉、海南、广州等地。

1983年，叶帅突然得了一场重病。牟善初每天守候在床前，每一项检查和治疗，他都是同身边的医护人员一起讨论，权衡利弊，慎之又慎。保健组还请来了有关专家进行会诊。当时有人建议进行大的手术检查，并监护起来。牟善初不同意，他认为叶帅的病没有明显症状，进行手术检查反而会为老师的身体带来不良的影响。要知道此时叶帅已是86岁高龄了。

由于听从了牟善初的意见，没有采取大的手术检查方案，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治疗，叶帅的病情不仅得到了稳定，并很快恢复了健康。之后，叶帅还能在舞会上自如地跳上几圈。

第二年的一场大病，使叶帅再也没有能离开过病榻。在抢救中，牟善初又一次经受了考验，又一次使叶帅的病情转危为安。

叶帅的病情得到控制以后，这次又患了另外一种病，躺在病床上

的叶帅，进食时吞咽肌不协调，喂饭时一吃东西就容易呛到气管里，不久又得了肺炎。

治疗肺炎，消除炎症，就要用抗生素。可是一用抗生素叶帅的肠胃就受不了，很快就出现腹泻。

治疗肺炎不用抗生素不行，用抗生素导致腹泻也不行。牟善初在苦苦地思索着，他心急如焚。

医疗小组在讨论叶帅的病情中，有两位专家不同意停用抗生素，认为一停用，肺炎就会迅速加重，更容易造成生命危险，到那时再抢救恐怕就……这风险谁敢承担？！

“停用抗生素。”最后牟善初出人意料的一拍板决定了。牟善初何尝不知道这样做是要担一定风险的，但不能为了怕风险就不敢决断。牟善初认为：目前再用抗生素只能加重叶帅的病情。如此腹泻，削弱肠胃吸收和消化功能，降低身体抵抗能力，就会加重病情。

决定以后，牟善初反而变得十分冷静，他充满了自信。

各种口服、注射和吊瓶内的抗生素都停用了。一天两天，牟善初

昼夜不离寸步在床前观察，三天后果然腹泻减轻，他同管营养的同志一起选择合理的饮食，一勺一勺给叶帅喂进嘴里。慢慢，叶帅的脸上有了些许红晕。这时，腹泻已完全止住了。

实践证明，叶帅的腹泻就是因为用广谱抗生素引起的，当时医学界对此仍认识不深。停了抗生素，腹泻当然也就止住了。

叶帅的身体得到营养，增强了抵抗能力，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用药之后，不久肺炎也好了。

1986年10月22日，叶帅病情再度复发，多脏器功能衰竭。牟善初同解放军总医院和京内外的其他专家虽全力抢救，但终未能挽留住已90高龄的叶帅的生命。

三

1993年5月4日，新华社播发一条电讯稿，向全国人民公布了国家副主席王震同志逝世前留下的遗嘱：

“我写于后的话，请留作未来要用之时采用勿误。我的半辈子是享受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最好的治疗的。余若遇不治之病，则请让安详寿终，勿予抢救，是嘱。寿终之后送太平间作病理、生理解剖。凡可作科研标本者，取下作科研用，余下送去火化。骨灰撒在天山上，永远为中华民族站岗，永远向往壮丽的共产主义。”

这条遗嘱，竟是王震在1983年9月1日写下的。这位昔日战功赫赫的老将，何以在去逝前9年就立下了遗嘱？

1983年，王震患病住进了解放军总医院。王老入院后即由牟善初教授负责全面治疗工作。会诊后，诊断王老患的是肺炎。

躺在病床上的王老喘气非常厉害，一分钟呼吸达40多次。从事

多年老年医学研究的牟善初心中十分清楚，肺炎对于一个74岁的老人意味着什么。

看到用的十多种抗生素的药物已无效，家属们的心情又如此沉重，医护人员急匆匆来回奔走……老将军以为将不久于人世。于是，便郑重地写下了“遗嘱”。

经过牟善初反复查找，最后从吐出的痰中培养出了一种叫“粪链球菌”的细菌，这种细菌要用针对性强的抗生素才能奏效。用药几天后，已濒临昏迷状态的王老病情有好转。42天后，老将军基本上恢复了健康。

1991年11月，王震副主席再次患病住进了解放军总医院。入院后病情迅速恶化。

正在武汉开会的牟善初，突然接到通知，让他火速赶回北京。

回到医院后，牟善初看到病中的王老病情已十分严重。医院很快成立了以牟善初为组长的医疗抢救小组。院长廖文海、政委梁国章随时到病房协调解决有关问题。

医疗小组每日会诊两次。如有病情变化，牟善初组织专家教授不分白天黑夜随时会诊研究，制定治疗方案。

牟善初带领医疗小组的医护人员接连闯过了呼吸衰竭、肾功能衰竭、严重心律失常、胃肠功能紊乱、吸收不良综合症和严重贫血等一道道医学难关，使王老的病情得到了控制并慢慢好转。

由于正确的诊断治疗，精心的营养和护理，一段时间后王老在人的扶持下可下地行走50多米。

这时，日本前首相，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田中角荣到中国访问，作为中日友好协会会长王震要会见田中角荣。根据王震的身体状况，医院和医疗小组经过认真研究，认为王震可以接见田中。不久，

王震在经过布置的病房中会见了田中角荣。当坐在轮椅上的田中角荣看到也在病中的王震时，这位曾为中日友好做出过贡献的日本前首相，眼中涌出了激动的泪花。

曾多次报病危的王震又出现在电视新闻联播之中。江泽民总书记来探望王老时十分高兴。江总书记对总医院廖文海院长、梁国章政委说：“三〇一医院又创造了一个奇迹啊。”

王震副主席经过106天的抢救治疗，于1992年2月身体恢复健康，出院后去广州疗养。1993年2月王震副主席在广州疗养时，病情进一步恶化。总医院得到消息后，立即派牟善初急飞广州参加抢救。

王震副主席逝世前的最后一个多月里，牟善初会同有关专家采取一切办法挽救王老的生命，但终因各种疾病集于一身，各种治疗措施都没有奏效。1993年3月12日，王震副主席离开了抢救小组，离开了全国人民。

牟善初陪伴王震过了人生最后一段路程。在抢救王老的最后日

子里，牟善初日夜守候在病床前，一个月中竟没有出过王老所住寓所的院子。

回到北京，王震夫人王季青拉住牟善初的手说：“谢谢牟教授，王老的病很重，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不要太难过了。”

经过牟善初教授倾心治疗过的还有徐向前、聂荣臻、黄克诚、杨勇、萧劲光……今天，已77岁高龄的牟善初教授，依然沿着他走过的那条轨迹前进着。

每天，他依旧同许多年轻教授一样繁忙：会诊、查房、改论文、做实验、开学术会议，为素不相识慕名而来的患者看病……

在牟善初案头的台历上，密密麻麻地记着他所要做的一切，他有永远做不完的工作。每天晚上，牟善初同年轻人一样，又泡在图书馆，为千万人的健康不停奔波寻觅良方、良药。

（责任编辑：刘家驹）



作者春雨（右）洪矛（左）和牟善初在301医院

神农架上的 现代“野人”

●朱富有 朱兴宏 李祖斌

为寻找野人他独自在神农架生活了十年之久。

今年春天，我们钻进这片“野人密林”，去追寻这个现代人颇具传奇色彩的故事。

地处鄂西北的神农架，面积约3250平方公里，其中原始森林近千平方公里，年木材采伐量10万立方米。解放初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曾派驻一个班的兵力，日夜观察情况，护林防火。由于供给艰难，生活艰苦，于1956年撤下了山。1985年，林区政府在神农架的最高峰——海拔3105米的神农顶建立了一个瞭望塔，其主要任务是防止森林起火被盗，观察报告生态情况，保护野生动物。

高18米的瞭望塔是钢筋混凝土结构，这在原始森林算得上是一个现代化的建筑物，设计者尽了最大的努力，为哨兵提供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瞭望塔的大门，是用铁板做的，以防止野猪、豹子等凶猛

野兽的袭击。但是，这荒山野林的气氛，却是无法改变的。瞭望塔周围百十里荒无人烟，扯了嗓子吼一声出去，听见的仅仅是这种声音在山野间的滚动，或者是狼、熊不够友好的粗野的呼应。野人，这最具诱惑力的动物，人类多么渴望捕捉它，一睹其风采，而在单个人的世界里，它却是一片恐怖色彩。

当地传说，1915年，有个叫王老中的人曾经被野人抓进山洞，三年之后才死里逃生。

1938年，一个叫桃花嫂的女人，被野人抢进山洞，生活了一个多月，逃出山洞后生下一个类似猴子的儿子。

1942年，当时的房县县长贾文志，带领保安队几十个人马上神农架打死了一个公“野人”，在山上煮着吃了。贾文志还留下一条“野人”腿，送给了省长。

1976年1月，一位农民上神农架割树皮，忽然看见距他两丈远的地方来了一个头发很长的“红毛野人”。这个“野人”直立行走，很快

走到了他的面前，“啪”的一下给他一个耳光，把他打昏在地……

1979年4月，农民邹永发上神农架砍柴，一个约两米多的“野人”走过来，抓住他的右手发笑，他用镰刀打“野人”的手，尽管用力很大，可“野人”还是抓住不放，顷刻，“野人”双手将邹永发撕成两半……

即便是八十年代，也有野人捕捉现代中学生的传说。

到了九十年代，也就是公元1993年9月12日，国家某部委六名工程师，在神农架风景垭，又同时发现三个“野人”

无论如何，瞭望塔都是一个恐怖的地方。谁来当哨兵？谁敢、谁愿意、谁又能够常年在这里生活下去呢？

林区政府正在为此焦心的时候，1985年6月20日，一个年轻的退伍军人登上门来，主动请缨。他叫袁裕豪。这可急坏了他的爱人，呆在那荒山野林，别的不说，冻死饿死谁能知道呢？妻子的软磨硬缠终于斗不过袁裕豪的固执。她只得找来两截粗大的竹筒，打进袁裕豪的被包。并一再叮嘱，到了瞭望塔，出门时，一定要把竹筒戴在手臂上。因为，传说野人见人就抓住胳膊哈哈大笑，如果人手套上竹筒，乘它笑昏过去，迅速抽出手就可逃跑。

就这样，袁裕豪成了瞭望塔的哨兵。这个来自南海前哨的退伍军人，从一个哨位站到了另一个哨位。

3月的神农架，到处还是银装素裹。我们经过长途跋涉，来到了神农架顶，登上了瞭望塔，36岁，身高一米八，略有些驼背的袁裕豪把我们迎进了房子。这是一间十分

别致的山顶小屋，圆形的小厅如同城市里高楼大厦上的旋转餐厅，可从四周镶嵌着玻璃的小窗口里俯瞰连绵起伏的群山，据说设计这个圆厅的目的，就是让瞭望员在吃饭时也能监视四周的林区。

袁裕豪穿着一身退了色的旧军装，他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半个野人。由于久居山野，岁月的沧桑已较为明显地表现在他的面容上；神农架山顶恶劣的气候和极度缺乏的营养，使他的牙齿脱落了三分之一。

瞭望塔最初装有风力发电机，但因风力过大，常将扇叶损坏，于是就用煤油灯照明。有时煤油烧完了，便只能到松树上挖松油。

“袁裕豪，你住在这风光秀丽的云海雾宫，真是过着神仙般的日子啊！”我们指着那翻着白浪的雾海，羡慕地说。“还神仙呢？人家都说我是‘山顶野人’”。袁裕豪风趣地答。

晚上，我们围坐在火炉边，点着松明，伴着森林的涛声和野兽的吼叫，听“半个野人”讲述野人的故事。

在尚未建立瞭望塔之前，袁裕豪就是一个“野考迷”，是神农架野人研究会会员，鄂西北奇异动物科学考察队队员。对于野考事业的痴迷，正是他登上瞭望塔的原因之一。他渴望有一朝能为世人揭开野人之谜，他将这种渴望付诸于行动，在气候允许的情况下，他便背了半自动步枪，走出瞭望塔，穿行于山野之间，他相信奇迹总会发生，谜终归要解开。

1986年8月24日中午，他像以往一样，背了枪，提了绳索，向密林里穿去。他来到一块高大岩石上，极力向远方张望，希望发现一个他渴望发现的东西。忽然，脚下岩石一阵松动，他感到自己正贴着

岩石向岩下落去……

重新睁开眼睛时，他看见的是头上30多米高的陡岩——他明白了自己是从这上面摔下来的。看看这陡岩，他怀疑自己还真的活着，他用指甲使劲地掐了一下自己的面部——疼！他试着转动一下身子，更令他惊喜的是，胳膊和腿部都没有大的损伤，只是隐隐作痛，头昏。原来，是原始森林沉积了几千年的落叶为他铺就了一张天然的席梦思，使他免于更大的灾难。只是直到最终，他也没有搞清楚自己昏迷了多长时间，他只知道，出门的时候是中午，而醒来是在一个上午，一天？两天？他不知道。独自困在深山野林，连日期都记不清，如何能知道自己昏迷的是几天几夜呢？

谜总是会一点点解开。1988年3月，在南天门一带，袁裕豪发现长40厘米的奇异脚印。后经神农架野人研究会提取脚印分析研究，的确是一种介于人和猩猩之间的高级灵长目动物的脚印。

1989年4月20日，对于袁裕豪和神农架野考事业，都是一个很有纪念价值的日子。

那天，袁裕豪的爱人罗中清来到瞭望塔，夫妻双双去巡山。当他们来到风景垭以西几公里的地方时，忽然停下脚步——离他们约20多米的山坡上，一个似人非人的怪物漫不经心地站在那里，它身高约1米7，满身長满红毛，头发蓬乱过肩，额头扁窄，眼睛下陷，嘴巴突出，胸前凸起两个乳房，屁股肥大，像一个丑陋的、穿着肮脏红衣服的女人。

“野人！”夫妇同时低语了一声，立即轻轻地蹲下身子，袁裕豪从肩上取下半自动步枪。但是，野人却转过身，朝密林里奔去，很快消失在岩石和丛林之中……

已进深夜了，野兽的吼叫，森林的涛声也渐渐沉下来。我们却绝无睡意。

我们实在吃惊，袁裕豪竟能说出那么多关于野人的科学知识：从远古的传说到复旦大学的毛发鉴定，从神农架野人的到加利福尼亚北部兰炫湾山区“毛公”……神农架野人研究会会长、鄂西北奇异动物科学考察队队长杜永林说：“袁裕豪发现野人足迹，以及夫妻双双目击野人，对研究神农架野人出没范围，及出没气候，提供了新资料，给目前处于低谷的野考事业注入了新的活力。”

三

神农架号称“华中屋脊”，海拔3105米的神农顶，被誉为“华中第一峰”。自然，瞭望塔里的袁裕豪，便是华中地区最高的居民。但是，这些冠有“第一”和“最”字的美名，并不像都市的选美活动和其他的什么冠军一样，能带给他一点点实惠。恰恰相反，每一点高度的增加，都需要他付出沉重的代价。这里每年有九个月以上的时间处于冰霜期，常年雾气沉沉，狂风萧萧，飞雪满天。气温最低可达零下40多度。他登上瞭望塔的第一天，异地的新鲜感还没有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头晕目眩，这里空气稀薄，氧气不及山下的70%。

幸福和幸运，不会随着人们的意愿如约而至，而灾难，却常常出人意料，不期而遇。

这一年冬季特别漫长。袁裕豪吃完最后一粒粮食时，冰雪仍然将山封得严实，山下的供给无法送上山来。没有粮食意味着什么？

等待吗？等待就是等死！

袁裕豪裹紧大衣，结结实实地打上了绑腿，提了步枪向雪地走去。

在部队时，袁裕豪曾经过严格的甚至是残酷的野外生存训练。那时，一架军用直升机将他们扔到荒凉的海岛后，头也不回地飞走了。他们必须在荒无人烟的海岛上生活三天！七年之前，军旅生活为他开了一张巨额的支票，今天，他终于找到兑换的地方。这天上午，两天没吃东西的袁裕豪，由于又饿又冷，还没走多远，就眼一花，脚一滑，摔倒在雪地上，并顺着雪坡滚到了几十米远的一个洼部。真是天赐良机。袁裕豪因祸得福，他睁开眼一看，前面不到两米处的一个岩石旁，一只冻僵的山鸡正躲在岩石旁避风。他忘记了手脚被摔伤的疼痛，使出浑身的劲儿，猛地跃起，迅雷不及掩耳般扑向山鸡。当双手捉住山鸡时，他连毛也顾不得拔，张开大嘴便咬住鸡喉，狠狠地吸着鸡血。这位生活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明社会的青年，为了生存，为了看护祖国的大片森林，不得不像原始人一样茹毛饮血……几口鸡血下肚，身上力量倍增。他提着吸干了血的山鸡，喜滋滋地走回住处。



瞭望塔

袁裕豪就是这样熬到了冰消雪化的日子。

记不清是那位先哲说过：世界上最可怕和最难战胜的要属孤独。袁裕豪，他一个人生活在这渺无人烟的神农架山顶，就如同八十年代的“鲁滨逊”，话儿只能对着森林讲，歌儿只能应着寒风唱，要有多孤独，就有多孤独。

一个生龙活虎、爱唱爱跳的青年怎耐得这种寂寞呢？袁裕豪从山下买回了一条狗。他把这个无言的“战友”带上山后，吃饭与它同桌，巡山与它同游；休息时逗它玩，睡觉时搂在怀里；白天讲个故事给它听，夜里唱个歌儿同它乐……这条狗成了他的好朋友，为他赶走了寂寞，给他带来了欢乐。

可是好景不长，1990年的夏天，气候异常的热，尽管这里山高风大，烈日当空的时候，太阳晒在身上还是火辣辣的，令人难受。这条狗耐不得酷暑，便中暑死了。袁裕豪这位铁汉子，抱住狗的尸体痛哭了一场……

孤独、寂寞没有使袁裕豪意志消沉，更没有动摇他当好神林卫士

的决心。这下可苦了他的妻子罗中清。她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用瘦弱的肩膀承担着全部家庭的重担、生活的艰辛。

那是1988年7月27日，瓢泼大雨下个不停，洪水的咆哮声由远而近。不一会，她家的房子被凶猛的山洪冲跨了，7岁的女儿荣荣也被洪水冲出两丈多远，幸亏被村民兵连抢救死里逃生，这场灾难后，尽管地方政府为袁裕豪重建了家院，可吃尽了苦头的罗中清，再也承受不了家庭的重负，一气之下，把女儿荣荣放到外婆家，跑到神农架顶找袁裕豪离婚去。其实，罗中清找袁裕豪闹离婚，这岂止是头一次。每当家庭遇到难处，气头上，罗中清都想到了这日子没法过。可是每当罗中清登上神农架顶，看到袁裕豪饱经风吹雨打，同样吃尽了常人难以想象和忍受的苦头时，满腔怨气也就烟消云散了。

四

神农架不仅风光秀丽，而且资源丰富。它不仅是有着两千余种草药的举世闻名的天然大药园，又是生长动物的王国，这里共有野生动物570多种，其中受国家保护的珍稀动物就有300多种，华南虎、金丝猴、白蛇、白熊……它以独特的科学价值，观赏价值，吸引着中外科学界人士，撩拨着千万游客的心弦。

正是这样，也给保护和管理神农架带来了困难。作为袁裕豪邻居的各类动物，他们表现得并不够意思，有的甚至十分霸道，经常对自己的“保护神”做一些不够礼貌的事情。

一次，瞭望塔铁门没有上锁，一只白熊大摇大摆地走进房间，它在这个陌生的场所东瞅瞅西瞧瞧，

当它巡视完所有房间，发现所有东西对它都没有用途时，十分愤怒地抬起胳膊，将装着油盐酱醋的坛坛罐罐打翻在地，然后扬长而去。

袁裕豪提着枪，却只能眼巴巴地看着这一切，害得他过了一段没油没醋、清汤寡水的日子。

初春时节，神农架万物竞发，百花争艳。此时，人们趁此大好时机纷纷涌进山里来寻“宝”。采药的，打柴的，放牧的……

1990年4月23日，袁裕豪照例去巡山。

寂静的山林，只听到鸟儿声。他沿着一条流水哗哗的山溪往森林里走，前面的树林里，升起一片白蒙蒙的雾气，而且传来一阵阵，“笃笃笃”的砍树声。

“有人偷树”，袁裕豪立刻警觉起来。

这时，几个中年汉子正砍一棵青风栎，这是一种贵重树木，属于禁止砍伐的。袁裕豪一见，火冒三丈，大吼一声：“住手，不许砍树！”那人见只有袁裕豪一人，便丢下手中的工具，一齐挥拳朝他打来，想教训教训这位爱管事的人。身材高大的袁裕豪本来就力大无比，再加上在部队学到的一套本领，这几个人根本不是他的对手。一拳两脚，他就把这伙打得哭爹喊娘，灰溜溜地逃出了林区。

袁裕豪在巡山中不讲情面，执法严厉，成了一些不法分子的眼中钉，肉中刺。他们伺机对他进行报复。一天，袁裕豪巡山回来，家里的锅、碗、瓢、盆被人砸了个粉碎，缸里的米，厨房里的菜却不翼而飞，床上的被子还让人撒了一泡尿……袁裕豪望着此情此景，苦笑一声，便拖着疲惫的身子往树林里去。好在是春天，山上的“甜甜叶”长得又嫩又甜，他摘了一把“甜甜叶”就放到嘴里猛吃起来

……

人们常说：“秋天是金灿灿的季节，是收获的季节。”然而，秋天对于袁裕豪来说是可怕的季节。秋高气爽，风高物燥，整个神农架林区的千万顷森林，就像堆起来的一码码干柴，星星之火就可以造成燎原之势。这段时间，进山采药的人特别多，他除了加强观察外，只要发现哪里有人采药，就往哪里跑，去劝说采药人不要抽烟，宣传防火知识，有时一天跑上百公里路，跑得汗流浹背，腰酸腿痛，手肿脚麻。但他从不歇息，一个劲地跑呀，宣传呀，监督呀……他知道，这里的森林是祖国的金库银库，是四化建设的重要资源。

1992年10月16日，袁裕豪吃完早饭，正准备巡山。突然，神农架西边山坡上的冷杉林中冒出一缕浓浓的青烟。“不好！森林着火了！”他来不及细想拔腿就往山下跑。为了抄近路，他遇坎跳坎，遇水涉水……他把情况报告给林区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后，又顾不得喘口气，立即带领民兵灭火队赶往火情现场，投入了灭火战斗。一天的激战，大火扑灭了，森林保住了。袁裕豪却累得两眼冒金星，双腿瘫软了。他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回到瞭望台时太阳已经西斜。他站在瞭望台上，极目远望，在斜阳下，那重重迭迭的深秋山林，红的



袁裕豪

枫树林，紫的乌柏林，黄的山杨林，青的杉树林，白的银松林，像漫天披挂下来的彩云，又像是镶满了宝石的金丝绒。闪闪灼灼，奇光异彩。他心里一阵欣喜，躺在瞭望台上便进入了甜甜的梦乡……

10年来，袁裕豪发现火情84起，都迅速及时报告了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使国家一次又一次地避免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袁裕豪保护着神农架，党和人民也时刻关怀着他。在生活上也尽力为他作周密的考虑。从中央到地方，从军队领导到地方武装部门，凡到神农架顶的人，都要为袁裕豪带上新鲜水果、蔬菜及必要的生活用品。1992年，组织曾决定调他下山，他说，苦的确是苦，可我走了谁来不都是苦？再说，我已经适应了，我就呆在这儿吧！

敬礼！为军旗增辉的神农“野人”。（责任编辑：刘家驹）



李宗仁 率杂牌军 血战 台儿庄

● 解力夫

日军自1937年12月13日占领南京后，又相继占领了杭州和济南。在此期间，日军华北派遣军多次向统帅部提出“为使华北、华中连接起来，进行徐州作战以及对武汉之敌施加威压”的建议。为了迅速实现灭亡中国，连贯南北战场，日军决心以南京、济南为基地，从南北两端沿津浦铁路夹击徐州。

为了阻止日军进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特任命李宗仁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这个战区地域辽阔，包括山东全省，江苏、安徽两省的大部，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李宗仁从广西来到徐州就任时，鲁南保卫战已进入紧张阶段。敌军板垣、矶谷两师团正以台儿庄为会师目标，并策应津浦路南段之敌军，企图合攻徐州。敌军南北两

路竞相前进，摆出一个围歼第五战区守军的态势。

周恩来助阵

为了鼓舞士气，增强抗战必胜的信心，当广西学生军从桂林出发，经过武汉，准备开赴第五战区参加徐州会战时，中共周恩来副主席，应白崇禧和程思远之邀，对这批学生军作了热情的讲话，鼓励他们奋勇杀敌，报效祖国。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程思远先生，对这段早年的经历，作了如下的回忆：

“周公有着气宇不凡的风度，和蔼可亲而令人尊敬的仪容，特别是他那双炯炯有神、清澈敏锐的眼睛，使人感到它具有有一种特别神奇

的感人的力量。周公那天的讲话是鼓励这些青年们利用一切机会，利用一些办法，动员人民投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以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当时听众对周公热情洋溢的讲话，无不报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这是令人毕生难忘的一个场面。”

时任国民党副总参谋长的桂系将领白崇禧，奉派去徐州协助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作战前，特邀中共周恩来副主席和第十八集团军叶剑英参谋长到其武汉熊廷弼路寓所，请教对敌作战的指导方针。周恩来对白建议：在津浦路南段，已令新四军张云逸的第四支队协同李品仙、廖磊两集团军，采取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的联合行动，运动于淮河流域，使津



庞炳勋

浦路南段的日军，时刻受到威胁，不敢贸然北上支援南下日军。同时在徐州以北，又必须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方针，守点打援，以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程思远说，白崇禧对周恩来的建议，深加赞赏。他到徐州协助李宗仁时，基本上采取了周公所指出的方针。

为了进一步增强决战决胜的信心，在台儿庄大战前夕，周恩来又派张爱萍以八路军代表的名义，前往徐州会见李宗仁，转达中共的支持和关注。张爱萍向李宗仁指出，如今鲁南战役的条件已经成熟：一是日军占领济南后南下，几乎是长驱直入；二是济南以南，徐州以北的地形很好，台儿庄、张庄一带都是山区，地形对我有利；三是广西军队是有战斗力的，北边有八路军、南面有新四军在战略上配合，应该在这样有利的地形和敌情下，集中兵力打一个大仗，既可给日军一次沉重的打击，又可提高广西军队在整个民众中，特别是国民党中的威信。中共的建议受到了李宗仁的重视，从而促使他下了血战台儿庄的决心。

张自忠捐嫌

1938年2月上旬，临沂告急，该地为鲁南军事重镇，得失关系全局。处此紧急关头，既无总预备部队可资调遣，只好就近抽调原守海州的庞炳勋第三军前往临沂，堵截敌人。

庞炳勋原来是西北军冯玉祥部，第二混成旅旅长，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时，蒋介石暗中收买庞炳勋，庞倒戈反冯，蒋介石升他为第四十军军长。

此时，这位庞军团长的职位虽比军长还高，但他所指挥的军队则只有五个步兵团。庞已年逾花甲，这次对其编入第五战区序列，觉得李宗仁是他的晚辈，受李指挥，不是滋味。

对这位倒戈将军的到来，李宗仁既热情欢迎，又保持高度警惕。

他诚恳地对庞说：“将军久历戎行，论年资，你是老大哥，我是小弟，本不应该指挥你。不过这次抗战，在战斗序列上，我被编为司令长官；以私交而言，我们实如兄弟，不应分什么上下。”

接着，李宗仁又说：“我们在内战中搅了二十多年，都是被迫在漩涡中打转，但是仔细回想那种生活，太没有意义了，黑白不明，是非不分，败虽不足耻，胜亦不足荣。今日天如人愿，让我们这一辈子有一个抗日报国的机会，今后如能为国家民族而战死沙场，才真正死得其所。你我都是四、五十岁以上的人，死也值得了，这样才不愧作一个中国军人，以终其生。”

庞炳勋听了李宗仁的一番诚挚的话，很受感动，他说：“长官德威两重，我们当部属的能在长官之下，为国效力，万死不辞，一定同敌人拼到底，请长官放心。”

2月下旬，敌我两军在临沂县城发生激烈的攻防战。敌军以一个师团的优势兵力，并配属山炮一团，骑兵一旅，向庞炳勋部猛扑。第三军团全体将士，据城死守，日军在飞机大炮的配合下，连日反复冲杀，伤亡枕藉，竟不能越雷池一步。当时随军在徐州一带观战的中外记者和外国使团武官不下数十人，大家都想不到一支最优秀的“皇军”，竟受挫于劣势装备的中国“杂牌部队”。一时中外哄传，称赞之声四起。

日军久攻不下，死伤惨重，又调来援军约5000人，配属大炮30余门，坦克20余辆，企图强行通过我临沂防地向台儿庄进攻。先后攻占我沂河以东汤头以南沙岭子、白塔、太平、亭子头等村庄。我军虽奋力拼搏，但因牺牲太大，渐感不支，连电告急。

临沂距台儿庄90公里，如果临沂不保，日军则可直趋台、徐。威胁陇海、津浦。在日军猛烈攻击下，李宗仁一面电令庞炳勋“坚决保卫，拒敌前进”；一面急调张自忠率五十九军北上，援助庞部作战。



张自忠

3月12日下午,张自忠偕参谋长张克侠率部赶到临沂。

3月14日,庞、张两军密切协同,向敌发起反攻。其攻势如疾风暴雨,敌军腹部受敌,飞机、大炮、坦克均失去效用。经五昼夜激战,敌军全线败退。我军乘胜跟踪追击到汤头,敌又向莒县逃窜。同时庞部第一一五旅亦将临沂城东南之残敌肃清。这一战共毙敌3000余人,击毁敌机一架,坦克六辆。这是台儿庄在大战前的序幕战。

这次鲁南战局吃紧,指令五十九军调来五战区增援。张自忠是有顾虑的。因为他和庞炳勋有仇隙。原来蒋、冯、阎中原大战时,庞、张都是冯系健将,彼此亲如兄弟。不料庞氏受蒋收买倒戈,并且出其不意袭击张自忠师部,张氏几遭不测。张这次奉调来徐州时,便私下向五战区参谋长徐祖诒陈述这一苦衷,表示在任何战场可拼一死,唯独不愿与庞炳勋在同一战场。

然而在目前形势下,庞炳勋在临沂被围请援,情况危急,除五十九军外,又无兵可调。徐祖诒参谋长颇感为难。李宗仁闻讯,乃将张请来,诚恳地对他说:“你和庞炳勋有宿怨,我甚为了解。不过以前的内战,不论谁是谁非,皆不为不名誉的私怨私仇。庞炳勋现在前方浴血奋战,乃属雪国耻,报国仇。我希望你以国家为重,受点委屈,捐弃个人前嫌。你务要绝对服从庞军团长的指挥!”

张自忠为人侠义,当即毫不犹豫大声应道:“绝对服从长官命令,请长官放心!”

当第五十九军到达临沂城西一带村庄时,庞炳勋收到李宗仁电报,亲自出城欢迎张自忠。他紧紧地握着张的手说:“寒忱兄,太感激了!你们真是雪中送炭啊!”

“同仇敌忾,应该前来支援。五



孙连仲、田镇南、池峰城(左起)在台儿庄指挥所

十九军听从庞军团长指挥,绝对服从命令!”

“不要叫我军团长,还是兄弟相称,有事共同商定。”

庞炳勋见张自忠一片爱国热忱,一心对敌,虽没提过去的事,却内心负疚,用商量的口吻说:“第三军团原有五个团,伤亡不小,现在只剩下三个团左右的兵力。我初步考虑:可否请寒忱兄率部接替城防,第三军团沿沂河西岸戒备,待敌进犯时与敌决战。不知徐参谋长和寒忱兄意见如何?”

张自忠暗自吃惊,号称第三军团,只剩下三个团左右的兵力,怎么能和精锐的板垣师团决战?那不是以卵投石吗?但他又不好向庞炳勋头上泼冷水。根据他在河北省和敌人作战的经验,与其待敌人进攻,不如主动攻击敌人。但为了表示对庞炳勋和徐祖诒的尊重,他没有吭声。

徐祖诒参谋长认为,第三军团守卫临沂已经积累了经验,熟悉城内情况,是否要五十九军接替城防,值得进一步考虑。他和庞炳勋再次征求张自忠的意见。

“我建议以攻为守。与其待敌

进攻,不如我主动向敌侧背出击,以解临沂之围。”张自忠说。

庞炳勋和徐祖诒都同意这一意见。张自忠主动请战:“面对现代化的精锐板垣师团,必须充分利用夜战、近战才能奏效。应该打破常规,提前开始行动。”最后双方商定,3月14日同时行动,向敌人发动反击。

张自忠返回部队后,立即召集营以上干部开会紧急动员,第二天夜里,五十九军就迅速强渡沂河,一举插入板垣师团的右侧背,向敌人发起猛烈的反击。板垣师团没料到困守临沂的第三军团,竟然会抽出这么大的兵力越过沂河袭击他们坚固的防线,一夜之间,敌人损失惨重,不得不放弃进攻临沂县城。在三天激战中,双方冲杀多次,付出了重大牺牲。战后,李宗仁说:“若非张氏大义凛然,捐弃前嫌,及时赴援,则庞氏所部已成瓮中之鳖,必致全军覆没。”

王铭章死守

此时,沿津浦线而下的矶谷师团,则因韩复榘不抵抗的影响,日

益向南推进，距战略要地台儿庄愈来愈近。在此紧要关头，由邓锡侯率领的川军第二十二集团军，及时自郑州赶来增援。

川军邓锡侯部，原驻四川成都。“七七”事变后，他们激于民族大义，请缨出川抗战，奉令编为第二十二集团军，前往第二战区参加山西保卫战。这支部队长途跋涉，艰苦备尝，他们沿途又无兵站补给，生活极度困难，因此每遇晋军的军需库，即擅自动用，这样可惹恼了阎锡山，阎随即电告统帅部：“这支川军是抗日不足，扰民有余的土匪军，必须调离山西！”在此情况下，身为副总参谋长的白崇禧又给李宗仁打电话，问第五战区要不要？李宗仁说：“我这里正需要援兵，请赶快把他们调来徐州！”白又介绍说，他们装备不济，作战能力差。李宗仁恳切地说：“诸葛亮扎草人做疑兵，他们总比草人好些吧？”

邓锡侯率川军来到徐州，李宗仁配给500支新枪、一批子弹和若干迫击炮。仅此区区物资，川军欢天喜地。没隔几天，他们不顾长途跋涉之苦，昼夜疾行，飞速赶到前线，以王铭章的一二二师固守滕县，一二四师在城外策应。然日军

快速部队万余人将滕县包围，并以重炮及坦克猛攻。王铭章师长决心与城共存亡，血战三昼夜，毙敌2000余人，阻滞了敌人前进，为我军在台儿庄歼敌创造了有利条件。终因众寡不敌，为敌攻破。全师除少数突围外，王师长和师参谋长赵渭滨以下，绝大部分为国捐躯。

李宗仁对王铭章及其所部坚守滕县作了高度评价：“若无滕县之死守，焉有台儿庄大捷；是台儿庄战果，实滕县先烈造成之也。”

3月下旬，敌矶谷师团主力沿津浦路台（儿庄）枣（庄）支线南下，当时敌军拥有坦克七、八十辆，重炮百余门，在飞机的掩护下，向我台儿庄发起猛攻。台儿庄保卫战由此展开。

此时，第五战区为确保台儿庄阵地，以拱卫徐州，进行了部署调整，命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三个师扼守台儿庄正面阵地，命汤恩伯的第二十军团以一部担任台儿庄至韩庄间运河南岸防务，以两个军向峰县、枣庄日军侧背攻击，准备配合孙连仲部围歼敌人。3月24日，蒋介石到徐州督战。同时派参谋总长白崇禧、军令部次长林蔚、厅长刘斐等组织临时参谋团，到徐州协

助李宗仁指挥作战。

这一战役从3月到4月，历时一个月。日军投入的兵力有第五、第十两个师团，又一个炮兵团及伪军两个师另一个旅，总计约七、八万人。中国方面先后投入作战的，有第三军团、第二十二军团、第二集团军和第五十九军等部队。整个战役中，敌我双方反复争夺，我先后打退了敌人八次进攻，战况极为激烈。

孙连仲苦战

3月23日，敌军冲到台儿庄泥沟车站。24日，敌以猛烈炮火轰击我刘家湖一带工事，然后以坦克为前导，向我阵地猛冲。当晚，敌军一部突破了台儿庄城东北角。中国守军第二集团军第三十师，在师长池峰城指挥下，以一部坚守城内，将突入的日军迅即赶出城外；然后以大部在城外与敌人短兵相接，常为争夺一村一地，与敌军反复肉搏一、二十次。至25日晨，在援军炮兵和装甲车的配合下，将台儿庄北丢失的五、六个村庄相继收复。日军虽伤亡惨重，却能倚其优势火力，用炮兵向我城周阵地猛烈轰击，日机轮番轰炸，迫使守军逐渐后退。然我军以血肉之躯与敌方炮火与坦克相搏斗，至死不退。

3月27日，日军得到增援后，对台儿庄发起了第三次猛攻，突破了城东北角。双方展开了激烈的巷战。这时，守军原来的四个团死伤近三千人，28日，日军占领了城西北角。城内守军第三十一师全力奋起反击；城外炮团也积极配合，遏制了敌军的攻势。

敌人久攻不下，第十师团长矶谷老羞成怒，于3月29日亲临台儿庄前线坐镇，当晚日军占据了城内东半部。此时池峰城师利用宅院



台儿庄中国军队炮兵阵地

墙垣同敌军展开巷战，与敌人白刃拼搏。城外守军同时发起反击，截击了日军炮兵部队，在城周围与敌人激烈厮杀，3月31日，台儿庄保卫战进入最严重的关头。

在此紧急情况下，李宗仁急令汤恩伯军团迅速南下夹击敌军。汤恩伯消极避战，在姑婆山逡巡不前。李宗仁严厉警告汤说：“如再不听军令，致误戎机，当照韩复榘的前例严办！”蒋介石也致电汤恩伯，督令其率师南进。汤部才被迫向台儿庄开进。

然而，远水解不了近渴，到4月1日以后，台儿庄守军第三十一师的四个团已经伤亡过半；由第三十师调入城内的两个团接替了部分阵地，伤亡也很严重。至4月3日，台儿庄城西北门、北门、东门、东南门均陷于敌手，守军仍据守南关一隅，拼死坚守，并组成大刀队夜袭敌人，予敌以很大杀伤。3日和4日，敌军连续使用燃烧弹，妄图摧毁城南所有房屋和军民，将台儿庄夷为平地。城内各守备队利用断墙残壁，挨街逐户与敌人周旋搏斗，并组织起二百余人的奋勇队，偷袭敌人据点。

我台儿庄守军虽然英勇奋战，但伤亡太大，实力愈来愈不支了。4月4日深夜，第二集团军司令孙连仲向战区司令长官报告说：“第二集团军已伤亡十分之七，敌人火力太强，攻势过猛，但是我们把敌人也消耗得差不多了。可否请长官答应暂时撤退到运河南岸，好让第二集团军留点种子，也是长官的大恩大德！”

李宗仁接此电话后考虑了许久。他预计汤恩伯军团明日中午可进至台儿庄北部，第二集团军如此时放弃台儿庄，岂不功亏一篑。因此，他对孙连仲说：“敌我在台儿庄已血战一周，胜负之数决定于最后

五分钟，援军明日中午可到，我本人也将于明晨来台儿庄督战。你务必守到明天拂晓。这是我的命令，如违背命令，当军法从事！”在电话中，李宗仁还要孙连仲不但要守到明天拂晓之后，而且今夜还要向敌夜袭，以打破敌军明晨拂晓攻击的计划。李宗仁说：“坚持就是胜利，待明天援军到后，我们就可对敌人实行内外夹击！”

当时，孙连仲的预备队已全部用完，组织夜袭已十分困难。但经过动员，轻伤员自动组织起来，主动要求承担向敌人进攻的任务。为了表示向敌人反击的决心，孙连仲对池峰城命令说：“士兵打完了你就自己上前填进去。你填过了，我就来填进去。有谁敢擅自退过运河者，杀无赦！”

池峰城师长奉命后，与敌坚决逐屋抵抗，任凭敌人如何冲杀，也死守不退。战至黄昏，敌人停止了进攻。及至午夜，我军先锋敢死队数百人，分组冲入敌阵，人自为战，奋勇异常，官兵手持大刀砍杀。日军血战经旬，已精疲力竭，不料我军尚能乘夜出击，在慌乱中仓促应战。台儿庄市街，竟为我军一举夺回四分之三。

李宗仁督师

4月5日拂晓，汤恩伯军团抵达台儿庄以北，我军遂对矶谷师团形成反包围。这时，李宗仁率长官部随员若干人，驱车赶到台儿庄郊外，亲自指挥对矶谷师团的歼灭战。黎明之后，台儿庄北面炮声渐密，汤军团已在敌后出现，敌军撤退不及，很快陷入重围。台儿庄守军随即配合外线攻势，由内线反击，在强大炮火支援下，我军敢死队冲入敌军阵地，勇猛刺杀敌人。4



邓锡侯

月6日，李宗仁将军命令全线出击，顿时杀声震天，血流成河，我军所向披靡。对此，李宗仁在回忆录中写道：

“敌军已成强弩之末，弹药、汽油用完，机动车辆多被击毁，其余也因缺乏汽油而陷于瘫痪。全军落胆，狼狈突围逃窜，溃不成军。我军骤获全胜，士气极旺，全军向敌猛追，如疾风之扫落叶，锐不可挡。敌军遗尸遍野，被击毁的各种车辆、弹药、马匹遍地皆是。矶谷师团长率残敌万余人突围窜往峄县，闭城死守，已无丝毫反攻能力了。台儿庄之战至此乃完成我军全胜之局。”

台儿庄战役共歼日军2万余人，缴获各种大炮70余门，战车40余辆，装甲车70余辆，步枪万余支，及其他战利品。台儿庄大捷，是国民党正面战场自抗战以来取得的最大的一次胜利。这个胜利不但给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以一个有力的打击，鼓舞了中国人民抗战士气，而且在国际上也有很大的影响。（责任编辑：仲文）



戴安澜

中国远征军师长

戴安澜

魂系缅甸

● 屈德寿

枪，在我们肩上；
血，在我们胸膛。
到缅甸去吧，
走上国际的战场。
……

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1942年的春天，滇缅公路上，出现一支机械化队伍向西南疾进，这是中国远征军应英军的要求，派出入缅作战的先遣部队二〇〇师。年近不惑的师长戴安澜将军，器宇轩昂、威风凛凛地端坐在敞篷吉普车里，指挥队伍出保山，渡怒江，过龙陵，越芒市，直奔国门畹町而去。

孤军深入无援

中国远征军是根据1941年底中英签订的《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而组建的。远征军下辖第五、第六、第六十六军共约11万人。第五军，是中国第一个机械化军，国军中的精锐。第五军下辖第二〇〇师、新二十二师、第九十六师。第二〇〇师的坦克、大炮、装甲车等重装备，是近期苏、美援助的，又是第五军中的佼佼者。

远征军由中国战区最高统帅部参谋长美国将军史迪威任总指挥，卫立煌（后罗卓英）、杜聿明任正副长官，统一指挥入缅作战。不

久，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又明确：先期入缅的第五军、第六军，由杜聿明统一指挥，而杜聿明又归英缅军总司令胡敦将军指挥。

1942年2月16日，仰光告急，胡敦请求中国远征军火速入缅，并指名要第五军前往。

第五军的战斗力令胡敦佩服。第五军曾于1939年底，在广西昆仑关战役中，全歼日军第五师团第十二旅团6000余人，并击毙其旅团长中村正雄少将。此役，第二〇〇师师长戴安澜表现最为突出，他率部三次夺回昆仑，受到国民政府嘉奖，授予宝鼎勋章。

戴安澜号海鸥。1904年出生于安徽无为。历任排、连、营、团长，在古北口抗战中，获云麾勋章。

抗日战争爆发后，戴安澜先后担任旅长、副师长，参加了保定漕河、漳河、台儿庄、中艾山等战役和武汉会战。在台儿庄战役中获宝鼎勋章。1939年1月，接替杜聿明第五军第二〇〇师师长之职，升少将军衔。不久，率部参加随（县）枣（阳）战役和长沙保卫战。此后，参加昆仑关战役，左臂负伤。

杜聿明与戴安澜同是黄埔生，又是多年的上下级关系，加之第二〇〇师装备精良，官兵战斗素质、

文化素质均堪称第一流。所以，在第五军出国作战时，杜聿明以第二〇〇师为先遣。

部队入缅地形复杂，气候恶劣，高山环列，河流交错，道路稀少，丛林遍布于境，不利于机械化部队运动。虽是春天，气温达摄氏40度。加之缅甸老百姓痛恨英国殖民主义者胜过日本人，他们认为，中国军队是英国帝国主义的帮凶，因而不愿接近中国军队。

3月8日，戴安澜率第二〇〇师赶到同古之时，也是日军攻陷仰光之日。同古距仰光仅有250公里，而此时远征军的后续部队新二十二师和二〇〇师留下的重炮团及辎重团都因英军答应运送未能实现，至今还远远摆在后方的梅谋。二〇〇师孤军深入缅境已达1000公里。

胡敦迅速脱身

眼下，同古的情况令他吃惊：城内店铺关闭，百姓纷纷逃离，一片兵荒马乱的残败景象。

戴安澜心急如焚，遂带着师参谋长周之再，连夜找到英缅军总司令胡敦将军了解情况。

胡敦见救星来了，这位英国绅士就想赶快移交城防，说道：

“戴将军，这里仓库里的物资都给了你们，我还有别的任务，不能在此久留，今天就要走。”

戴安澜没料到这个英国佬急于要脱身，便态度强硬地说：“阁下必须把城防工事交代清楚，把敌情详细介绍清楚，否则不能走。”

“这……我也不太清楚。”胡敦满面羞红，对身边的参谋说，“快去请斯考特将军来。”

英军第一师师长兼同古城防司令斯考特少将带着一伙参谋来到，这才开始巡视城防。

同古城被一条仰瓦铁路分割成两半，路西为旧城，路东为新城。旧城墙高且厚，有利防守；新城街道纵横，利于巷战。城东为锡唐河，城北10余里为克容冈机场。英军在这些地区仅有一些沙袋堆砌成的简易工事。

巡视中，戴安澜发现：英军正在撤收帐篷。这表明，不仅胡敦要走，他的军队也要撤走，根本不打算在同古城抵抗，哪里还谈得上联合作战。

戴安澜一路询问的敌情，英军无一人能回答。工事简陋，敌情不明，如何接防？

胡敦大概看出戴安澜不悦，便道：“戴将军，我很惭愧，您如果不具备防守条件，可以不承认是接防，其责任由我来负，我向你们的蒋委员长解释。”

“您是怕我们不接防是吗？不，我们中国军队是有严格纪律的，蒋委员长命令我们守同古，我们就绝不含糊。”

戴安澜说罢，立即令特种兵侦察营少校营长林虎派出分队，迅速察明同古周围的敌情。

就这样，胡敦算是交了防，便带着英军第一师溜走了。

紧急布防

戴安澜下定与日寇决一死战的决心，在同古坚守待援，消耗拖住敌人，为主力集中争取时间。

经数日抢修，同古城已构成地上与地下相结合的立体城防工事。

此时，戴安澜突然接到远征军参谋团团团长林蔚的电令：“远征军主力尚未到达之前，不要在同古作过多的牺牲。如日军势大，可先行退往平满纳，以便保存实力。”

戴安澜清楚，林蔚是陈诚系的骨干，杜聿明是何应钦的中坚，陈何之间派系斗争由来已久，双方斗法竟然斗到国外来了，戴安澜不得不电告在梅谋的杜聿明，请示明令。

杜聿明接电大怒，火速赶到同古，见了戴安澜就训斥：“你怎么能听林蔚老杂毛的狗屁命令？同古位置突出，日军北犯首当其冲。所以，要你们二〇〇师作好独立作战的准备，挡住敌人的前锋，掩护我军主力集中。”

“请杜长官放心，我戴安澜就钉在同古了。”

杜聿明又若有所思地说：“衍功，现在缅甸战局恶化，远征军指挥机构重叠，不光是林蔚插手，那个史迪威也来了，一副救世主的面孔。还有英国已任命亚力山大接替胡敦英缅军总司令职务，以此来节制史迪威，不知还要出些什么主意哩！”

指挥混乱，戴安澜有同感，但他最担忧的还是他的重炮团和辎重团至今尚未到达同古。无重炮，二〇〇师的战斗力就大为削弱了。

首战获胜

3月18日晨，第二〇〇师打响了对日作战的第一枪。

前方有许多英缅军败退下来，

林虎营长已令前哨分队与日军接上了火，准备且战且退，将鬼子诱至皮尤河。

次（19）日凌晨，日军以500余人组成的快速搜索队，搭乘轻型战车、卡车和摩托车，向皮尤河开进。

当日军先头车冲上皮尤河大桥时，林虎即下令引爆桥上炸药，几声巨响，桥面断裂，先头几辆车掉进河里，后面的车刹不住也冲进去几辆。接着，林虎又命令北岸伏击部队开火，顿时成串飞弹击中鬼子兵，倒地一大片。后面的敌人见势不妙，丢下无数尸体，弃车逃进路旁森林。

林虎立即率部冲进森林，扫荡残敌，歼灭日军100余人，并击毙少佐一名。

从少佐身上搜出军用地图、机密文件和日记等，从中得知：他叫矶部一郎，日军第五十五师团一二联队搜索队长。同时还弄清了日军的进攻方向和兵力。

皮尤河首战告捷，共歼日军400余人，炸毁敌轻型战车3辆、卡车7辆、摩托车10辆，并缴获大批战利品。我军仅轻伤6人。

戴安澜师长兴奋异常，传令嘉奖为同古大战立了头功的少校营长林虎，并号召全师官兵向其学习。

他又令林虎，除留下1个连守卫皮尤河外，其余兵力按既定计划主动撤往鄂克春协防。

拖住鬼子

皮尤河一战，是日寇入侵缅甸以来，首次遭到的沉重打击，使日军第五十五师团团长竹内宽中将深感不安，凭他的直觉：对手已经不是英缅军了。

于是，调集重兵再次进攻皮尤河。林虎留下的连队，在给敌以杀

伤后，于天黑主动撤至鄂克春。

3月20日晨，竹内宽以步骑混成联队，在飞机大炮配合下，对鄂克春发起了猛攻。

戴安澜即令林虎率特种兵侦察营绕道敌后，进行袭扰牵制，以配合黄景升坚守鄂克春阵地。

双方在鄂克春激战了两日，互有伤亡，日军未能前进一步。

竹内宽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发现鄂克春东北有座山头，如果攻下此山，即可切断鄂克春与同古的联系，直取同古。此山名坦塔宾，是远征军第五九八团三营一个连在此防守。

竹内宽欣喜若狂，即令第一四三联队在10余辆坦克的配合下攻击坦塔宾，同时以第一一一联队继续攻鄂克春。

坦塔宾很快被日军攻占，戴安澜即派师指挥官兼第五九八团团长郑庭笈前往鄂克春加强指挥。

第五九八团三营营长祖大寿率一个连冲向坦塔宾，与鬼子兵拼开了刺刀。

此时，黄景升带两个连赶来。他组织士兵们用集束手榴弹打坦克，先后将敌十一辆坦克炸瘫，日军溃逃，坦塔宾阵地终于夺回来了。可是祖大寿带来的人只剩下了几个，他本人也多处负伤，黄景升腿上也被捅了一刀。

郑庭笈赶到阵地上，见黄景升满脸血污，腿缠绷带，人也变了形，惊呼：“天啦！你怎么成这个样子，快下去，这里我来指挥。”

“没事。”黄景升那血污的脸上露出一排白牙笑了。

3月23日，日军的进攻部队增至两个联队，并有山炮15门，坦克25辆，飞机30架配合作战。黄景升组织敢死队用集束手榴弹打坦克，以步机枪射击跟在坦克后面的鬼子兵，他自己也端起卡宾枪射

击。敢死队员们前仆后继，一连打掉5辆坦克。黄景升一边射击，一边大喊：“打得好！”一营营长金彪赶来劝阻，他根本不听，仍继续射击，就在此时，落下一发炸弹，炸得黄景升血肉横飞，金彪也被气浪推到一边，身上几处负伤。

黄景升的牺牲使鄂克春阵地上涂上了一层血腥的色彩，尸堆如山，血流成河……

坦塔宾阵地上也是一片焦土，三营营长祖大寿在同鬼子拼刺刀中，胸负重伤，口吐血沫身亡。

是日晚，鬼子又发动了进攻！一营将士猝不及防，仓促应战。混战中，金彪被流弹击中，倒地阵亡，防线被日军突破。

在此紧急关头，郑庭笈率二营赶到，将鬼子撵出了阵地。他以二营坚守鄂克春阵地，令一营撤回同古休整。

血战同古

日军在鄂克春苦战4天，未能突破防线。

这使日军第十五军团军团长饭田祥二郎中将大骂竹内宽无能，立即将从马来半岛登陆的第五十六师团调来与第五十五师团会战同古。这样，日军的兵力已4倍于第二〇〇师，达4万多人。饭田将两个师团的兵力，在飞机、大炮配合下，分三路出击：一路攻鄂克春、坦塔宾；一路侧击锡唐河；一路绕过锡唐河向同古北侧克容冈机场攻击，形成包围之势。

戴安澜面对日军的强大攻势，沉着镇定。他一面指挥作战，一面为第二〇〇师壮烈殉国的烈士们举行葬礼。

3月24日，戴安澜、高吉人、周之再、郑庭笈和士兵们肃穆列队同古城下，脱帽默哀。无数支枪管举过头顶，骤然响起悲凉而庄严的

枪声。士兵们将山坡上盛殓黄景升、金彪、祖大寿和一批士兵遗体的棺木抬进已掘好的墓坑下葬。

山风呜咽，丛林垂首。

戴安澜缓缓转过身子，戴上军帽，对着一个个冷峻的面孔，悲愤地说：“弟兄们，自同古开战以来，你们打得很好，打掉了鬼子的狂傲，打出了中国人的威风！但是，我们的一些好兄弟为国捐躯了……”他眼眶内泪珠滚动，“仗还要在缅甸打下去，直到把日寇赶走！”

就在举行葬礼的这天下午，克容冈机场遭到日军第一四三联队的攻击，工兵团力战不支，于当晚失守，同古与后方的联系被切断。

面对严峻的势态，戴安澜决定放弃鄂克春、坦塔宾等前进阵地，收缩兵力，固守同古城。

为了确保与军部的联系，戴安澜率师指挥部迁往锡唐河东岸山区，留下郑庭笈坐镇同古城指挥。

在调整完战斗部署后，戴安澜对军官们深沉地说：

“在座的诸位大多数都是受训于黄埔的军人，还记得黄埔军校的校训吗？”

众军官齐声回答：“胜则举杯相庆，败则取义成仁！”

“现在到了以身实现校训的时刻了，怎么办？”戴安澜问。

郑庭笈首先表态：“有我无敌，有敌无我！城在人在，城亡我亡！”

“郑指挥官的话也代表了我的心。”第六〇〇团团团长刘少华说。

第五九九团团团长柳树人勃然而起：“扬威异域，虽死犹荣！”

“很好！”一丝笑容在戴安澜那严峻的脸上闪过之后，他当众立下了郑重的遗言：“余奉命固守同古，誓与城池共存亡。余战死，以副师长代理；副师长战死，以参谋长代理；参谋长战死，以步兵指挥官代理。”

言之铿锵，掷地有声。

师长表示了死战的决心，各团长、营长纷纷仿效，也指定了自己的代理人。

顿时，师指挥部笼罩在庄严肃穆的气氛里，人人脸上挂着冷峻、诀别的神情，像是预先在为自己举行追悼会。

散会时，戴安澜把高吉人、周之再、郑庭笈留下。他说道：

“虽然说军人的后事最简单，但自古以来顶天立地的英雄，在生离死别之际，也难免儿女情长。这里有一封信，请三位过目，倘若衍功殉国，请转交拙荆……”

他说罢，把信放在桌上，高吉人拿过一看，那上面写着：

荷馨爱妻如见：

余此次奉命入缅，不禁感慨万千。在国内时，见到日寇侵略我土地，蹂躏我父老兄弟，不共戴天！来到缅甸，又见 35 万华侨，倍受外人欺凌，我炎黄子孙竟至如此，是国威不扬之故。倍感军人职责之重，倘不能消灭倭寇，扬我中华之威，何颜再见江东父老！

目前，余率部固守同古，援军不至，又被包围，唯决心与城池共存亡，以报党国栽培，祖国父老养育之恩。

余若殉职，乃无尚光荣，望爱妻勿过分悲伤，严教子女，忠君爱国，以雪国耻为己任，以光大我中华为目的，余虽死亦含笑九泉矣。

勿此即颂

平安！海鸥手书

民国 33 年 3 月 24 日于同古
三人看罢，不禁怅然心酸。

全力斯守

3 月 25 日拂晓，竹内宽发现第二〇〇师收缩阵地，这才跨过使他流尽了血、伤透了脑筋的鄂克春、坦塔宾防线，逼近同古城下，开始

攻城。

还是老战术，飞机加大炮。但以每小时成百吨炸弹、上千发炮弹的密度向同古城倾泻。城中建筑物成了一片焦土。

第二〇〇师依托坚硬柚木支撑的地下坑道，与敌周旋。郑庭笈待敌炮火延伸、步兵出动攻击时，指挥士兵们冲出坑道，杀得鬼子尸横遍地。气得饭田祥二郎军团长大骂竹内宽蠢猪，喊叫使用毒气！

次日，饭田调集第五十五、五十六师团的精锐部队，突袭同古城西北角，并发射大量的糜烂性毒气弹。第六〇〇团在团长刘少华的率领下，奋战竟日，终因城墙坍塌，中毒甚多，伤亡过大，被迫退至铁路以东新城。

竹内宽立即驱动部队进攻新城，再次发射毒气弹。

戴安澜忽然想起英国人留下的仓库里有防毒面具，当即派人送到第六〇〇团阵地上，并授以歼敌之计：当敌发射毒气弹时，令士兵们戴上防毒面具，隐蔽在工事内；待敌人以为华军中毒失去战斗力，大摇大摆冲入我军阵地时，再突然跃出工事，一举歼灭之。

这个办法果真奏效，把企图占领阵地的鬼子兵，干净、彻底扫个精光！

日军在第六〇〇团阵地上碰了壁，遂转头加紧猛攻第五九九团阵地。第五九九团团长柳树人率部力战不支，即向郑庭笈告急。郑庭笈只得把最后一支预备队——骑兵团派出去。

双方战至 3 月 28 日夜，第二〇〇师已是精疲力竭之时，师指挥部又突然遭到日军第五十六师团搜索联队的袭击。

戴安澜欲打电话令郑庭笈派兵来援，电话不通，只得一面向杜聿明发电报，一面令身边仅有的两

个连应战。自己又提枪与高吉人、周之再率警卫连和师部勤杂人员抵抗。

巧妙突围

杜聿明接到戴安澜的电报心急火燎，加之各方面反馈回来的情况又使他不安。

首先，各路日军不断向同古方面集中；其次，美国空军不愿过早暴露实力，而未能协同新二十二师攻击日军，致使该师被阻于同古以北叶达西地区，不能前往同古增援第二〇〇师；其三，第九十六师登上火车后，又被英国人撇在曼德勒不走了；其四，第六军入缅后，遭到日军牵制，前进迟缓；其五，早已集结滇西的第六十六军，却只有孙立人的新三十八师入缅。

形势险恶，杜聿明不顾史迪威的反对，坚决命令二〇〇师突围。他又令廖耀湘的新二十二师不惜一切代价向同古攻击前进，接应二〇〇师突围。

3 月 29 日黄昏，戴安澜接到杜聿明的突围命令，他当即巧施突围计：令同古新城的部队，先行猛烈反击，给敌造成继续坚守的假相。

晚 11 时许，各团在号令下向日军展开猛烈反击。这突如其来的反攻，使饭田祥二郎摸不着头脑，不敢贸然出战。就在此时，第二〇〇师悄然撤出了同古城。

次（30）日拂晓，留在阵地上的少数部队也撤了出来，并将锡唐河上的大桥炸毁。

至此，历时 12 昼夜的同古大战遂告结束。

此战，第二〇〇师全体战士以血肉之躯顽强抗击了 4 倍于己的日军精锐，打残了日军第五十五师团，给第五十六师团以重大杀伤。

当时美国《星条旗报》详细报道了同古大战的经过，热情赞扬华

军“在极其险恶的条件下巧妙突围，充分显示了华军强悍的战斗力和指挥艺术的高超。”英国《泰晤士报》也载文道：“第二〇〇师以寡敌众，与敌血战12天之久，其英勇顽强、前仆后继之作战经过，实使中国军队之光荣簿中增新一页。”

中国远征军红了，第二〇〇师神了，戴安澜成了世界名将。

但是，带着伤痕累累的部队撤至叶达西休整的戴安澜内心却是十分沉重。

4月6日，戴安澜接到蒋介石要在梅谋见他的电报。蒋介石一见戴安澜对第二〇〇师的英勇作战大加赞扬，并与宋美龄在行辕设宴款待了他。

亚力山大 谎报军情

进入4月中旬，缅甸的气温升到摄氏42度，而缅甸的战火也随之升温。

中路，中国远征军与日军第五十五、五十六师团浴血奋战。东路，远征军第六军与日军第十八师团展开拉锯战。西路，溃败的英军被日军第三十三师团死死缠住。远征军的总预备队第六十六军也投入了缅甸战场。

此时，杜聿明接到长官部由罗卓英和史迪威签署的“放弃平满纳会战，退守密特拉、敏扬一线”的命令。

4月23日晨，戴安澜率部到达密特拉、瓢背一线后，又接到几个命令：先是史迪威、罗卓英根据亚力山大反映克遥克柏当有日军3000人，令二〇〇师火速前往歼灭之；后是林蔚电令二〇〇师退守曼德勒；接着是杜聿明电话告知二〇〇师原地不动，等待他新的行动命令。

指挥系统紊乱，戴安澜考虑再三，还是执行最高命令——长官部的命令。于是亲自率领第五九八、第五九九团乘车前往克遥克柏当，并以林虎的侦察营充当搜索队先行出发。

部队狂奔200多公里没有敌情，难道是被人耍了不成？

戴安澜即驱车向前亲自观看。结果使他气炸了肺：

大路上，一些英国军官带着家眷，押着缅甸老百姓为他们扛着大小箱笼朝北走；还有一些缅甸士兵也拖家带口的后逃，孩子多的，背上背一个，脖子上挎一个、手上抱一个，头上还顶个包袱，肩上再斜挂支步枪，简直成了杂技演员。那些英国军官太太也是奇形怪状，她们把高跟鞋脱下，用麻绳拴着挂在脖子上，就像士兵胸前挂着两颗手榴弹；她们在逃命中还不忘打扮，休息时取出镜子涂脂抹粉。

1940年夏天，英国丘吉尔首相为了讨好日本人，关闭了国际通道滇缅公路，把国军陷入了困境。如今亚力山大爵爷怕他的部队在撤退途中遭日军袭击，竟编造出克遥克柏当有日军的谎言，引诱远征军为他们奔命。戴安澜恨不得用机枪扫他们一阵！

“命令部队就地用餐，同时向长官部报告这里无敌情，请示下一步行动。”戴安澜抑制住愤怒，要林虎去传令。

部队用餐未毕，长官部就回电：“棠吉、雷列姆被日军攻占。你部火速回师夺回棠吉，尔后转兵攻雷列姆。”

气得满脸通红的戴安澜几乎要骂娘了。但他没有骂，因为考虑到往返500多公里的徒劳，自己骂了，将士们会怎么骂？于是集合部队，掉头东返。

次(24)日晨，先头部队与两

路日军遭遇。

戴安澜判断：此刻棠吉守敌必定不多，是夺回的好机会。于是，兵分两路发起攻击，将两路冒进之敌歼灭后，乘胜挺进，于晚10时许占领棠吉附近高地。

午夜时分，五九八团突入城内，与鬼子展开巷战。从后面掩杀而至的第五九九团也加入了战斗。团长柳树人带1挺机枪和4个警卫，与鬼子逐屋争夺。柳树人见机枪手中弹倒地，便愤怒地接过机枪，冲入敌群扫射。警卫们连忙劝阻，他却大发雷霆：“谁要拉我下去，我枪毙谁！”警卫们劝阻无效，只好向师长报告了。

戴安澜赶来大怒：“柳树人！你真英雄呀！”

柳树人扭头，见是戴安澜，大惊：“师长，这里危险，你怎么来了？”

“我怎么来了？混帐！”戴安澜火气更大了，“我把1个团给你，你不好好指挥，却跑到这里来放机枪，还不回到指挥所！”

柳树人这才回到指挥所，调动指挥部队作战。

经一夜巷战，夺回了棠吉。

捷报飞传，蒋介石大悦，犒赏第二〇〇师100万元。罗卓英也犒赏50万元，这大概是罗卓英对二〇〇师徒劳克遥克柏当表示的一点歉意吧。

史迪威将军则不能容忍亚力山大的谎报军情。他持着卡宾枪，驾着吉普车，独自闯进英军司令部，朝着英国爵爷乱骂一通之后，用卡宾枪逼着亚力山大必须向中国远征军道歉！英国爵爷无奈，只得写了一份言词诚恳的致歉书。

全面撤退

克遥克柏当骗局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不是一纸道歉信所能弥补

的。

当第二〇〇师在往返 500 多公里的途中疲于奔命时，饭田祥二郎为切断中国远征军的退路，就已从中路调过五十六师团，与东路第十八师团合兵前出雷列姆，然后北上直取腊戍；令中路第五十五师团追击远征军第九十六师，向曼德勒逼近；又令西路第三十三师团的一部兵力，越过溃退的英军，向密支那前进。所以，待第二〇〇师夺回棠吉，再转兵攻雷列姆时，已经晚了 3 天。不仅如此，还使二〇〇师在雷列姆附近被围，4 月 28 日腊戍已陷落，退路被切断。

在此万分危急的情况下，林蔚匆忙下达突围撤退命令后，即率先撤回国内。杜聿明也顾不上与长官部联络，便率新二十三师和九十六师放弃曼德勒，向密支那撤退，孙立人的新三十八师也跟在其后。慌乱中，竟把被围在雷列姆附近的第二〇〇师遗忘了。

4 月 29 日，亚历山大、史迪威和罗卓英，第一次意见一致的决定全面撤退。

次日晚，盟军不顾仍在缅甸抵抗的华军零星部队，特别是还有一个完整的第二〇〇师，而轰然炸毁了曼德勒西侧伊洛瓦底江上的大铁桥。

被围困的第二〇〇师，在呼天不应，叫地不灵的情况下，左冲右突，终于突出重围，攻占了雷列姆。此时，他们才接到几道撤退的命令：一道是罗卓英令第二〇〇师向温藻转进，撤向印度；一道是林蔚令第二〇〇师向东北突围，经景栋从西双版纳撤回国内；最后一道是溃败中猛然想起丢了 1 个主力师的杜聿明发来的特急电，令第二〇〇师迅速突围，向卡萨第五军军部靠拢。

戴安澜考虑：第二〇〇师是第

五军的主力，现在军长正在危难之中，需要兵合一股，将打一处，突出重围。于是，决定执行杜聿明的命令。

决心一定，戴安澜放弃雷列姆，一路血战，向卡萨前进。当进至南伦时，得知八莫、密支那已被日军所陷，杜聿明率部败走野人山。这样，与军部会合，归还建制无望，只得挥师改道向北突奔。

虽然这样决定了，但戴安澜还是为军长担忧，临行前，派林虎带领特种兵侦察营追赶军部，为杜聿明保驾。

将星陨落

林虎走后，戴安澜即率部避开日寇重兵，寻隙钻林朝北突进。部队在阴森森的大林莽里一连走了 5 天，粮食告罄，将士们靠野菜、野果充饥，病亡、饿倒的事，无时不在发生。

戴安澜暗自思忖：出国作战时，齐装满员的二〇〇师共有 12000 余人，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征战，已有半数弟兄躺在缅甸战场上。现在他担心的是前方横着一条南渡河，河宽 1000 多米。河宽不可怕，他已命令部队扎竹筏、木排。怕的是敌友情况不明，沿途缅甸又多，谁能保证渡河不透风声？

他的担心，倒是言中了。

自从日军切断了中国远征军的归国路线之后，饭田祥二郎便盯住了第二〇〇师这支仍在缅甸土地上作战的华军。他把消灭第二〇〇师的任务交给了第五十六师团，师团长渡边正夫即在缅北的林莽和交通要道布下道道封锁线。

但不知怎的，狡诈的渡边竟没有封锁南渡河，这才使戴安澜安然渡过，又进入密林中艰难奋进。

5 月 18 日黄昏，部队进到腊戍西南的郎科地区。戴安澜取出地图

观看，郎科正对着中缅边境的南坎。

“啊，再有十几天，我们就到家了！”

戴安澜无比兴奋，但也担忧。忧是大败而归，又如何踏进国门？

队伍进入丛林，小心翼翼地前进。丛林的夜晚并不平静。号称森林之王的南亚虎，最喜欢夜间行动；大象、野猪也专走夜路；黑狼、印度豹、马来熊等食肉猛兽，常在夜间彼此较量；猫头鹰、红蝙蝠，也是在夜间扑食。连那讨厌的蚊蚋也是夜间比白天更猖狂。所以，士兵们都怕掉队，一个跟一个地朝前走。

夜 11 时许，队伍接近了腊戍西侧细包至摩谷的公路。这是归国途中最后的一条公路，如果今晚顺利通过，再有几天就到了国门。

戴安澜登上公路南侧高地，借助望远镜观察月光下的公路，却是异常宁静。

“哇哇”前方传来几声蛙鸣，这是尖兵发出“可以通过”的信号。

接着，一群黑影跃上公路，随又钻进路北的丛林。师前卫部队安全通过，戴安澜即随后卫第五九九团踏上了公路。

就在此时，黑暗的丛林里喷射出千百条火舌，冲上公路的士兵倒下一片。

戴安澜滚到地沟里观察，见部队乱作一团，便从地沟里跃起，举着手枪，边跑边喊：

“弟兄们，不要慌，快往东撤！”

混乱中的官兵，听到师长那熟悉的安徽口音，顿时醒悟过来，掉头向东撤退。

为把敌人引到西面去，掩护部队向东撤，戴安澜率领警卫连向西猛打。警卫连长见师长冲在前面，便赶来自用汤姆式冲锋枪压制敌人的火力，并劝师长退下去，戴安澜

不理睬，仍猛冲不止。突然侧方林莽中射出几串子弹，戴安澜身边的警卫中弹倒地，戴安澜也觉得什么东西当胸击了一下，眼冒金星，双腿一软，身子朝后仰去……

抗日英雄倒下了！

惨烈的战斗仍在进行……

激战至天明，渡边正夫见将要被华军反包围，这才扔下一片尸体，带着残部逃走。

此时，全师所剩仅有4000余人，而且连长以上军官大部战死，包括第五九九团团长柳树人、副团长刘杰和第六〇〇团团团长刘少华。

几千衣衫褴褛、饥肠辘辘的士兵，自动汇集到山坡上，望着他们的希望，他们的师长。

戴安澜躺在枯草上，慢慢苏醒过来，见几个主要军官都在身边，便当众留言：

“军人战死疆场死得其所，何足惧哉！我若殉职，部队由副师长高吉人、参谋长周之再和郑指挥带领回国……三位要珍重，好歹也要给二〇〇师留点种，否则，我戴衍功死不瞑目啊！”

高吉人泪流满面：“师座，翻过前面那架大山，就到家了，你一定要挺往。”

周之再叫来担架，抬着师长继续朝北撤退。

撤退中，由于缺医少药，连块干净的绷带也没有，致使戴安澜的胸伤日益恶化。

5月26日，行至茅邦，此地距国境线不过30余公里，祖国近在眼前。

这一天，戴安澜那化浓、溃烂、生蛆的胸伤，使他高烧不退，几次昏厥过去。忽然他的神志又清醒了，询问部队所到位置，离祖国还

有多远。高吉人都一一作答。他听了露出一丝笑容，或许是庆幸第二〇〇师生还有望……他吩咐左右为他换装，整理军容。

郑庭笈亲自为戴安澜换上将军服。

戴安澜那失神的双眼，遥望天际……一种自责之情在他心中升起，跟着自己浴血奋战，多少官兵遗尸荒野、血染异邦，只望能扬我中华军威，驱逐日寇……可如今，却是损兵折将，惨败而还……泪珠大颗大颗滴出他的眼眶……

午后，他的心脏终于停止了跳动。戴安澜英年38岁。

将星殒落，一代骁将含恨殉职！全师悲恸，哀哀欲绝之声震撼山谷，大地为之颤抖。

英魂归故国

高吉人强忍悲痛，令工兵砍了一棵坚硬的百年龙眼树，造了一口大棺材，将戴安澜师长厚殓。

5月27日，全师官兵扶棺前行，一路悲声不绝。

29日，退至瑞丽江边。因气温高达摄氏40多度，又是雨水连绵，戴安澜的遗体无法再保存了。高吉人、周之再、郑笈决定连棺木一起火化，将骨灰用白布裹好，装进木匣。

6月2日，幸存的将士们终于通过国境线，回到了祖国。一踏上中国土地，将士们悲喜交集，难以自持。有人放声欢呼，有人失声痛哭。

在腾冲，买了一口棺木，把戴安澜师长的骨灰，连同木匣一起放进棺材，由副师长高吉人率兵护送灵柩去昆明。

途经安宁县时，一位老华侨不

忍为国捐躯的功臣躺在局促的小棺里，将自己的楠木大红棺献出。高吉人谢过老人，把小棺装入楠木大红棺成殓，并在灵车两侧悬挂戴安澜的4件血衣，增添了庄严肃穆、悲天悯人的气氛。

灵柩经过昆明、贵阳、桂林，最后运抵广西全州，在第二〇〇师的发祥地厝葬。沿途素烛、鲜花，沉痛悼念。

国民政府在全州香山寺，举行万人追悼大会。大会由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西南办公厅主任李济琛主持。

在重庆的蒋介石献赠挽词，祭奠这位抗日将领：

虎头食肉负雄姿，看万里长征，与敌周旋欣不忝。马革裹尸酬壮志，惜大勋未集，虚予期望痛何如？

在延安的毛泽东撰写挽诗《海鸥将军千古》，遥祭壮士英魂：

外侮需人御，将军赋采薇。

师称机械化，勇夺黑黑威。

浴血同古守，驱倭棠吉归。

沙场竟殒命，壮志也无违。

周恩来的挽辞为：

黄埔之英，民族之雄。

朱德、彭德怀联名致词：

将略冠军门，日寇几回遭重创；

英魂羁缅境，国人无处不哀思。

10月6日，国民政府在重庆追赠陆军少将戴安澜为陆军中将。美国总统罗斯福授予戴安澜将军以军团功勋章，以表彰他在缅甸作战中的显著战绩和为中国陆军树立的卓越声誉。

（责任编辑：刘家驹）



落日

我参加了盟国对日本的受降仪式

● 朱启平

1945年9月2日上午9时10分，我在日本东京湾内美国超级战舰密苏里号上，离开日本投降代表约两三丈的地方，目睹他们代表日本签字，向联合国投降。

这签字，洗净了中华民族70年来的奇耻大辱。这一幕，简单、庄严、肃穆，永志不忘。

天刚破晓，大家便开始准备。我是在7点多钟随同记者团从另一艘军舰乘小艇登上密苏里号的。密苏里号舰的主甲板有两三个足球场大，但这时也显得小了，走动不开。到处都是密密簇簇排列着身穿卡叽制服、持枪肃立的陆战队士兵，军衣洁白、折痕犹在、满脸笑容的水兵，往来互相招呼的军官以及二百多名各国记者。灰色的舰身油漆一新，16英寸口径的大炮，斜指天空。这天天阴，灰云四罩，海风轻拂。海面上舰船如林，飘扬着

美国国旗。舱面上人影密集，都在向密苏里号舰注视着。小艇往来疾驶如奔马，艇后白浪如练，摩托声如猛兽怒吼，几乎都是载着各国官兵来密苏里号舰参加典礼的。陆地看不清楚，躺在远远的早雾中。

签字场所

签字的地方在战舰右侧将领指挥室外的上层甲板上。签字用的桌子，原来准备向英舰乔治五世号借一张古色古香的木案，因为太小，临时换用本舰士官室一张吃饭用的长方桌子，上面铺着绿呢台布。桌子横放在甲板中心偏右下角，每边放一把椅子，桌旁设有四五个扩音器，播音时可直通美国。将领指挥室外门的玻璃柜内，如同装饰着织锦画一般，里面陈列着30根花条、31颗星、高65英寸、阔62英寸的陈旧美国国旗。这面旗

还是92年前，首次来日通商的美国将军佩里携至日本，在日本上空飘扬过。现在，旗的位置正下视签字桌。桌子靠里的一面是联合国签字代表团站立的地方，靠外的留给日本代表排列。桌前左方将排列美国50位高级海军将领，右方排列50位高级陆军将领。桌后架起一个小平台，给拍电影和拍照片的摄影记者们专用。其余四周都是记者们的天下，大炮的炮座上、将领指挥室的上面和各枪炮的底座上，都被记者们占住了。我站在一座20毫米口径的机关炮上临时搭起的木台上，离开签字桌约两三丈远。在主甲板的右前方、紧靠舷梯出入口的地方，排列着水兵队和陆战队荣誉仪仗队，口上又排列着一小队精神饱满、体格强壮的水兵。

白马故事

8点多钟，记者们都依照预先的位置站好了。海尔赛将军是美国第三舰队的指挥官，密苏里号是他的旗舰，因此从来客的立场讲，他是主人。这时他正笑吟吟地站在出入口，和登舰的高级将领们一个个握手寒暄。之后，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尼米兹将军到了，海尔赛将军陪着这位上司步入将领指挥室，舰上升起尼米兹的五星将旗。海尔赛以前曾在向记者的一次谈话中说过这样一件事：他看中了日本天皇阅兵时骑的那匹白马。他说，想等击败日本之后，骑上这四名驹，参加美军在东京街头游行行列。他还说，已经有人在美国国内定制了一副白银马鞍，准备到那时赠他使用。一个中士也从千里外写信给他，送他一副马刺，并且希望自己能在那时扶他上马。我还想起，第三舰队在扫荡日本沿海时，突然风传密苏里号上正在盖马厩。现在，马厩没有盖，银驹未渡海，但日本代表却登舰签字投降来了。

乐队不断奏乐，将领们不断到来。文字记者眼耳倾注四方，手不停地作笔记。摄影记者更是千姿百态，或立或跪，相机对准各处镜头，抢拍下这最有意义的时刻。这时候，大家都羡慕四五个苏联摄影记者，其中两个身穿红军制服，仗着不懂英语，在舰上到处跑，任意照相。可是我们这些记者因为事先有令，只能站在原定地点，听候英语命令，无法随意挪动。这时，上层甲板上的人渐渐多了，都是美国高级将领，他们满脸欢喜，说说笑笑。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在这样一块小地方聚集这么多的高级军官。

代表到来

八点半，乐声大起，一位军官

宣布，联合国签字代表团到。他们是乘驱逐舰从横滨动身来的。顷刻间，从主甲板大炮后走出一列衣着殊异的人。第一个是中国代表徐永昌将军，他穿着一身洁净的喇叭军服，左胸上两行勋绶，向在场迎接的美国军官举手还礼后，抬级登梯走上上层甲板上。随后，英国、苏联、澳洲、加拿大、法国、荷兰、新西兰的代表也陆续上来了。这时，记者大忙，上层甲板上成了一个热闹的外交应酬场所。一时间，中国话、英国话、发音语调略有不同的美国英语以及法国话、荷兰话、俄国话，起伏交流，笑声不绝。身移影动时，只见中国代表身穿深灰黄军服；英国代表穿全身白色的短袖、短裤制服，并穿着长袜；苏联代表中的陆军身穿淡绿棕色制服，裤管上还有长长的红条，海军则穿海蓝色制服；法国代表本来穿着雨衣，携一根手杖，这时也卸衣去仗，露出一身淡黄卡叽制服；澳洲代表的军帽上还围有红边……真是五光十色，目不暇接。

8时50分，乐声又响彻上空，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将军到。他也是坐驱逐舰从横滨来的，尼米兹在舰面上迎接他，陪他进入位于上层甲板的将领指挥室休息。舰上升起他的五星将旗和尼米兹的将旗并列。军舰的主桅杆上，这时飘起一面美国国旗。

上层甲板上热闹的外交场面渐渐结束了。联合国代表团在签字桌靠里的一面列队静立。以徐永昌将军为首的50位各国海军将领和50位陆军将领，也分别排列在预



1952年朱启平在朝鲜板门店采访和平谈判

先安排好的位置上。这时有人说，日本代表团将到。我急急翘首望去，只见一艘小艇正向军舰右舷铁梯驶来。不久由美国军官领先，日本人随后，陆续从出入口来到主甲板。入口处那一小队水兵向美国军官敬礼后，即放下手立正。乐队寂然。日本代表团外相重光葵在前，臂上挂着手杖，一条真腿一条假腿，走起路来一踉一拐，登梯时有人扶他。他头上戴着大礼帽，身穿大礼服，登上上层甲板就把帽子除下了。梅津美治郎随后，一身军服，蹒跚而行，他们一共11个人，到上层甲板，即在签字桌向外的一面，面对桌子列成三行，和联合国代表团隔桌而立。这时，全舰悄无声息，只有高悬的旗帜传来被海风吹拂微微的猎猎声。重光一腿失于淞沪战争后，一次在上海虹口阅兵时，被一位志士尹奉吉投掷一枚炸弹炸断。梅津是前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著名的何梅协定日方签字人。

他们都是中国人民的熟人，当年在我们的国土上不可一世，曾几何时，现在这里重逢了。

仪式开始

9时整，麦克阿瑟和尼米兹、海尔赛走出将领指挥室。麦克阿瑟走到扩音机前，尼米兹则站到徐永昌将军的右面，立于第一名代表的位置。海尔赛列入海军将领组，站在首位。麦克阿瑟执讲稿在手，极清晰、极庄严，一个字一个字对着扩音机宣读。日本代表团肃立静听。麦克阿瑟读到最后，昂首向日本代表团说：“我现在命令日本皇帝和日本政府的代表，日本帝国大本营的代表，在投降书上指定的地方签字。”他说完后，一个日本人走到桌前，审视那两份像大书夹一样白纸黑字的投降书，证明无误，然后又折回入队。重光葵挣扎上前行到签字桌，除帽放在桌上，斜身入椅，倚杖倚边，除手套，执投降书看了约一分钟，才从衣袋里取出一支自来水笔，在两份投降书上分别签了字。梅津美治郎随即也签了字。他签字时没有入座，右手除手套，立着欠身执笔签字。这时是9时10分，军舰上层传来一声轻快的笑声，原来是几个毛头小伙子水兵，其中一个正伸臂点着下面的梅津，在又说又笑。但是，在全舰庄严肃穆的气氛下，他们很快也不出声了。

麦克阿瑟继续宣布：“盟国最高统帅现在代表和日本作战各国签字。”接着回身邀请魏锐德将军和潘西藩将军陪同签字。魏是菲律宾宾失守前最后抗拒日军的美军将领，潘是新加坡沦陷时英军的指挥官。两人步出行列，向麦克阿瑟敬礼后立在他身后。麦克阿瑟坐在椅子上，掏出笔签字。才写一点，便转身把笔送给魏锐德。魏锐德掏出

第二支笔给他，写了一点又送给潘西藩。他一共用了六支笔签字。签完字后，回到扩音器前说：美利坚合众国代表现在签字。”这时，尼米兹步出行列，他请海尔赛将军和西门将军陪同签字。这两人是他的左右手。海、西两人出列后，尼米兹入座签字，签完字，就各归原位。麦克阿瑟接着又宣布：“中华民国代表现在签字。”徐永昌步至桌前，由王之陪同签字。这时我转眼看看日本代表，他们像木头人一样伫立在那里。之后，英、苏、澳、加、法、荷等国代表在麦克阿瑟宣布到自己时，先后出列向麦克阿瑟敬礼后，请人陪同签字。陪同的人澳洲最多，有四个，荷兰、新西兰最少，各一人。各国代表在签字时态度以美国最安闲，中国最严肃，英国最欢愉，苏联最威武。荷兰代表在签字前，曾和麦克阿瑟商量过。全体签字毕，麦克阿瑟和各国首席代表离场，退入将领指挥室，看表是9时18分。我猛然一震，“九·一八！”1931年9月18日日寇制造沈阳事件，随即侵占东北；1932年又强迫我们和伪满通车，从关外开往北平的列车，到站时间也正好是9时18分。现在14年过去了，没有想到日本侵略者竟然又在这个时刻，在东京湾签字投降了，天网恢恢，天理昭彰，其此之谓歟！

投降书脏了

按预定程序，日本代表应随即取了他们那一份投降书（另一份由盟国保存）离场，但是他们还是站在那里。麦克阿瑟的参谋长苏赛兰将军本来是负责把那份投降书交给日方的，这时他却站在签字桌旁，板着脸和日本人说话，似乎在商量什么。大家都不知道出了什么事，记者们议论纷纷。后来看见苏赛兰在投降书上拿笔写了半响，日

本人才点头把那份投降书取去。事后得知，原来是加拿大代表在日本那份投降书上签字时签低了一格，占了法国签字的位置，法国代表顺着错签了地方，随后的各国代表跟着也都签错了，荷兰代表首先发现这错误，所以才和麦克阿瑟商量。苏赛兰后来用笔依着规定的签字地方予以更正，旁边附上自己的签字作为证明。倒霉的日本人，连份投降书也不是干干净净的。

日本代表团顺着来路下舰，上小艇离去。在他们还没有离舰时，12架超级堡垒排列成整齐的队伍，飞到密苏里号上空随着又是几批超级堡垒飞过。隆隆机声中，我正在数架数时，只见后面黑影簇簇蔽空而来，那都是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飞机，一批接一批，密密麻麻，不知有多少架，顷刻间都到了上空，然后向东京方向飞去。大战中空军将士厥功甚伟，理应有此荣誉，以这样浩浩荡荡的阵势，参加敌人的投降典礼。

我听见临近甲板上一个不到20岁满脸孩子气的水手，郑重其事地对他的同伴说：“今天这一幕，我将来可以讲给孙子孙女听。”

这水兵的话是对的，我们将来也要讲给子孙听，代代相传。可是，我们别忘了百万将士流血成仁，千万民众流血牺牲，胜利虽最后到来，代价却十分重大。我们的国势犹弱，问题仍多，需要真正的民主团结，才能保持和发展这个胜利成果。否则，我们将无面目对子孙后代讲述这一段光荣历史了。

旧耻已湮雪，中国应新生。

（朱启平：原大公报特派驻美记者，已故。此文系1945年9月3日写于横须贺港中军舰上，原载于《大公报》）

（责任编辑：仲文）

从美国间谍到友好使者

1952年11月29日午夜时分，一架C-47型美国间谍飞机，偷偷窜犯到我国东北长白山区上空，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公安战士一举击落，在飞机燃烧的残骸中，跳出了两个人来。由此，他们演出了一部长达40多年的连续剧，时至今日尚未结束……



智歼美国 间谍飞机

●王 鉴

依靠群众 发现空特

1952年7月开始，美国中央情报局驻日本厚木基地的间谍机关，连续向东北空投特务。第一批是7月13日空投在吉林省安图县长白山山区。当时我们没有发现。8月下旬中央公安部电告，长白山山区有电台发报，要求查明是否敌台。由于长白山地区辽阔，山深林密，难以测定敌人潜伏电台的确切位置，敌人究竟在哪里？只有依靠群众。

不久，吉林省公安厅向东北公安部报告，安图县长白山山区附近，群众反映夜间听到有飞机飞行的轰鸣声音。9月又急电报告，安图县老岭山区居民上山挖人参，遇见五个身穿“志愿军”服装的人，向他们购买米、面和烟草以后，相约改日还来购买。老百姓如期上山，没有人来。从这些迹象可以肯定在

长白山区已有敌人电台潜伏。

就在我们组织力量进山搜索，准备剿灭之时，美国间谍机关于1952年9月20日深夜，又向安图县老岭地区空投了一名特务。这个化装成“志愿军”的特务刚一下山，没有料到很快陷入人民群众的层层包围之中。步步关卡，程程盘问，使他胆颤心惊走投无路。9月27日他到安图县安图区，以捉逃兵为名，要同当地政府联系。民兵将他带到安图县明月沟派出所。

他名叫李军英，交待了他被派来东北的任务。吉林省公安厅立即将李军英自首情况报告东北公安部，并将李押来沈阳。我们迅即对李犯进行审问。李供认他曾在国民党军队当过团长。东北解放初曾在东北大学学习，在本溪钢铁公司工作过，后逃到香港，参加了蔡文治组织的“自由中国运动”特务组织。这个特务组织是美帝国主义为配

合朝鲜战争，在中央情报局的直接支持策划下，利用所谓“第三势力”组成的，并在港澳等地搜罗从大陆逃亡的反革命分子，向大陆派遣，建立所谓“游击基地”。李又供：他的任务是以视察员的身份，前来检查名为“文世杰队”（按：简称“文队”，文世杰真名叫张载文）及另一特务李麟阁建立“游击基地”的进展情况，然后返回日本向美特机关汇报，以便制定下一步的决策。限他一个月到半年时间，完成任务返回。回日本的办法有三，一是走“空路”，即用“空取”的办法回日本（所谓“空取”，就是使用专门制造的空取器，从地面将空投特务牵引到飞机上，飞回日本）。二是走“武路”，从海上回去；三是走“荣路”，从香港回去。李还供认另一组名为“沈衡年队”的5名特务将于近期空投长白山区，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日本、南韩的间谍机

关及特务活动情况。

根据李军英的交代，吉林省公安厅即派副厅长王吉仁带领公安干部和公安部队对“文队”进剿。这时已大雪封山，林海浩瀚，渺无人烟。他们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部署兵力，全面封锁，10月29日发现了这股空投特务，经过战斗，队长张载文、电台台长牛松林等四名被抓获，一名被击毙，缴获了全部武器、弹药、电台、密码和发报底稿。搜查还发现，他们已在一座山上的制高点处，建立了所谓“安全处所”，挖了战壕、地洞、地窖，藏有领航台、军用地图、一批枪支弹药和大量的过冬衣物、饼干、罐头、医药等物资。张载文等供认空投后，就架设了电台，并多次同在日本的美国间谍机关通报，报告了降落后的活动情况。

将计就计 力争主动

东北公安部，以张载文为突破口，进行审讯，张供：他在国民党军队当过营长，在香港参加特务组织后，被送到日本神奈川县茅崎训练基地接受收集情报、刺杀、射击、跳伞等训练。他带的“文队”是7月13日第一批空投到东北的。任务是：搜集情报，在长白山建立“游击基地”，发展武装力量，准备策应美军占领东北。行前，特务头子蔡文治曾对他说：“你们此行是艰险的，要长期潜伏，以待时机，等到世界大战爆发，你们就会出头了，那时日本占领东北的历史将会重演。”直接领导张载文的美特爱·斯考特·马丁（A·Scott·Madding）上校也对他讲：“东北已经有若干游击基地，有几千人的反共游击队。”“你们此行是开辟一条平坦的大道，不久就会派更多的人

走你们所经过的路线”。他空降到长白山后，虽然已与美国间谍机关通报联系，但由于当地戒备森严，未敢活动，暂时在山区建立“安全处所”，待严冬过后，再伺机行动。

张载文还供称：美特机关在8月中旬曾来电告他，9月将空投一名特务到长白山区，名叫李军英，化名卜经武，代号“5774”，李的任务是来视察“文队”空投后的活动情况，视察后，用“空取”的办法返回日本。张的供述与李军英的交待以及缴获敌人来往电报内容相符。

根据李军英、张载文的供述及有关材料分析，我们决定利用李军英、张载文和他的电台。充分利用美特要李军英完成视察任务后返回日本的有利契机，顺水推舟或通过“空取”，或通过香港派回日本，深入到美国中央情报局派驻日本的间谍机关内部，同敌人作长期斗争。如果此计不成，利用李军英对美特的吸引力，调动美特飞机前来“空取”李军英，设法将敌人的飞机击落。

取信于敌 联络美特

和美国间谍机关斗智，这在东北反间谍斗争史上还是第一次。张载文被抓前最后一次通报约定七日内复电，当时已过了六天，只剩最后一天时间。我们立即决定要张载文的电台同美特通报联络。

张的复电称：“物资伞七、已如数收到，因恐目标暴露，物资已埋藏，我等向东南移动，已安全脱险”。三天以后，敌人复电，表示赞许和鼓励，并称：“到达新地区即报，今后改用新的联络表”。看来敌人没有发现破绽。以后同美特的通讯来往，主要表示张载文在山区辗

转寻找更加安全的处所，待机进行活动。

精心设计 诱敌“空取”

李军英空降以后，美特多次来电催问张载文，同李是否已取得联系。为了骗取敌人的信任，吸引敌人上钩，复电称：已与卜（按：李军英的化名为卜经武）会面，当即下山寻找关系，尚未返回，搜山部队已撤离”。

这一案情正按照我们预期的方向发展，认为诱使敌机前来“空取”的条件已基本具备。但必须发挥主观能动性，精心设计，于是进一步采取了三个措施。

一、由张载文台于11月16日复电：“于真（时间代号）夜十一时，卜从约定地点杨房子返回”。同时又以李军英的名义去电：“此行途径万险，收获甚佳，李（按：即李麟阁，是李军英要找的旧关系，此人已查获）处于困难中寻得，并获证件一批（按：为通行证、身份证等）。”“荣路”（按：指陆路）文件携带困难，“武路”（按：指海路）封锁极严，无法通过，务希速来空取”。这样，既吸引敌人，又迫使美特只有前来“空取”，别无选择。

二、连续给美特发电：“已获大量情报，急需返回面陈”。“刻间我归心似箭，如遇突变，则文件、证件全失，实心焦万分”。迫使美特快下决心。

三、根据李军英提供的线索，吉林省公安厅于10月4日一举歼灭了空投到吉林省靖宇县的美特“沈衡年队”。队长和电台台长均被生擒，也被我利用。为了迷惑敌人，即用沈衡年台向敌人发报：“我等生存安全，工作正在开展”，“社会控制极严，旅行要求证件”。此电既



唐奈、费克因当场被捕

表示安全，麻痹敌人，又从侧面制造空气，以打消敌人要李军英走“荣路”的计划。

经过以上步骤，美国间谍机关终于回电：“择日前来空取，应速选好空取场”。同时空投了“空取器”，计有空取支架、尼龙绳、军用地图、指南针、PPN₂ 导航器以及其他物资。证实敌人确实要这样做了。于是，我们立即组织力量，选取空取场。空取场的要求比较严格，大体像个小型飞机场，在长白山区要找到这样的场地并非易事。我在白山山的同志，爬山越岭，千辛万苦，四出勘察，每选一个场地，都要向沈阳东北公安部报告，按照报告的经纬度和座标以及周围地形进行审查。经过几次筛选，才在一个山谷里，找到了一处既合于敌人“空取”的要求，又是我们打击敌机的理想场地。随即电复美特：“空取场已选好”，并注明经纬度和座标以及“空取”场地的识别标志为燃火五堆，成 T 字形等细节，使敌人看了真实可靠。不久，飞来一架高空侦察机，在空取场上空盘旋观察后飞去。11 月 22 日美特来电：“于本月 29 日零时，派机前来空投物资，

并空取李军英。”终于达到了诱敌“空取”的目的。

本拟利用美特前来“空取”的机会，将李军英趁机派回日本，深入到美国间谍机关内部。因此向李军英透露了我们的意图，而李表示他是东北人，空投到东北以后，看到国家的发展变化，坚决不愿意返回。同时，我们也认为他返回后难以应付敌人，战争时期提供情报的难度也很大，如果弄不好，反而前功尽弃。因而，在急不可待的时刻，东北公安部毅然决定，并经中央公安部同意，敌机前来时予以击落。

周密部署 轰歼敌机

能否击落敌机，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东北公安部部长汪金祥立即报告了中共中央东北局，并要求调派解放军参加打击敌机。东北局当即批准，并派东北公安军副司令员谭友林和东北公安部乔庄为现场指挥，率领一批公安干部、公安武装和一部分解放军高炮部队，共计 180 多人，携带新式高射炮、高射机枪、轻、重机枪，星夜

驰往安图县部署了火力。11 月 29 日夜，公安人员在零下 20 多度气温下，根据敌人对空取的具体规定和要求，紧张而有序地架好“空取”架，牵上绑人的绳索，备好待燃的信号火堆，装好空取架上的指示灯。在我控制下，由李军英操纵 PPN₂ 导航器，监听敌机飞来的信号。一切部署就绪，只待敌机前来。突然 PPN₂ 收到了敌机的信号，据测算敌机已进入北朝鲜，飞过了平壤，半小时后可能飞抵空取场上空。一声令下，干部战士迅速进入空取场周围的伏击圈，严阵以待。这时在 PPN₂ 导航下，半小时后，敌机果然飞来。我们立即点燃场地信号火堆，启亮了空取架上的指示灯光。敌机在空取场上空盘旋观察。当夜月色如洗，能见度极好，敌机盘旋一周后，用降落伞投下一个包裹，除送来物资外，还附来一信，内称：“空取分两次进行，第一次试飞路线和高度，第二次返回正式空取”。我指挥员当机立断，决定第一次试飞时，如在我最佳射击范围内，就坚决地打，以免错过时机，如不在最佳范围内，就等待敌机正式空取时再打。结果敌机第一次试飞时，是在我伏击圈外左侧飞过，不是最佳射击角度，没有贸然开枪。二十分钟以后，敌机返回，正式进行“空取”，从飞来的角度看正是对准空取架低空滑翔飞来。当其将要接近空取架的一瞬间，一颗绿色信号弹，腾空而起，顿时枪炮交叉火力一起发射，飞机还没有来得及空取，就被击中起火，迅即坠落。事出巧合，敌机正要坠落到地面时，一个机翼撞到一棵树上，机身破裂，瞬间掉到地上。一时雪野沸腾，欢呼声响彻云霄。战士们正在忙着打扫战场，忽然看到雪地里有两个高大的人影，呼之不应，只顾逃跑。乔庄等同志带领几名战士赶

上去查看，发现是两个身穿美式空军服装的美国人，当场将他们抓获。这两个美国人都是职业间谍。一个叫约翰·托马斯·唐奈，1951年大学毕业，受特务训练后，派到美国中央情报局驻日本厚木基地的间谍机关，负责训练向中国东北地区派遣的间谍。“文队”、“沈队”的这10名特务，都是他参与挑选的，还亲自对他们进行派遣前的训练，直至派出。李军英也是他派来的。另一个叫理查德·乔治·费克图，1952年参加美国中央情报局，受特务训练后，派到厚木间谍机关。这次是受命协助唐奈来空取李军英的。这两人为什么能逃离已起火爆炸的飞机呢？原来，飞机低空飞行撞到树上的时候，机身折成两段，从裂缝中他们被甩出机外。这又是一个意外的收获。机上两名驾驶员史瓦兹和斯诺迪则已随机毁而人亡。美国间谍机关马丁上校曾对张载文口吐狂言说：“大战开始前，每个国家都是以地下战为先导；你们是大战的铺路者和开路先锋，而我则将是代表联合国军第一个去东北的人，也将是第一个到沈阳和你握手的人”。谁知，美国中央情报局赔了夫人又折兵，他们妄图建立所谓“敌后武装游击中心”的美梦，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翌日晨，美特机关发来特别加急电报“飞机为何未回？飞机为何未回？速告”。署名马丁上校。从来电看，敌人已经惊慌到不可言喻的地步。我们即刻以坚决的口气回电：“飞机空取后，按时返回”。第二日马丁上校又来电：“飞机为何未回？速查告。”我们又马上回电：“飞机空取后向东南方向飞去，我们将遵示照办，即去寻找。”以后几经电报往返，我们又去电：“虽经连日寻找，未获结果，定将继续寻找。”这样复电，目的是拖下去，以

观敌之动作，便于采取新的对策。不几日，美特机关来电：“以后发给汝等电报的签署，由马丁上校改为××上校。”这一改变是否意味着马丁上校因为送来一架飞机又搭上两个美国间谍而被撤职，已无法查考，但美特打了败仗，已经成为历史事实。

这次诱歼美国间谍飞机的胜利，中共中央东北局、中央公安部给予了表扬。周恩来总理赞扬说：“东北打下一架飞机，这事办得好。”

迷惑敌人 最后“礼物”

斗争没有结束，我们也不想结束。敌机被击落后，敌人不断追查，经过一段时间的应付，逐渐缓和下来。当时分析，敌人既然要求查找飞机的下落，可见美特还没有清醒过来，而且它无法知道飞机是被我击落的，即使发生怀疑，也难以肯定张载文发生了问题。还有条件继续迷惑敌人，相机再给予一次打击。相反，如果我们就此结束，反而会引起敌人怀疑，暴露了我侦察机密，给以后的斗争带来困难。于是，我们继续指挥利用的电台与敌人周旋。为了进一步试探敌人反应，取信于敌，一方面由“文队”向美特机关发报，说明继续坚决寻找飞机的下落，表示对美特的忠诚；另一方面我们又设计了一个新的同美特斗智的方案，即伪造一个飞机失事坠落机毁人亡的假现场，目的是为了迷惑敌人，掩护利用“文队”电台的斗争手段，免除因飞机没有返回日本而对“文队”发生的怀疑，使敌人作出错误判断，以便争取把斗争再引向深入。这样做虽然困难重重，但是如果成功，可以取得新的经验，如不成功，对我毫

无损失，遂决定大胆试验。但是用哪个电台去发现敌机失事坠落的假现场，并将伪造的情况报告敌人？如果用“文队”去发现，会使敌人感到过于巧合，可能弄巧成拙。此时，我们手上掌握有另一个美特电台，是1952年10月17日和29日两次从汉城起飞，空投在长白山天池以北十里处的武装特务携带的（共20人，均朝鲜籍），11月底被我全部歼灭，除击毙2人外，余均俘获。此台在我控制下已经与美特机关通联。经过研究，利用这个电台较好。因为此台与“文队”属于同一美特系统，鲜籍特务与“文队”的特务是两个国籍，互不联系，看来比较理想。随即指挥这个电台把飞机坠毁的假现场的情况通报给了敌人。电报大意是，在靠近中朝边境地带，发现一飞机残骸，机毁人亡，飞机零件上发现有英文及U. S. A. 等字样，但无国籍和号码；尸体更无完整者，仅从野兽吃剩之残肉体中发现有黄毛，以暗示是西方人。这个飞机残骸是怎么来的？原来我们工作人员带去的木工，就地取材，按照在沈阳设计的要求，做了一个C-47型飞机残骸模型，在木板上包了铁皮（防敌人的雷达检测）伪装布置了一个飞机失事的现场。敌特机关接到电报后来电倍加称赞，还说：“祝贺你们干得很好。”不久，确有飞机前来，在上空盘旋后飞走，以后美特再未追问飞机的下落。为了证实美特究竟如何判断，即向美特机关发报，说明由于长途跋涉，食品、药品都已用尽，枪支有些损坏，弹药不足，急盼迅速补给。1953年1月28日晚，敌机果然飞来，飞机在上空盘旋多时，不敢低飞，在空投地点上空三千公尺左右高度（过去是三百公尺左右）投下物资后，仓皇飞走。我们清点物资，敌人又送来

一批卡宾枪和弹药，还有大批饼干、花生米、鱼干、黄油、火腿、盐、香烟、大桶的午餐肉，以及毛线衣裤和药品等。我们考虑到今后敌人在长白山区空投特务的可能性较少，现在利用此台透露发现飞机残体的目的已经达到，几天后，我们即告之以遭到袭击，与敌人终止了联络，给敌人造成已被朝鲜逮捕的错觉。从此以后，敌机未敢再来。只是指示张载文在山区“暂时坚持”，“忍耐”。或者转道“荣路”返回日本汇报。以后虽经几度周折，没有取得新的进展，于是采取各种掩护措施，迷惑敌人，逐步收场。

1954年11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军事审判庭以危害我国安全罪，分别判处美国间谍唐奈无期徒刑，费克图20年有期徒刑。翌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布了中央公安部关于歼灭美帝国主义空投间谍的消息，和对唐奈、费克图两犯的严正判决。随后还在北京故宫，

展览了被我击落的飞机残骸，以及缴获的武器、弹药、电台、降落伞、空取器、特务经费等罪证。这一同美国间谍机关斗争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对我国的间谍活动，戳穿了美国侵略者在板门店谈判桌上，表示愿意和平谈判，停止战争的谎言，在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中，彻底揭露了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心。

在以后的中美华沙谈判中，美方一再要求释放唐奈、费克图。直到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酝酿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时候，根据中央指示，在1971年12月提前释放了费克图，对唐奈改判5年徒刑。尼克松访华时，美方又要求宽大处理，我于1973年将唐奈提前释放。

（王鉴：曾任公安部局长、上海市副市长、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责任编辑：仲文）

他俩成了友好使者

●林方

唐奈在中国服刑的20年期间，受到中国政府人道主义的对待；他的母亲玛丽·唐奈曾先后5次来华探监。1971年，玛丽·唐奈又致电周总理，要求准许她和唐奈的兄、嫂一同来探视唐奈。经周总理批准，他们3人又来华探视两周。由于中美关系的发展，唐奈于1973年10月被我释放。

唐奈1951年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1973年回国后不久进入哈佛大学攻读法学博士学位，后在美国康纳迪克州当律师。这期间，他与一位原籍沈阳的中国姑娘李孚（1946年去台，后在美学习化学专业，有叔父在国内）结了婚，生了一个男孩，取名叫“小杰克”。唐奈经常用亲身经历的事，宣传新中国，传播中美人民的友好情谊。1983年2月，在唐奈获释十周年之际，他申请携妻、子访华探亲。同年9月唐奈作为我国对外友协的客人，偕同妻子李孚和儿子小杰克来华访问，受到友好接待，参观游览了北京、沈阳、武汉和桂林等地，并受到了全国政协委员会副主席程子华和对外友协会长王炳南的亲切会见。30年前的敌人如今成了中国的人民的朋友。

关于唐奈、费克图的判刑和释放

●赵惠

唐奈、费克图被我俘获后，美国矢口否认他们是美国中央情报局人员，诡称是陆军的文职雇员，是向南朝鲜飞往日本时迷的路。1954年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访华，也向我提出要求释放唐、费二人。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由我最高人民法院军事审判庭于11月23日以“进行特务活动危害我国安全”罪判处唐奈无期徒刑，费克图二十年徒刑。中美关系改善后，为配合外交斗争，应美方要求，我国政府先释放了费克图，

对唐奈改判五年徒刑。尼克松访华期间，与周恩来总理会谈时，曾表示承认唐奈在中国犯了罪，对中国政府宽大处理，予以减刑表示感谢。同时说唐奈母亲年老多病，希望能在死前看到儿子回家，故请中国方面对她表示仁慈。1973年2月1日尼克松在美国的一次记者招待会，公开承认唐奈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局特务，说中国如能提前释放，将有助于改善中美关系。不久，我国政府释放了唐奈。

一代明主唐太宗的另一面

虔诚的人总是错把褻渎了的历史的裁判当成了最后裁判。

——题记

●徐庆全

公元604年，京城长安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当朝皇帝隋文帝杨坚，被他的二儿子杨广杀死在金銮殿上，杨坚的大儿子杨勇因为是接班人，也死在弟弟杨广的屠刀之下。杨广当即披上黄袍，成了隋朝的第二代皇帝。

事隔22年，这血淋淋的一幕又在长安重演。同杨广一样，向兄弟、父亲挥起屠刀的，正是当年在宫中目睹了那场篡位丑剧的人。这个人也成了第二代的统治者，他就是大唐太宗皇帝李世民。

这一事件历史上称之为“玄武门之变”。

令人思索的是，展现在历史舞台上的这两幕几乎完全雷同的丑剧的主角，在后人心目中的形象却截然不同：杨广把个好端端的江山毁在自己的骄奢淫欲，而他又不会粉饰自己，因而他篡位的举动，被史家援引为残暴的重要佐证而在史书中大肆渲染；而李世民则采取各种措施巩固乃父的基业，创造了成为后世君主治世楷模的“贞观之治”，加之经他主审过的史书进行粉饰，把篡位这一事件描绘成不得已而为之的行为，给后人留下了既属正当防卫又是替天行道的义举，因而他在历史上这一不光彩的一幕便被淡化了。即使偶尔有人提起这一事件，也都因为他是盛唐的创业者而给予了一份宽容。

但是，历史是不讲感情的，即

或是对具有明主形象的唐太宗也不例外。虽然他为自己“玄武门事变”中的行为百般粉饰，并立起了一座金壁辉煌的牌坊，但是随着历史的侵蚀，华丽的外表脱落后，真相便会呈现在人们面前。

(1)唐高祖李渊有22子，嫡出子（即与窦皇后所生）四个，到大唐开国后，除三子元霸早夭外，长子建成、次子世民、四子元吉都在世。李渊在立建成为皇太子的同时，封世民为秦王、元吉为齐王。按常理讲，兄弟各司其职，李渊百年后建成登上金銮殿的宝座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是，为大唐开国立有卓著功勋的世民，却不甘心在秦王的位置上逍遥一生，他把目光投向了金光灿灿的皇帝宝座上。

617年，李渊在晋阳（今山西太原）揭起了反隋的旗帜。世民时年18岁，他积极帮助父亲招兵买马，延揽人才。世民此举，获得了史家们“义师云举，首赞奇谋”的美誉。而后来经他主审过的史书，则进而编撰了“今日破家亡躯亦由汝，化家为国亦由汝”的话，用李渊在决定起兵时对他说话的口气，把晋阳起兵的功劳都归给了他。

此后，世民领兵驰骋疆场，攻河西，取霍邑，克长安。大唐开国后，率兵首平薛举、薛仁果父子，又讨伐盘踞在代州、一直是李家劲敌和心腹之患的刘武周，收复了山西

全境。在这次战役中，世民收罗了武艺高强的尉迟敬德。正是这个敬德，在后来的喋血政变中冒矢前进，手刃齐王元吉，武力胁迫李渊退位，成了最得力的干将。接着，世民又击败了固守在东都洛阳的郑帝王世充，固守在虎牢关的夏帝窦建德，成为李唐王朝开创时期的头号功臣。

李渊没有亏待这位能征惯战的儿子，给了他极高的荣誉和地位。在立国的第四个年头，世民已拥有太尉、尚书令、雍州牧、左武侯大将军、陕东道行台尚书令、凉州总管、秦王等一系列头衔，当他从洛阳凯旋而归时，李渊又给他加上了“天策上将”的封号，成为皇帝、皇太子之下第一人。

李渊的御笔在为世民谱写功劳大榜时，其初衷只不过是给这位爱子的功勋进行补偿而已，因而忘记了“功高震主”的古训。正因为如此，世民产生了把功劳簿铺到金銮殿下的野心。

现有的史料没有给我们留下世民在这场争斗中的策略，但是，以当时的情势和后来的结果而言，我们倒可以进行合理的推测。想来大致有以下三策：上策是争取建成俯首，主动让出储君；然后获得李渊的支持，造成政权和平嬗递的假象。这样，既满足了自己的欲望，又不像杨广那样在后世留下骂名。中策是走杨广的路子，以“功高震

主”的优势，使父亲废掉建成，改立自己为太子，然后再以武力胁迫父亲退位。下策是铤而走险，用计除掉建成，扳倒父亲，靠血腥屠杀登上王位。

上策能否行得通，要取决于皇太子建成的态度。

(2) 建成在史家笔下被描绘成为一个无谋略才华、喜酒色且性情残忍的人。其实，这是为世民篡位编造的托词，真实的情况恰恰相反。

晋阳起兵初期，建成即奉父命与世民率军西渡黄河，攻城掠地。攻占长安时，他与世民分领左、右大军，互为倚援；进入长安后，初次出兵关东，也是他与世民分领左、右元帅；世民百战百胜，他也攻无不克，同样为大唐王朝的建立立有汗马功劳。

按照传统，太子是储君，需要经常留在皇帝身边，习理朝政，一般不再负有领军作战的使命，即所谓的“君之嗣嫡，不可以帅师”。当建成被立为太子时，削平割据势力，镇压各地农民起义军的指挥权就移交秦王世民了，这就客观上为世民在军事上建功立业提供了机会。因此，立国后，建成的功勋已无法与世民平分秋色了。在满朝文武中，世民成了人们心目中的一颗耀眼的政治明星。

这一潜在的威胁，建成的府僚王珪和后来成为世民的“镜子”的魏征都看到了。他们都劝建成寻找建功立业的机会，捞点政治资本。恰在此时，刘黑闥再度引突厥兵南下，建成主动请缨，以储君的身份督军，一举克服了山东。这一事件证明：兄弟之间为争夺皇位继承权的角逐已经开始了。而且，此后的每一件大事也都染上了兄弟阋于墙的色彩。

建成出兵平定山东的功勋，自然让世民耿耿于怀，干扰了他“外托御寇之名，内欲总兵权，成其篡权之谋”的计划。不久，突厥颉利可汗入侵，世民抓住机会，力抗众人迁都避其锋芒的主张，坚决要求自己自卫还击，并立下了“不出十年，必定漠北”的军令状。尽管他的建议包含着抗击外侮正义的一面，可是欲借抗击侵略之机，改变建成对其功名的遏制的不利，也是他反对避敌的重要原因。不过，这时候建成、元吉已经清楚地看到了世民一箭双雕的计谋。于是，双方互争出兵御敌的兵符。李渊一碗水端平，让世民、元吉共同督师出征。

当世民建功立业的机会被建成遏制并剥夺时，他已经意识到，上策是难以实行了。现在只好退而求其中，打乃父李渊的主意了。

(3) 在现今留下的史料中，到处充斥着李渊早已有立世民为储君的愿望的记载，仿佛在建成、世民争斗的过程中，李渊自始至终是倾向世民的。最具代表的史料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中“武德五年十一月”条的记载：“上（指李渊）之起兵晋阳也，皆秦王世民之谋。上谓世民曰：事成，则天下皆汝所致，当以汝为太子。世民拜且辞。及为唐王，将佐亦请以世民为

世子。上将立之，世民固辞而止。太子建成，性宽简，喜酒色游畋；齐王元吉多过失，皆无宠于上。世民功名日盛，上常有意以代建成，建成内不自安，乃与元吉协谋，共倾世民，各引树党友。”

上面这段引文，粗粗一看，确实可以得出李渊早有立世民为太子的结论，但若仔细地加以分析，则会发现，这全是史家按世民的意思发挥出来的。

第一，把李渊在太原起兵反隋，说成是“皆为秦王之谋”，与事实就大相径庭。既然如此，李渊在反隋之初胜败还难以预料，大唐帝国的基业连影子都没有的情况下，就预先立世民为太子，这显然与常理不合；况且，后来世民之所以敢覬覦金銮殿的宝座，惟一凭藉的是



李世民画像

他对大唐的盖世功勋，可在当时，世民的功勋如同大唐的基业一样毫无影踪，李渊舍弃建成而立世民为太子的理由又何在呢？

第二，引文中说，李渊立为唐王后，“将佐请立世民为世子，上将立之”云云，也难令人相信。因为当时建成的功勋并不比世民稍逊一筹，李渊完全没有必要违反“立嫡以长”的古训，改立世民为太子而埋下大唐基业不稳固的祸根。况且，当时李唐王朝建立伊始，还处在全国林立的武装割据势力的虎视眈眈之中，立国仅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更为严重的统一战争还在后面，而且鹿死谁手也是难以预料的。在这种冷峻的局面下，不要说李渊不可能在立太子这个问题上仔细斟酌，就是世民也不会产生将来要与建成争夺储位的野心。至于请立世民为太子的将佐是谁呢，引文中却含糊其辞，连名字也不提，可见这位将佐也是虚构出来的。

第三，引文还说，世民功名日盛，李渊常有以之取代建成的愿望。在《旧唐书·李建成传》中，也有“高祖私许（世民）立为太子”的说法。以常理来讲，即使李渊是个平庸之辈，在废立太子这样的关系到大唐千秋基业的敏感问题上，绝不会在未做最后决定之前，就私下许愿，挑起兄弟之间的争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如果李渊确实对世民有过私下的许愿，为世民捧场的史家们必然要大书特书，断不至于“犹抱琵琶半遮面”，一笔带过。

第四，引文唯一讲了兄弟“各引树党友”一句实话，还把挑起这场争斗的发难者栽赃到建成头上。其实，在世民“功名日盛”，建成“内不自安”是肯定的，假使世民心甘情愿在王公的位子上逍遥一生而不起野心的话，建成何必“内不

自安”呢？史家百般为世民掩饰的手法也有点捉襟见肘了。

尽管李渊维护“立嫡以长”的春秋大义的态度是旗帜鲜明的，但是世民并没有放弃打这张王牌希望。与此同时，建成也没有忽略这枚关键的棋子。

在兄弟争斗的伊始，世民即先失一着。由于李渊支持建成的明朗态度，使建成获得了他的另一个兄弟齐王元吉的支持。元吉虽然在才能上难以与二兄长相匹敌，但也绝非像史书上所丑化的那样，除了狠毒之外别无长处。他介入这场争斗并站在建成一边，绝不单单是为建成增加一颗砝码，而是在玩弄着“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把戏，即帮助大哥挫败二哥，再取大哥而代之。虽然他后来落得个连小命都搭上的结局，但也可谓老谋深算之辈。同时，他的介入，使建成获得了强有力的支持者，也使建成、世民的争斗更加精彩纷呈了。

世民深知，要争取父亲，必须把目光先投向能影响乃父的人身上：即李渊所倚重的朝臣和为其所宠爱的后宫嫔妃。

当朝大臣中，世民确有像宇文士及、陈叔达等的支持者，但对李渊的影响力却不及裴寂一人。裴寂是李渊在晋阳起兵时结交的好友，现时是李渊最宠信的宰相，也是最能影响李渊决策的人物，而他却是建成最有力的支持者。所以尽管世民依靠大臣说项的想法并没有错，但是有一个裴寂在朝，世民想撼动建成在政治上的有利地位的举动，也是徒劳的。他只好在李渊所宠幸的嫔妃身上下功夫了。

同其他帝王一样，李渊也无法摆脱耽于酒色的本性。在他诸多的后宫佳丽中，最令他宠幸的是他从杨广手中夺来的德妃尹氏和张捷抒二人。这两位佳人不知施了什么

魔法，使六宫粉黛在李渊面前尽失颜色。不论在上马打天下的军旅生涯，还是在下马治天下的和平年代，他都一往情深地挚爱着她们，连军国大事也免不了要听听这二位的高见。建成、世民兄弟行贿后宫的目标自然是这二位庶母了。

身为太子爷的建成，在结交后宫方面，有着世民不可比拟的优势。太子即是未来的皇帝，后宫诸妃凡想为自己留条后路的，都会主动趋附。尚值年轻美貌的尹、张二人，当然会把赌注押在建成身上。建成也利用自己长留京城得天独厚的优势，给后宫嫔妃的亲属封官晋爵，使后宫自后妃而至侍者，上上下下都传颂他的恩德，并进而在李渊的枕边把这种恩德转化成太子贤仁的美誉。尹、张二人更是不遗余力地为建成捧场。当建成与世民的争斗趋向明朗化时，二妃便李渊面前表露了自己的态度：“使陛下万岁后，（秦）王得志，妾属无遗类。东宫慈爱，必能全养。”李渊既宠爱这两位美人，自然想在自己百年后为她们留条后路，她们既然选定自己的后路，李渊焉有不赞成之理？除此之外，尹、张还积极为建成、元吉充当宫中密探，把世民在李渊身边的活动如实禀报建成，以使其早做应对之策。在世民铤而走险发动宫廷政变的前夜，张捷抒还不忘把从屏风后听到的世民污蔑建成、元吉，为自己准备残杀至亲制造借口的阴谋连夜告知建成。可惜，建成没有充分重视这一消息，大意轻敌，才在笃二天落得个身首异处的惨局。

和建成相比，长期领兵在外征战的世民没有接触后宫的机会，更没有像建成具有未来的皇帝的吸引力而引得众妃趋之若鹜。但是，“猫有猫道，狗有狗道”，世民也自有一套争取后宫的方法。在他长期

领兵征讨、攻城掠地时，所获得的不仅是归属大唐帝国的版图，还有那些战败者的金银珠宝。大凡嫔妃们对金银珠宝都有贪得无厌的本性，世民正是抓住了她们的这一心理，用手中取之不尽的珠宝作为争取后宫的手段。

世民长期不在朝中，他的夫人长孙氏利用自己的特殊身分，亲自出马施展这一功能。被后世史家众口一辞褒誉为贤内助的长孙氏，在世民夺嫡争位的活动中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每当世民命人将一大批珠宝押送至京城时，她便四处活动，替丈夫把这些珍物送到后宫诸妃手中。《旧唐书·后妃传》中说她“孝事高祖，恭顺妃嫔，尽力弥缝，以存内助”，无保留地刻画出了她在深宫中为网络关系到处送红包的真面目。而当世民每次得胜回朝时，便亲自出马，“遍见诸妃，彼金宝多有赂遗之也”。财大气粗的举动，使建成、元吉都自叹弗如。但是，等到世民登上皇位后，却把这一切费尽心机的举动一笔勾销，在史书中留下“惟以抚接贤才为务，至于参请妃媛，素所不行”的粉饰之辞。

当后宫渐渐兴起了对世民的赞誉之辞时，世民却由于一着不慎，得罪了张捷抒，才使这一切前功尽弃了。

世民任陕东道行台时，淮南王李神通有功，世民在自己的辖地内给田数十顷，但这一处丰腴美田却被张捷抒之父相中。张自然要满足乃父的愿望，便亲自在李渊面前为父求情，得到了李渊的赐田手诏。但是，神通也是大唐的王爷，当然不甘就此让出美田，世民也无法出尔反尔，收回成命。这样便惹恼了张捷抒。她便在李渊面前迁怒于世民，挑拨是非，说什么“敕赐妾父地，秦王夺之以予神通”。爱妃为此

受委屈，李渊自然不会顺心，除当天召世民斥责一番外，几天之后，仍然怒气冲冲地对裴寂说：“此儿典兵既久，在外专制，为读书汉所教，非复我昔日子也。”当朝皇帝的这番话，无疑给世民走后宫路线的策略画上了句号。后宫诸妃也把世民的恩惠统统忘记了，转而在李渊面前潜诉世民，使得李渊对世民“恩礼渐薄”了。

这样，世民走中策的希望全化为泡影，剩下的只有发动喋血政变这一条路了。

(4)时刻关注着世民在朝中一举一动的建成，自然很快得知李渊对世民这种态度的变化。这使他喜忧参半：喜的是，父亲抛开世民后会更加维护自己的太子地位；忧的是，他的弟弟决不会就此罢手，由此他预感到兄弟仇杀的不可避免。于是，建成立即开始筹划应对之策，进行积极的反击了。

建成组建了2000多人的警卫队，让他们驻守东宫的长林门。为了加强力量，应付突发事变，又在幽州招募骁勇善战的突厥骑兵300人作为快速反应部队。624年六月，李渊将幸仁智宫（今陕西宜君县境），建成留守京师。建成大权在握，决定趁此机会剪除世民的势力。他派郎将尔朱焕、校尉桥公山去找他的亲信杨文干，让他在外起兵策应。桥公山和尔朱焕虽然领命，但觉得此事关系重大，弄不好会成为替罪羊，便跑到李渊行驾前，将个中细情一一道出。李渊非常震惊，当即将建成召到仁智宫监禁，并立即命令世民领兵讨伐杨文干，并向世民许诺：讨平杨文干后，立他为太子。在世民的讨伐下，杨文干起兵仅十多天就败死。可是，李渊并没有兑现自己的诺言。原来，在世民率兵平叛时，元吉和嫔

妃们乘机为建成求情，再加上受贿赂的中书令封德彝又在李渊面前“固谏”，使李渊打消了因一时愤怒而想夺宗换嗣的念头，只是轻描淡写地责备了一句“兄弟不能相容”，又让建成还守京师，只把东宫官王珪等人作替罪羊流放了事。

在仁智宫事件中李渊袒护建成的态度，使世民加快了政变步伐，也使建成更加肆无忌惮地进行清除世民的活动。此后，世民和建成、元吉虽然表面上仍相往来，但暗中却你死我活。据史籍记载，建成制造了两起谋害世民的事件。

一件是在李渊带领兄弟三人在城南打猎时，建成故意将一匹貌似肥壮却易于颠仆的马送给世民骑。虽然这匹马三次差点置世民于死地，但世民每次都跳离马背而幸免。事后，世民向宇文士及揭露建成的险恶用心时说：“他能让这匹马来杀我，但是死生有命，怎能伤着我呢？”。孰料，世民的话很快传到建成耳中，他马上对此语进行一番加工，让甘心为其所用的嫔妃告诉李渊说：“秦王自言，我有天命，方为天下主，岂有浪死？”言下之意是世民有夺取皇位的野心。李渊听后，果然大怒，将世民召来重责一顿。

另一件事是：一次，建成夜间召世民到东宫饮酒。据史书记载，建成是在酒里下了毒，世民在酒席上当即心中暴痛，“呕血数升”，被叔父李神通扶回宫中才幸免一死。第二天，李渊得知后，先是不着边际地说建成：“秦王素不能饮，自今无得复夜饮。”又对世民说：“我看你兄弟二人似不相容，同处京城，免不了相争，你还是离开京城去洛阳吧。”

李渊这番安抚之辞，正中世民下怀。洛阳是形胜之地，他早就把这里当成了“一朝有变，欲出保

之”的地盘，并且一直派他的亲信温大雅和张亮在此经营。这次李渊发话让他走，他当然乐意避开在京城的不利地位，到洛阳发展势力。但是，建成和元吉也早已洞察到世民的野心，岂能放虎归山，所以指使亲信放风说：秦王左右听说去洛阳都很高兴，将会另立朝廷。李渊听后，又打消了这一念头。

建成、元吉见此计得逞，乘机煽动尹、张在李渊面前诋毁世民。元吉又亲自向李渊奏请，秘密杀掉世民。虽然李渊念及世民有平定天下之功，一时又难以割舍父子之情，对世民没有采取措施，但是，元吉敢公然在李渊面前提此建议，则说明双方的斗争已经发展到临近解决的关头了。

为了能在政变中稳操胜券，建成、元吉又千方百计削弱、瓦解世民的府僚。尉迟敬德是威胁他们最大的障碍，建成亲自送去金银器一车进行收买，孰料这位后世的“门神”却一口拒绝。元吉见软的不行，索性派刺客行刺，结果刺客也被早有所料的敬德以计吓跑。软硬兼施之计失败后，剩下只有诬告敬德谋反，李渊果然将敬德下狱，亏得世民固请才得免一死。

秦王府的另一个被打击的对象是左一马军总管程知节，也就是妇孺皆知的三板斧程咬金。建成很怕在与世民的争斗中，这个程咬金再半路杀出来坏其好事，便在李渊面前进行诬陷，让他出任康州（甘肃成县）刺史。虽有李渊的诏命在身，程咬金却竟敢抗命。他对世民说：“大王手臂今并剪除，身必不久。知节以死不去，愿速自全。”看来，他是注定要在这场政变中半路杀将出来了。

接着，建成、元吉又将打击的对象转向世民手下谋士，首当其冲的是房玄龄和杜如晦。房、杜在世

民左右已有十年了，是秦王府智囊团中的核心人物。建成、元吉在李渊面前大肆攻击二人，遂使二人被逐出秦王府，并严令以后不许私自晋见世民。

与此同时，世民也采取“以治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策略，同样收买、瓦解建成手下的部属。与建成收买结果不同的是，世民成功地笼络了建成手下两个极为重要人物：一是太子率更丞王珪，一是建成的下属、驻守玄武门的常何。王珪因为随侍建成左右，对建成的行动了如指掌，正是他最后将建成的密谋向世民合盘端出，使世民得以先下手为强；常何虽是玄武门的更夫，官职不大，但据后世学者研究，玄武门在唐代历次政变中均处于关键地位，哪一方能够占领这个宫门，就保证了军事上的优势，取得胜利，因而玄武门是双方必争之地。常何被收买后，即成为世民预先布置在这一要地的一枚棋子。

一场兄弟互相残杀的喋血政变，已犹如刀出鞘，弓在弦，其势不得不发了。

(5) 重大事变的决策及其成败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时机的选择。在世民、建成这场即将兵戎相见的争斗中，双方都在选择发难的机会。恰在此时，北方的突厥数万骑入塞南攻，骚扰唐境。建成抓住这一机会，首先向世民发难。

在此之前，凡有突厥进扰，大都是由能征惯战的世民督军出战。而这次，建成则在李渊面前极力推荐元吉统军御敌，李渊一口应允。建成此举，绝非是怕世民独揽头功，其真实意图是，借此出兵的机会，将秦王及其府僚一网打尽。

元吉得到出征的兵符后，建成即对他说：“你将秦王手下骁勇猛

将全部征行，严密控制。在出兵之时，我和秦王在昆明池宴饯，乘机将其杀掉。然后告诉父亲，说他暴死。秦王手下的猛将既为你所控制，征战结束后，将他们全部处死。这样，我们就可稳操胜券了。”建成的计划可谓十分周全了，但却败在了他的亲信王珪的手里。

掌管东宫机密的王珪，将建成、元吉的阴谋原原本本地报告了世民。在这生与死的危急关头，秦王府的尉迟敬德等都劝世民先发制人，而史书上却写了世民“骨肉相残，古今大恶”的宽厚仁人的心态了。其实，世民早已将冠冕堂皇的道义扔在一边了，他所真正关心的是，自己有没有必胜的把握。

既然要兵戎相见，双方力量的对比是首要考虑的因素。当时，秦王府在京师的兵力远不及太子和齐王，而且太子和齐王分居两宫，一旦交兵，秦王府将两面受敌，必然险象环生。在这种情况下，素称大智大勇的世民只好求助于龟卜以决凶吉了。恰在此时，幕僚张公瑾从外面进来，见状大声反对道：“现在大事已定，不能再犹豫了，还卜什么凶吉？假如卜而不吉，难道要坐以待毙吗？”说完将龟扔到地下。在场的府僚都纷纷附和。世民于是定下了政变的计划。

这一天是626年六月二日。

第二天，一桩通常不为人所注意的小事的发生，迫使世民的政变计划提前了。

这一年的五、六月，太白星屡屡在白天出现。太史令傅奕在六月三日将这一星相上奏李渊，并解释说：“太白见秦分，秦王将有天下。”这一星相，古人的解释是属于凶兆，决非祥瑞。或许傅奕在此时将这一星相上奏皇帝，是想为世民讨一个天意如此的印象，但其结果却恰恰相反。李渊却将傅奕的报告理

解为：星相呈凶兆，预示着世民将谋反篡位。于是，他立刻召世民进宫，当面审问其谋反的罪证。

世民怎样应付乃父的审问，史书上没有记载，但从后来已经登上帝位的世民，对傅奕说及此事时“汝前所奏，几累于我”的话来看，世民当时肯定相当狼狈。但是，他到底还是沉住了气，反守为攻，诬告建成、元吉与尹、张淫乱。

世民采取这种“床第易诬”的手段虽极为卑鄙，但确实有回天之力。因为李渊听了发生在自己的宠妃与儿子身上的乱伦事，当然勃然大怒，不能不进行追究。于是，暂停对世民的质询，改定在第二天把建成、元吉召来一齐质询，当时即令世民明天一早到场。世民这才从险境中逃脱出来。

有这点喘息时间，世民用来发动政变是足够了。

回到秦王府，世民立即召集府僚，并派尉迟敬德和长孙无忌将已被逐出秦王府的房玄龄、杜如晦召回府中，连夜议事，决定在第二天早晨，趁建成、元吉上朝时，在玄武门设伏，将二人杀掉。

六月四日一早，高祖上朝，朝中重臣裴寂、萧瑀、陈叔达、封德彝等也已到齐，专等建成、元吉、世民的到来。而此时，世民却正率尉迟敬德等9人，在玄武门当值更夫常何的配合下，布置埋伏。

不一会儿，建成、元吉骑马赶来。两人行至临湖殿时，顿觉情况异常，便掉头回马，但是已经来不及了，世民已亲率手下迎面冲来。元吉仓皇间拔弓便射世民，但因控弦未开，虽连发三箭，都未达到射程。世民张弓还射，建成当即中箭而死。元吉拨马便逃，尉迟敬德赶来射中元吉坐骑。元吉弃马逃往树林，世民纵马追去，不料被树枝挂住衣服，从马上坠下。元吉趁机跳

过来压住世民，双方展开了徒手搏斗。元吉孔武有力，世民难以抵挡，渐渐处于下风。这时，敬德纵马赶到，元吉立即逃往武德殿。敬德引箭便射，元吉也中箭身亡。

这时，太子东宫府和齐王府的精兵2000人赶到玄武门，向秦王府发起进攻。在玄武门的秦府兵不多，加上常何的少量禁军宿卫兵，也难以抵挡，情势十分危急。“有勇力”的张公瑾赶忙关闭宫门。正在紧要关头，尉迟敬德持建成、元吉的首级赶到，东宫、齐王府的将士见主子已死于非命，无心恋战，纷纷溃逃而去。双方的血战，总算告一段落。

在激战平息后，世民即派敬德“擐甲持矛”，进宫找李渊。李渊对政变已有耳闻，一见到凶神恶煞的“门神”敬德，自然是惊慌失措，束手就范。敬德以保卫人身安全为借口，把他监视起来。萧瑀、陈叔达等一千老臣，为自身安全着想，忙劝李渊顺应时势。这样，李渊宣布立世民为太子，并降敕平息了东宫、齐王府的战事。

这时，世民赶赴宫中与父亲相见了。父子相见的场面，堪称玩味。

世民见到了在敬德挟持下的李渊时，丢掉武器，跪在李渊身边，一边吮着他的乳头，一边嚎啕大哭，那神情仿佛受到了莫大的委屈。据史书记载，李渊“体有三乳”，跪吮抚玩大概是世民小时候与父亲亲昵的习惯。此时此刻，世民当众重复儿时与父亲昵的这一举动，展现了他作为政治家的心机：一方面是想保全自己“仁孝”的名声——为以后立金字牌坊埋下伏笔；另一方面是给李渊一个信号——我绝不会像22年前的杨广那样，但是前提是你必须与我和好。

李渊果然知趣得很，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已经完全按照世民的预

谋进行了：

政变当天，李渊即发布几道诏令：一道是“军国事皆受秦王处分”——将权力和平移交。一道是对三个儿子的评价，将建成、元吉说成是内挟邪谋、将危社稷的十恶不赦的大坏蛋，而世民将他们除掉则是国家“政道惟新”的开端。

三天以后，一道委任世民为太子的诏令又自宫中发出。

十多天后，李渊又“请求”儿子的谅解，请他允许自己退位，去当安然无事的太上皇。

两个月后，儿子“谅解”了父亲，在东宫显德殿穿上黄袍。世民成了大唐帝国的第二代皇帝。号“大唐太宗皇帝”。

(6)太宗既在显德殿登九五之尊，自然想向天下昭示其德行。但是，“玄武门之变”中自己弑兄胁父的表现，显然又与传统意义上的道德相悖。如何变相悖为相符，去掉这一污点，为自己立一座金字牌坊，是太宗处心积虑的事情。

恪守“以古为镜，可知兴替”的信条的他，首先想到的是在青史上作文章。他逼迫魏征等人违例地拿出“实录”来“御览”。这一“御览”的结果是：1. 晋阳起兵的首功归为已有；2. 弑兄诚是迫不得已，因为建成、元吉是奸邪之人，我如此是“大义灭亲”、“替天行道”。3. 胁父退位是为黎民百姓，因为我有作为尧舜之君的才华和能力。而这一“御览”还有一个太宗难以预料的结果：为后世开启了曲笔写史的恶例，害得史家们不敢轻信唐代的正史和实录。

太宗既立意要在青史上垂名，在行为上也必将有所表现。“玄武门之变”后，他为彰示仁孝，追封已成为死鬼的两个兄弟，为他们隆重发丧，并选择自己的儿子过继在兄

弟名下，以承嗣祭祀。这一举动颇遭人非议，因为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假若太宗真有仁性，当初杀掉二兄弟后，又何必杀掉尚在孩提的10位侄子呢？

但是，“御览”青史和渲染孝悌仁让，并不能使太宗内心自安。那血淋淋的一幕并非粉饰即可忘掉。两位兄弟的魂灵经常在梦中向他追索，逼得他几乎夜不能寐，无奈，他只好让尉迟敬德、秦琼在夜幕降临时，来门前侍卫保驾入睡。现今民间的门神，即是这两位将军的化身。这一事实，或多或少还显示了道义的威慑力量。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643年，他的两个儿子太子承乾和魏王泰，又重演了他当年的把戏。此后，太宗的子孙们后浪推前浪，在发动宫廷政变方面一代超越一代，仿佛在

以太宗为镜。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长河中，惟大唐一代宫廷政变的次数最多。

现今，我们将一代明主太宗的这一面展示出来，并非想加入过多的道德阐释。从个人立场，我们难以对他表示同情。其残酷少恩，至少和“闻一不义杀一不幸虽得天下不为”的宗旨相违。可是，以当时的历史情况而言，皇帝是最高权力的象征，难免有人要涌起“皇帝轮流做，今天到我家”的欲望。而这欲望的实现，通常是残酷少恩的。本着如西方的马基亚维力在《君主论》中所言，“执政者的恩怨与个人的恩怨并不同”的原则，此事用不着史家再去辩说。更何况，太宗毕竟是一代有为之君。

但是，“玄武门之变”对唐太宗

英明君主形象的树立则有着直接的联系。从前述唐太宗的矛盾心理可以看出，他既有弑兄杀父的行为，又因饱读圣贤之书，不能摆脱良心的谴责，所以要极力剖白他是不得已卷入这场悲剧的漩涡的。到他登上九五之尊后，这种矛盾心理则为自己赋予一种社会价值，即向世人昭示他有作为尧舜之君的才华和能力，而他的雄才大略也足够用。因此，采取多种措施使皇权合理化，对盛唐的形成，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与此相伴随，太宗的英明形象也彪炳史册。

由太宗的历史，即可见人类性格复杂之一斑。从这个意义上讲，立太宗为存照，或可留下一个意味深长的话题……

（责任编辑：刘家驹）

中央红军中女红军参加长征的有多少？

● 张震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离开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长征中，中央红军有多少女红军参加了长征？有多少女红军走完了两万五千里的长征路？

中央红军由江西瑞金出发前有女红军32人。由于黄长姣、彭儒两人患病，未能随军出发。

她们走完二万五千里行程，最后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女红军只有25人。他们是：邓颖超、康克清、贺子珍、刘英、蔡畅、李伯钊、邓六金、钱希钧、李坚真、廖似光、危秀英、刘群英、金维映、丘一涵、吴仲廉、谢飞、曾玉、刘彩香、肖月华、周越华、杨厚珍、李建华、危拱之、陈慧清、钟月华。其余5人，或在长征途中壮烈牺牲，或在征途中被敌人打散，几经

转折、后来重返党的怀抱，或历尽险阻，半途归返故里。如吴富莲，长征到达四川懋功后，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吴富莲编入张国焘的左路军，与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一起，三过草地，两爬雪山，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会宁，吴富莲调任妇女先锋团政委，随西路军向甘西、新疆挺进，沿途与马步芳部，殊死奋战。1937年3月，她转移到祁连山口犁圆堡后，在与敌人激战中壮烈牺牲。王泉媛，长征到达甘肃会宁，她与吴富莲同参加西路军妇女先锋团，担任团长。西路军失败后，她被马步青部俘掳，在敌人的残酷折磨囚禁拘押下，坚强地活下来。1942年7月，历尽曲折艰辛，沿途乞讨回到了江西吉安老家。解放后重新参加工作，1985年后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阚世英、李桂英在长征

到达扎西以后，她俩留在川南游击队，担负开辟敌后根据地工作。1936年冬，川滇军阀围追堵截这支游击队，游击队寡不敌众，在云南沙子池被打散，她俩被捕。在敌人监狱，她们坚贞不屈，1937年阚世英被送解回家，同年9月，与组织取得联系。后被安排在四川重庆党组织工作，1940年才到达延安。李桂英1937年10月，经组织营救，保释出狱，1938年到武汉长江局工作。谢小梅1935年3月，中央红军过北盘江时，由于丈夫罗明在遵义战役中负伤，奉命留下做农运工作，谢随同留下。后因未能与当地组织取得联系，几经周折最后返回广东大埔老家，继续坚持党的地下革命斗争。

（张震：遵义市党史研究室副研究员）

新中国建立时的国号之争

● 余广人

1949年9月25日深夜，来京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各方面知名人士，都收到了由周恩来、林伯渠两人联名的午宴请柬：“9月26日上午11时半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举行午宴，并商谈重要问题，务请出席。”

请柬中所说的“商谈重要问题”是什么呢？

原来，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人在筹备建国时，虽然将国号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同时又加上了“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号。在政协主席团常委会讨论这一方案时，对要不要后面的括号，产生了两种不同意见，有人认为应该要，有人认为不应该要，双方争持不下。于是，主席团常委会责成周恩来向各方面的知名人士征求意见。

26日上午11时半，会议在六国饭店准时召开。周恩来首先讲话说：“今天请来赴会的，大都是辛亥革命时期的老前辈。我国有句老话，叫做‘就教长者’。各位看见‘共同纲领’中的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下，有一个‘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弧。对这个简称，有两种不同意见，有的说好，有的说不必要了。常委会特叫我来请教老前辈，看看有什么高见。老前辈对‘中华民国’这四个字，或许还有点旧感情。”

周恩来的话刚讲完，民建的黄炎培即发言说：“现在虽说解放了，但由于老百姓受的还是落后的教育，感情上习惯用‘中华民国’，一旦改掉，会引起不必要的反感。留这个简称，我看是非常必要的。况且，政协5年召开一次，5年之后我们觉得这个简称不必要了，再去掉它也并无不可。”

听完黄先生的发言后，何香凝说：“中华民国是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一个结果，是许多烈士用鲜血换来的。关于改国号问题，我个人认为，如果能照旧用它，也是好的，要是大家都不赞成，我也不坚持己见。”

第三个发言的是辛亥革命后“归隐”38年、平生不写民国国号的前清进士周致祥。他说：“我反对用，‘中华民国’之类的简称，因为二十多年来，这一名称已被蒋介石弄得不堪言状了，成为一个祸国殃民，群众对它毫无好感的名称。所以，我主张就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两次革命的性质各不相同。”

司徒美堂非常赞赏周致祥的意见，接着发言说：“我虽然是参加辛亥革命的人，我也尊敬孙中山先生，但对于‘中华民国’四个字，则绝无好感。理由是：中华民国，与民无关，22年更给蒋介石及C. C派弄得天怒人怨，真是令人痛心疾首。共产党所领导的这次革命是不是跟辛亥革命不同？如果大家认为不同，那么我们的国号应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抛掉又臭又坏的中华民国的烂招牌。国号应该是极其庄严的，既然改就得改好，为什么还要等到5年之后才改呢？古语说得好，‘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令不行’。现在革命胜利了，还称中华民国，连国号也不敢改，何以昭告天下百姓呢？所以，我坚决反对什么简称，我主张光明正大地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号”。

司徒先生的发言，赢得热烈的掌声，与会者纷纷发言。马寅初先生说：“我拥护司徒美堂的主张，因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后加一个简称，实在不伦不类。”陈嘉庚、张澜、陈叔通、车向忱也发言表示赞成。车向忱还从教育群众方面作了阐述。他说：“新国号老百姓可能一时还不能接受，但这只是个宣传教育问题。经过宣传，让人认识我们这次革命政权的性质，老百姓不见得反对用新国号”。

著名法律专家沈钧儒则从法律的观点解释新旧国号不能兼容原因。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后加上‘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弧，的确是法律上的一个大漏洞，不合法律观点，也万万不应该如此。世界各国的国号，只有字母上的缩写，而没有载之于立国文件上的其他简称。况且，将来在行文上，包括用国家名义与其他国家订约，都有诸多不便。所以，我也主张不用那个简称。可能有些群众还会写中华民国，但那是他们的一时之便，我们也不要明令禁止，慢慢就会改过来的。”

沈钧儒的发言后，与会者再无不同意见。会议即宣告结束。周恩来作了小结。他说：“我会把老前辈的意见综合起来，送给主席团常委参考，最后由主席团常委作出决定。”

后来，主席团常委接受了这些老前辈的意见，去掉了简称，确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新国号。

毛泽东堂弟毛泽润是怎样被杀害的

● 周 楹

1940年，国民党发动了反共高潮，毛泽东堂弟毛泽润在老家难以客身了，他离妻别女，决定到延安找堂兄去，那里是中国人民抗日的希望所在。

毛泽润千里迢迢来到宝鸡，再往陕甘宁边区北上的途中，不幸被捕，关进西安太阳庙门监狱，拘押竟达九年之多。

九年岁月，斗转参横。日寇举手投降，国民党发动内战一败再败，在西安的“西北王”胡宗南已独木难支了。

1949年5月18日，也就是西安解放的前两天，一辆卡车改成的囚车，经宝鸡、凤县、留坝急速向汉中开进。车箱内十名军警如临大敌，三名囚犯双手被缚，双脚系链，一路随车疾驰，两天后被押送到汉中的胡宗南绥靖署二处（特务处）看守所（今汉中市法院街汉中军分区招待所东侧）。

这是一座秘密监狱。关押着170多名犯人。新押来的3名囚犯关在10号囚室。

囚室阴森可怖，3名囚犯很快互通姓名，一个叫陈宝镗，关中蒲城人，在胡宗南部队搞策反的。

另一个叫陈洪中，四川通江人。1938年就任职八路军某师政委，后来国民党驻河南的军事长官汤恩伯，请求共产党派员帮助他训练军队，陈洪中担当了此任。1939年冬，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

共高潮，汤恩伯扣押了陈洪中，作为重点政治犯关押在西安太阳庙门监狱。

陈洪中问毛泽润：“你是南方口音，你怎么被关的？”

毛泽润叹了口气道：“我什么罪也没有，只因我是毛泽东的堂弟，我叫毛泽润。”毛泽润讲述了被捕经过，陈宝镗眼睛一亮：“怪不得，我们由西安到汉中的一路受到那么高的待遇，军车开道，机枪保卫，原来是沾了你这个‘千岁爷’的光啦！”

毛泽润笑笑：“我这‘千岁爷’可比不上你们驰骋疆场，劳苦功高啊！我是虚有其名，连延安都没去过的‘重点政治犯’，胡宗南白关了我9年哪。”

1949年七八月间，不断有小道消息飞传，中共已兵临兰州，银川、西宁解放，二马（马步芳、马鸿奎）西迁，新疆准备和平解放。国民党驻汉中的军队，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就连秘密监狱的看守们也对未来充满了恐慌，他们不再对毛泽润等三人冷眉恶眼了，有的还谦恭地：“你们要保养好身子啊……”

一天，毛泽润正和难友们谈论“天气要变了”，突然牢房门打开，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被推了进来，一个踉跄险些扑倒在地，毛泽润和陈宝镗赶紧将他扶住。

新来的囚犯英俊潇洒，像个读书人。他向囚室的6个人点头表示

问候，毛泽润轻声问他：“你怎么啦？他们为什么送你来这儿？”

年轻人自报姓名说：“我叫朱清扬。我已经被抓了三次了。”

陈洪中说：“抓了三次恐怕不是一般的案子吧？”朱清扬道：“你说对了，我是汉中日报编辑。只因报上出了个‘拥护总裁乱到底’的大题词，把戳字漏了没校出来，可他们硬说我通共……”

毛泽润一听来了神：“怪不得，你的规格高着哪。”

朱清扬没想到，能和毛泽东的堂弟一起坐牢。

毛泽润关切地问，解放军有何活动？朱清扬说，听说你的堂兄毛泽东已在北京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了。毛泽润高兴地一跳老高，其他难友也欣喜若狂。

此时，刘邓大军已进军川黔，兵分两路，一路已翻过武陵山出彭水，进逼重庆；秦岭以北贺龙的十八兵团准备直扑汉中，胡宗南眼看解放军将形成南北钳击云贵川之势，便加速由汉中等地向川西撤退。于是，胡军未击先溃，警备司令部人心惶惶。

狱中难友们心情大快。毛泽润却喜中有忧，陈洪中也一脸愁云，敌人会在情况紧急时下毒手的。汉中虽是小地方，胡宗南也是不肯轻易放过的。

此时，监狱把年龄30岁以下的犯人一律充军，押往前线抵御解

放军。

“现在的问题，是要想法多出去几个人，”毛泽润对陈洪中说，“政委啊！朱编辑的事我们要操点心哩。”师政委点点头。

朱清扬这时心里乱得很。自从他被抓进胡宗南的秘密监狱，他有幸结识了毛泽润、陈洪中、陈宝铮这样的一批革命者和爱国人士；受到了他们诸多关心，难以忘怀。然而，他有家，他要和亲人团聚，眼见狱中犯人一天天减少，放风通道内，看守不断点名，呼叫犯人姓名，出去后不见回来，隔一阵又听到汉中北教场传来“嗒嗒……”的枪声，那是在枪杀犯人啊！

朱清扬也不知道敌人怎样处置自己。11月25日下午，与他同案的报纸发行工人海洲及其它囚室犯人多数被点名叫出去了，就是不见10号囚室的人，陈宝铮说：“瞎着哩，胡宗南要对我们号子的人就地下毒手哩！”朱清扬心里更为惶恐，他佩服毛泽润临危不惧，他问毛泽润：“你估计我的问题是怎么回事呢？”

毛泽润和陈洪中已给看守做了工作，此时，他安慰朱清扬：“别慌，我代你催问。”他随即从囚室门上的方孔洞中对看守招了招手：“班长，过来一下。”

那看守见四周无人，迅速过来问道：“有什么事吗？”

“班长，朱编辑的事办得怎么样了？”

“现在还很难说。”

“请你再催问一下，多说几句好话，……”

“行……”

看守去了，朱清扬眼睛湿润了。同落敌手，毛泽润置己身存亡于不顾，先想到的却是他。

两天后，一名看守握着一张纸条呼叫朱清扬。朱清扬近前一瞥，

上写“释放”二字，朱清扬一惊，此“释放”是秘密处决呢还是真放出去？因为一般写明“交保释放”才是真正的释放。这纸条没写“交保”二字，难道他们要……朱清扬不敢细想，只试探着问“带行李不？”回答“带”。这时朱清扬才放下了心。

1949年11月30日，汉中的“看守所”已一片混乱，国民党的电台传来了噩耗，昨日重庆市区已闻解放军的炮声，从广州失陷前迁往重庆的“国民政府”又迁往成都。同时，贺龙部十八兵团正从宝鸡入川作战，汉中危矣。

毛泽润所在的监狱中所剩犯人，只有不多的一批重点政治犯，即日被强令秘密押往成都……

1949年12月6日，汉中解放，狱门大开，朱清扬来到监狱找来找去，除和自己同案的孔昭俭和其他15名囚犯外，其余杳无踪迹。一打听，国民党当局于12月3日炸毁了宝鸡通往汉中的北栈道天星桥及汉中电厂，把狱中犯人枪杀了一批，其余要犯全部押往四川。朱清扬放声大哭：“千岁爷”呀！你在哪

里？

此后，刘邓大军将胡宗南及川境几十万军队围歼在成都邛崃，四川全境解放。毛泽润下落却不明。

1950年3月左右，《群众报》（陕西日报前身）登出一则消息，在四川绵阳，毛泽润、陈洪中等被国民党反动派活埋。看到这则消息，朱清扬泣不成声：“‘千岁爷’呀，你咋就没逃出来呢？政委啊！我想你这个‘老妈妈’啊！”

毛泽润到底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被害的，《群众报》未作详细报道。不过有人推测，胡宗南撤往成都的后路已断，胡军特务秉承主子之意，把这批政治犯就地处决，时间可能是1949年12月20日左右。

不管情况如何，毛泽润毕竟被国民党反动派残酷杀害了。朱清扬痛彻肺腑，他常常思念毛泽润，每当想念毛泽润时，他就拿出自己当年的照片，仔细欣赏……

（责任编辑：仲文）



朱清扬近影



刚出狱时的朱清扬

《大刀进行曲》是怎样产生的

● 赛孝鹏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全国武装的弟兄们，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这支《大刀进行曲》，我国人民已传唱半个多世纪了。你可曾知道，这支歌曲开始时是专门为国民党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大刀队的将士们写的呢？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占领了我国的东三省，接着，又开始向关内进犯。1933年元旦，山海关保卫战揭开了长城抗战的序幕。这时，驻山西阳泉的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奉命开赴长城前线对日作战。

二十九军是冯玉祥的西北军的老底子。全军二万二千人武器装备极为破旧，有三分之一的枪械是汉阳造，有三分之一是毛瑟枪，还有三分之一是自己修械所制造的土枪。而且弹药奇缺，许多子弹兵工厂早就不生产了。

面对低劣的装备和优势的敌人，军长宋哲元不怨天尤人，他们沿袭西北军的老传统，支起一个个铁匠炉，为每个士兵打造了一把锋利的大刀，而且每个团都配了操刀教练员，使不少士兵练就了一手高超的大刀术。

1933年3月9日，他们奉命紧急出发，接管长城喜峰口的防务。

喜峰口是北平与热河交通之咽喉。东有铁门关，董家口，西有潘家口，罗文峪。明清时不但是京师北卫的主要屏障，也是关外人朝进贡的关口。

当二十九军的先遣团赶到喜峰口时，日军的500余名骑兵已拥到了长城脚下，勇士们急忙堵上去，打退了敌人，保住了阵地。

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当晚，喜峰口前线总指挥、二十九军一〇九旅旅长赵登禹，挑选了500名大刀队员夜袭敌营。

出发前，赵登禹把500大刀队员召集起来进行动员，他说：“弟兄们，我们经过几年的磨砺，就是为了打击外虏，为国效力。今晚是我们大显身手的时候了！我们的口号是：有进无退，死而后已！”

500人分左右两路出发，左路由副团长孙儒鑫率领，从喜峰口之西的潘家口挺进，向蔡家峪一带进攻；右路由营长王昆山率领，从喜峰口东的铁门关插向白台子。

两支突击队，于凌晨二时先后到达目的地。这里是日军的大本营，鬼子们这时正在帐篷里蒙头大睡，500名大刀队员抡起大刀，奋起神威，挨着帐篷一溜头地砍了下去，近千名敌人从梦中惊醒，光着身子往外跑，不少人撞在二十九军勇士们的刀口上，都作了无头鬼。

大刀队在这里砍杀了近三个小时，使500多名敌人身首分家，还顺便焚烧了十几辆满载各种物



喜峰口第二十九军大刀队准备肉搏

资的汽车。在往回撤的路上，他们又将沿途狼洞子、黑山嘴和南北杖子等处宿营的敌人，用大刀砍杀殆尽。

二十九军大刀队英勇杀敌的事迹，极大地振奋了国人之心。不少报刊纷纷载文颂扬他们用古老的武器，打败了现代化的侵略者。

3月11日夜里，二十九军组织了对敌人的第二次夜袭。这次共出动4个团的兵力，左路由赵登禹旅长率王海团和黄升堂团从潘家口出击；右路由佟泽光旅长率李九思团和全瑾莹团由铁门关出击。战士们身上仍背一把闪闪发亮的大刀，带八颗手榴弹。

星夜，冷月高照，寒风掠面，勇士们沿着山间小道，踏着路上的积雪，静悄悄地出发了。

凌晨三时，战斗打响。营长苏东元率部砍死了200多名敌人，缴获了敌人停在外面的装甲车、汽车和18门高仰着脖子的野炮。这些东西虽然中国军队很需要，但却带不走。“烧掉它，炸掉它！”他指挥士兵们给装甲车、汽车泼上汽油，用火一点，“轰”一声大火映红了半边天；对18门野炮，他们把手榴弹塞进炮膛引爆，炸成了一堆废铁。

连长张维瑾，带领大家砍死了一个炮阵地上的40多个敌人，缴获大炮4门，炮弹36发，他学过打炮，便顺手把36发炮弹全部打向



二十九军大刀队训练劈刀

敌人住地，炸得日军哭爹喊娘。

这次夜袭，二十九军共砍死砍伤敌人3000多名，烧毁了敌人200多辆汽车上的弹药和粮秣，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遭袭后的敌营里，到处是无头的尸体，不少人半夜经常被惊醒：“大刀队来了，快跑呀！”不少日本兵晚上睡觉前，脖子上还要戴上一个自制的铁护圈，以防脑袋被中国军队砍掉，他们很迷信一个传说：上帝不接收没有脑袋的灵魂，还要罚他去做各种苦役。

中国人民则热情讴歌二十九军大刀队的杀敌精神，报纸上登出了这样的诗歌：

大刀大刀，雪舞风飘，
杀敌头颅，壮我英豪！

当时上海有位青年音乐爱好者，叫孙培元，又名麦新，在一家外国公司供职。二十九军官兵大刀杀敌的事迹给了他极大的激情，他

废寝忘食地投入创作，不久，《大刀进行曲》便问世了。

最初发表时，副题为：献给二十九军大刀队。原歌词为：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二十九军的弟兄们，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
后方有全国的老百姓。
咱们二十九军不是孤军，
看准那敌人，
把它消灭，把它消灭……

后来，为了便于全国人民传唱，歌词作了部分修改，去掉了“二十九军”的字样。

大刀杀敌的风采，体现了中华儿女英勇不屈的精神，它将继续为我们的后代传唱下去。

（责任编辑：刘文）



二十九军大刀队开往喜峰口

历史上的谢安

何以为毛泽东称赞

● 邹兆辰

在毛泽东晚年最后的读史生活中，他特别注意读《晋书》、《南史》、《北史》等史籍。1972年10月，毛泽东视力较差，他让学者将谢安等人的传记进行标点和注释，用大号字体印刷，以便阅读。毛泽东读得非常认真，连注释中的一个错字也发现了。他指出，注释中的安徽“濉汉”二字疑是“濉溪”之误。

毛泽东也常读他那部武英殿本的《晋书》。对于《谢安传》他读得很细，书上有很多他读后圈画的笔迹，还写了称赞谢安的“有办法”、“谢安好”的批语。在读《谢安传》的同时，他也读了《桓温传》，但评价却完全不同。对于桓温的北伐，他批了“是作样子”四个字，一语点破了桓温借北伐之举谋取篡夺东晋政权的野心。

在1975年5月底与芦荻的谈话中，毛泽东曾详细地论述了他对这两个人作出不同评价的原因。毛泽东对谢安给予很高的评价，“原因就在于谢安为维护东晋的统一局面，立了两次大功。一次是他指挥了‘淝水之战’，以少胜多，打了个漂亮仗；另一次是他拖住了搞分裂的野心家桓温，使其分裂的阴谋没有得逞。”对于桓温，毛泽东说：“桓温是个搞分裂的野心家，他想当皇帝。他带兵北伐，不过是作样子，搞资本，到了长安，不肯进去。符秦的王猛很厉害，一眼就看透了他的意图。还是谢安有办法，把他拖住了，使他的野心没得实现。谢安文韬武略，又机智又沉着，淝水之战立了大功，拖住了桓温也立了

大功，两次大功是对维护统一的贡献。”

毛泽东对这两个重要人物的评价基本上反映了古今历史学家的共同观点，但所不同的是，历史学家们多注重谢安在淝水之战中作用的评价，对他个人的思想作风也较注意，但对于谢安在抑制桓温野心的问题上却没有像毛泽东那样把它放在与淝水之战取胜同样的位置上。毛泽东把拖住桓温也看成是“立了大功”，这可能是与毛泽东在“九·一三”事件以后，对于警惕野心家的企图给予极大的关注这种特殊心态有关吧！

谢安抑制桓温篡权野心的事件发生在淝水之战以前。当时，桓温是权倾天下的人物。346年他率军攻破十六国中的蜀国，从此威名大振。354年桓温统兵进攻前秦，他的军队已进逼长安，三辅郡县皆降，但却屯兵灊上，不作最后的进攻。当时隐居华山的名士王猛来见桓温，“扞虱而谈当世之务”，指出桓温“不远数千里，深入敌境，今长安咫尺而不渡灊水”，因此“百姓不知公心”。其实，王猛已经看出桓温的企图：“但欲以功名镇服江东，非真有心于伐罪吊民，恢复境土。”369年桓温再次北伐，与燕慕容垂等战于枋头，大败。回建康后，以大司马的高位专擅朝政，他的野心也日益暴露。这次北伐前，他本想“立功河朔，还受九锡”，这样便可以取司马氏的王朝而代之。然而，这次战败使他篡权的企图受挫。

两年后，桓温所立的简文帝病

死。桓温所抱简文帝禅位于他的幻想成了泡影。后来，桓温本人也患了病，他篡权的野心更加急不可耐，多次要求朝廷为他“加九锡”，这是仿效曹氏篡汉取代司马氏政权的准备步骤。这时，执掌朝廷政事的正是谢安。他见到朝廷为桓温加九锡的文书已经写好，便以要进行修改为由，延缓其事。尽管桓温“累相催促”，而谢安却“历旬不就”，致使桓温篡代的阴谋完全破产，从而避免了处于危机之中的东晋王朝的大分裂、大动乱，稳住了局势，为十年之后淝水之战的胜利创造了有利的内部条件。

桓温死后，谢安以司徒、侍中、卫将军等官职主持朝政，东晋政权“君臣和睦，上下同心”。383年，前秦皇帝苻坚亲率几十万多民族的军队攻晋，妄图一举灭晋。谢安命谢玄为前锋都督，与谢琰、桓伊等率众八万拒之。晋军在数量上显然居于劣势，但在谢玄的正确指挥下，淝水一战大败秦军，取得了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胜利。

1975年上半年，由于患白内障毛泽东主要靠工作人员为他读书。这年8月份他做了白内障切除手术后，在医生还不允许读书的情况下，他再次阅读了《谢安传》、《谢琰传》、《谢玄传》。今天，在他那部线装本的《晋书》上仍然留着他这次阅读时写下的苍劲的字迹：“一九七五八月，阅第五十至五十六卷，再阅第三十四卷《羊祜传》、《杜预传》；九月再阅第七十九卷《谢安传》、《谢琰传》、《谢玄传》。”由此可以看出，谢安是毛泽东晚年特别称赞的人物。

1993年，在北京召开了一次有海内外谢氏宗亲和专家学者参加的谢安与淝水之战学术研讨会，共同纪念、缅怀这位著名的政治家。这也表明，对于这样一位有功于历史的人物，人们是不会忘记的。

时值7月,是本刊创刊4周年的日子。特选发三封读者来信,以资纪念。感谢热心读者对本刊的无微不至地关怀,铭记读者对本刊的诚挚批评和热情帮助。

人说“顾客是‘上帝’”,我们说“读者才是期刊的真正‘主人’”。本刊创办4年,如果没有广大读者对本刊办刊方针的认同和支持,在激烈的报刊市场竞争中她不可能站住脚跟,打开局面,有了越来越大的读者群。

正因为如此,我们在感到欣慰的同时,也常常为克服缺点的不力而不安。例如编校工作的疏漏,屡见不鲜,至今未见根本好转。它涉及了编辑、校对、审读的各个环节,没有严密的责任制,层层把关,是搞不好的。

公开这三封来信,坦露本刊缺点,意在向读者表示克服的决心。只有我们在工作中有了切实的进步,才是对创刊4年的最好纪念。

《炎黄春秋》编辑部

因为我喜欢她,才说这一席话

尊敬的社长先生:

很高兴在发行部同志的帮助下,我购得了今年的3月号 and 贵刊的创刊号,大饱眼福,特致谢意。

我和广大读者一样,非常喜欢这份杂志。她品位高,读来催人奋进,不知老之将至。我是《中国老年报》和《老同志之友》的特约通讯员,又是贵刊的忠实读者。每期贵刊到手,我的心就紧紧地被吸引住了。

今年7月是贵刊创办4周年,7月号又恰逢总第40期。以人而论,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正年富力强矣!不知创刊4周年有何纪念活动?

拜读今年3月号贵刊特邀编委和部分作者在座谈会上的发言,深受启迪。大家一致称道的贵刊的方针、风格、内容,我都赞成;大家指出的某些缺点,我也有同感。例如校对工作实需加强。以今年2月号所见,“感慨”误为“感概”,“噤若寒蝉”误为“禁若寒蝉”,“捣乱”误为“倒乱”,“走廊”误为“走廓”,等等。这类错误时有发生,

读者可以以谅解的态度说这不过是“白玉微瑕”,编辑部则无论如何不能以“在所难免”的态度来对待了。不知您以为如何?

我在这偏僻的山村能读到贵刊是幸运的。因为我很喜爱她,才说了上面的一席话。

辽宁西丰县全星满族乡青山村

刘忠义

网师园应为「网师园」是渔翁的别称

贵刊总第34期《张旭明、张大千与〈五虎仕女图〉》一文,通篇读来饶有兴味,但美中不足,文中将苏州名园“网师园”全部错成了“网狮园”。

“网师”是渔翁的别称,即“张网之师”。园名称“网师”,是当年园主人自谦之意,不做官了,回家去当一个渔翁。

南京江苏省农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 金则文

××同志:

久违雅教,时在念中。

我于1990年退休,开始为陆定一同志编文集,花了一年多时间,《陆定一文集》已于1992年2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又应童小鹏同志之邀,协助他撰写《风雨四十年》(回忆周恩来),上卷40万字已于1994年11月由文

献出版社出版,下卷也已基本完稿。

偶尔从邮局买到《炎黄春秋》,这份杂志办得很好,内容严肃,格调高尚,知识性、资料性、趣味性兼备,颇能引人入胜,这是受知识分子欢迎的读物。美中不足是错别字太多,仅以手头的总第27期为例,顺便即可摘出不少错别字。

P6:“蒋光鼎”应为“蒋光鼐”; P8:“符浩同志当既表示”,“既”应为“即”; P9:“波光鳞鳞”应为“波光粼粼”; P10:“琳琅满目”应为“琳琅满目”; “逶延起伏”应为“逶迤起伏”; P12:“阿比西比亚”应为“阿比西尼亚”; P22:“娓娓地提出了不同意见”,“娓娓”应为“委婉”; P27:“敌酋……卢俊泉”应为“卢浚泉”; P31:“南昌……马四岭”应为“马回岭”; P42:“左的东西日异明显”,“异”应为“益”; P60:“筲路蓝缕”应为“筲路蓝缕”; P63:“桌台大人”应为“桌台大人”。

这个缺点克服之后,刊物当更受读者喜爱。

北京市六铺炕工人日报宿舍

陈清泉

夏日之良友



帮您排除“空调病”“冰箱病”的苦恼

炎炎夏日来临，如何度过盛夏酷暑？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居民家里安装了空调，购置了冰箱，鳞次栉比的现代化写字楼、办公楼里更是空调、冷气一应俱全。马路上随处可见的冰柜中装满了各式各样的饮料、冷食；人们在夏日似乎过得潇洒、惬意。殊不知，人们的享受现代文明的同时，也在吞食着现代文明的苦果——“空调病”、“冰箱病”。

人们从烈日炎炎的室外进入有冷气、空调的室内时，顿觉身上一凉，感觉似乎清爽许多。但是他们不知道，在室外时，其皮肤表面毛细血管舒张，血流量大，毛孔开放，排汗增多，一旦进入有空调的室内，皮肤表面血流量骤然减少，毛孔收缩，排汗量因之减少，肤温下降较快。在如此温度骤降过程中，有许多人都有种“汗没出畅快”的感觉。还有些人，贪凉图冷，夜晚休息时，整夜开着空调，且覆盖甚少。夜半阴气渐长，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极易着凉受冷。人们经过长期的观察认识到，长期在有空调、冷气的环境中，易患筋膜炎、关节炎，造成关节僵硬，屈伸不利，肌肉酸痛，头晕、头痛症状，这就是“空调病”。另外，还有些人，从室外回来后，不管三七二十一，打开冰箱肆食各种饮料、冷食，以解燃眉之渴。但长此以往，大量冰冻食品克伐脾胃，使脾之运化无权，胃之腐熟失约，导致恶心、呕吐、腹泻、腹痛等，这就是另一种现代文明病——“冰箱病”。

中医学认为，“天人相应”、“人与四时相应”，天地、四时、万物对人的生命活动都要产生影响，使人体产生生理或病理的反应。因此，“和于阴阳，调于四时”，是中医养生方法的一项重要原则。故《灵枢·本神》指出：“智者之养生也，必顺四时而适寒暑，和喜怒而安居处，节阴阳而调刚柔，如此僻邪不至，长生久视。”《吕氏春秋·尽数》亦指出：“天生阴阳寒暑燥湿，四时之化，万物之变，莫不为利，莫不为害，圣人察阴阳之宜，辨万物之利，以便生，故精神安乎形，而寿长焉”。

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空调、冰箱的出现，虽使人得一时之快，但从医学角度上讲，环境温度骤寒骤热，过食冷饮又使脾胃受戕，变生百病，是人为地破坏了四时阴阳以及人体本身的阴阳平衡。“空调病”、“冰箱病”正是人为破坏人体内外环境阴阳平衡的结果。

如何防治“空调病”、“冰箱病”呢？我们建议，长期在空调、冰箱环境中的人，不妨戴上505神功元气袋。白天在室外工作、奔走时可取下；晚上回到有空调的室内即可戴上。大家知道，在夏季睡眠时，无论多热，都要在腹部盖上一件衣被，否则极易着凉，小儿与老年人尤其是这样。腹部，尤其是脐部，是脏腑功能的枢纽，此处受凉，极易引起腹痛、腹泻等不适反应。505神功元气袋是陕西咸阳抗衰老研究所所长来辉武先生在挖掘历代古秘方的基础上，搜集、整理百岁老人长寿秘诀，精选50余味天然中药材，科学炮制，精心制作而成的。它作用于人体的黄金点——神阙穴，其药物的有效成分经过皮肤吸收作用于人体，而且整个药芯对神阙穴起到一个类似于温灸的作用，以调整全身气血阴阳，协调脏腑功能，使紊乱的气血阴阳达到平衡，即“阴平阳秘”的作用，从而可以有效地防治“空调病”、“冰箱病”带来的种种疾患。

另外，从小暑到立秋，人称“伏夏”，即“三伏天”，是全年气温最高，阳气最盛的时节。对于一些每逢冬季发作的慢性病，如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支气管哮喘、腹泻、痹症等属于阳虚的病症，是最佳的防治时机，称为“冬病夏治”。所以，在夏季佩戴505神功元气袋还可起到冬病夏治的作用。而且夏季人体腠理疏松，药物的有效成分也易被人体吸收。不过，要注意的是，夏季，出汗多易将元气袋药芯沾湿，所以应经常将元气袋放于阴凉干燥处，晾干后再佩戴。

有了505神功元气袋，您将度过一个真正舒适惬意的夏天。

中国咸阳保健品厂独家生产（严防仿制假冒）
中国医学科学院西安分院医药保健研究所监制
厂址：陕西咸阳市乐育北路19号
电话：(0910) 218328 216586
京卫药宣字93(07—323)

陕西咸阳抗衰老研究所研制
陕西咸阳五〇五医药保健总公司经销
联系人：周华 邮政编码：71200
传真：(0910) 218606 电挂：8286
邮购价：每条58.50元

中共海南省委机关报，邓小平亲自题写报名

海南大特区唯一的日报

海南省人民政府指定刊登有关法律性质广告之有效刊物

海南日报

《海南日报》发行海内外，发行量
居全省之首。增版增刊，免费赠送。

逢周一、三、五、日出对开八版，二、四、六出对
开四版，月定价9元，零售每份0.30元。

海南日报广告部，《海南日报》属下的海南省报业广告公司以拓展我省新闻广告市场，以“求实、创新”的精神，尽心尽力地及时把客户的企业形象、商品信息、产品广告推向市场，广告设计美观、新颖，富有经济特区特色，广告信息量名列全国前茅，准确地为经贸、中外企业等各界人士提供市场动态。

《海南日报》每期都辟有一定的版位，供刊登港澳和海外来华广告及国内各类各地工商企业广告和其它各类广告，竭诚为客户提供服务。

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

邮发代号：83-1

统一刊号：CN46-0001

社址：中国海南省海口市
新华南路7号

邮政编码：570102

总机：6222021转

炎黄春秋



苏哈托总统接见牟善初



台湾人民欢庆抗日战争胜利

名将粟裕大战淮海

将帅们的保健大夫牟善初

从美国间谍到友好使者

叱咤风云的黄埔女兵

毛泽东堂弟毛泽润

是怎样被杀害的

ISSN 1003-1170



国内统一刊号 CN11-3817 邮发代号 32-507

定价: 5.20元